

临沂城市名片

LINYICHENGSHIMINGPIAN

全国文明城市

东夷文化发祥地

战争年代华东暨山东解放区首府

全国双拥模范城市

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全国红色旅游重点城市

全国创建文明城市工作先进城市

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优秀市

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先进地区

中国市场名城

中国地热城

中国书法名城

国家园林城市

国家环保模范城市

国家卫生城市

图例

	市 政 府
	县(市、区)政府
	乡、镇(街办)
	铁 路
	高速公路及道号
	国道及道号
	省 道
	县 道
	省 界
	设 区 市 界
	县(市、区)界

主 办：临沂市地方史志办公室
协 办：临沂市地方志学会
临沂市望族文化研究会
临沂大学沂蒙文化研究院

编委主任：赵爱华
编委委员：徐福田 李克彬 秦鸿伟
何相军 尹云川 王长利
赵宗远 康德忠 刘兆东
李凤军 王泽远 孙建中
李延杰 曲文军 王纪明
呼国英 高 雷 胡拙安
王稼玉 尹传贵 王士岭
顾怀亮 杨沂成 卢廷运
李忠山 董保东 韦瑞芳
朱海涛 王瑞柱 伊永航
杨兴文

主 编：朱海涛
副 主 编：曲文军 刘兆东 王纪明
呼国英 高 雷

本期执行主编：呼国英
责任编辑：杜 帅 宋希芝 贾 梦
美术编辑：胡拙安 宋夏娟 周轩正
编辑出版：《沂蒙史志》编辑部
刊 号：鲁连内资（2011）第Q1023号
地 址：临沂市北城新区
天元商务大厦634室
邮 编：276000
电 话：0539-8727560
邮 箱：yimengshizhi@163.com
szbyw2010@126.com
博 客：yimengshizhi.blog.163.com
blog.sina.com.cn/u/1914056311
网 址：http://www.linyisq.gov.cn
《沂蒙史志》栏目
印 刷：临沂玉峰印刷有限公司

目 录

【本期特载】

张自忠与临沂战役 宗 航 04

【峥嵘岁月】

在华东野战军——开国上将钟期光 初学者好吧 10
抗战八年的滨海区和滨海八路军 万里云执笔 16
八路军一二九师津浦支队始末 程明三 周裕来 20
护送黎玉赴延安 郅润清 26

【名人素描】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指引下
——怀念抗日时期的张里元将军 何志斌 高来宾 王义琛 28

【文化掇英】

夜读《王献堂年谱》有感 心向清风 33

【古城旧事】

老城夜话（连载） 刘家骥 35

【蒙山沂水】

从郯国说到临沂城 赵 炯 40

【探索发现】

孝悌临沂——《二十四孝》探源之六 大荒堂主 45

【诗画赏析】

览蒙山胜境 抒诗家情怀

——《沂蒙诗话》之七（续四）

李兴河 47

【影像沂蒙】

大反攻1945

本 编 52

【沂蒙名医】

碧血丹心医林情

——收藏孙桂珍

刘凤才 55

【百家渊流】

姓氏百家漫谈——陈姓（中）

赵丹峰 61

【史料辑存】

沂南汉画像石上的乐器种类

桑玉厚 66

解放军70个军的番号由来（上）

叶青松 75

【沂蒙乡亲】

大小S——徐氏姐妹的传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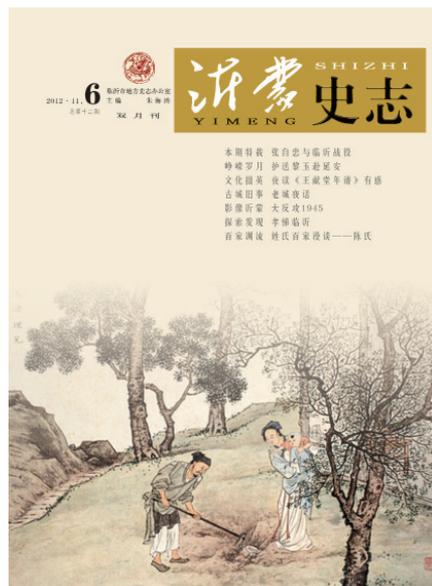
高雪萍 77

【史志动态】

80

封面：二十四孝图之“埋儿奉母” 绘画/陈少梅（清）

封底：书法/胡石



本刊声明

凡本刊发表的文字、图片，均视为双方自动接受如下约定：

1、本刊刊载的文字、图片，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来稿不查不退，请作者自留底稿，两个月未采用者可另作处理；请勿一稿多投。

2、作者文责自负，若侵犯他人权益，本刊概不承担连带责任。本刊发表的文字、图片，即拥有在“临沂市情网”和本刊主办单位编印的出版物及资料上转载的权利。

张自忠与临沂战役

宗 航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寇仗仗精良武器和强大兵力，大举入寇中原。12月27日占领山东省会济南，1938年初又占领山东第二大城市青岛。日军矶谷师团沿津浦铁路南下，坂垣师团从青岛西南推进，妄图与从南京北犯的日军会合，南北夹击徐州打通津浦铁路。由于南路北犯之敌受到中国军队李品仙、廖磊、于学忠、张自忠等部的沉重打击，无法北进。日军总部改为由矶谷、坂垣两师团南进为正面进攻的战略。矶谷廉介率领的第10师团于1938年1月相继攻占兖州、济宁、邹县（今邹城市），至此徐州以北正面大门洞开，形势危急。坂垣征四郎所部第5师团则从青岛沿胶济铁路西进，连占胶县（今胶州市）、高密、潍县（今潍坊市）后，顺台（儿庄）潍（县）公路直扑徐州。连续占领安丘、诸城、莒县，逼近鲁南重镇临沂。坂垣师团或称广岛师团，是日本天皇的三个近卫师团之一，有“钢军”之称，是日本陆军精锐中之精锐，王牌中之王牌。其指挥官坂垣征四郎，是“九一八”事变的策划者之一。1937年7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第5师团和第10师团一起，作为日军精锐部队，投入到中国的华北战场，成为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的直辖部队，被当作攻击中国军队的一张尖刀王牌。临沂自古乃兵家必争之地，得失关系国民政府“徐州会战”全局。临沂一失，徐州以北则暴露无遗，徐州会战必陷被动局面。

当时，临沂的守备力量，只有山东省第三督察专员公署专员兼临沂城防司令张里元所辖保安团2000余人。张自知难挡强敌，即急电坐镇徐州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求援兵。2月上旬，李宗仁急调驻防海州（今连云港市）的庞炳勋部第三军团驰援临沂，阻敌南进。庞部原驻防河北，1937年10月在沧州抗击日军后，奉调至徐海地区。该部名义上为军团，实际仅有四十军之第三十九师。庞任军团长兼四十军军长。兵力只有两个步兵旅和一个补充团，另有炮、工、辎、通各一营，共计1.3万余人。2月中旬，庞部进驻临沂，根据临沂周围地形，确定以沂河为天堑，据河死守的作战策略，西乡艾山一带为后防基地，准备临沂城若失守，就在此进行游击战争，牵制敌军。张里元的保安团与庞部协同作战，战时归庞统一指挥。



张自忠（1891.8.11——1940.5.16），字荃忱，汉族，山东临清唐园村人。以中华民国上将衔陆军中将之职殉国，牺牲后追授为陆军二级上将军衔，著名抗日将领，民族英雄。

3月2日，日军由莒城大举南下，经夏庄、黄庄等地进入临沂地界，逼近距临沂城30公里的汤头周围。3月3日，日军即向我汤头守军阵地发起猛攻，临沂阻击战正式打响。

中国守军沉着应战，充分利用复杂多变的山地地形，顽强地打击着日军

疯狂的进攻。

狡猾勇猛的坂垣师团在数日内的反复冲杀进攻，伤亡愈多，虽然日军发射出的无数炮弹和航空炸弹，也造成中国守军巨大的伤亡，但却也始终无法越过庞炳勋所设的雷池一步。此时的庞炳勋，虽然他的腿脚不好，也不时冒着日军密集的轰炸，亲到战场的最前线指挥防守作战。他发现光守着被炸也不是办法，所以，除留一部正面防守临沂古城外，还不时组织西北军的敢死部队，以攻代守，从坂垣师团的两侧侧翼和后面不停对敌发起轮番袭击，不断打破日军的原有进攻步伐和计划。

庞部在海军陆战队沈鸿烈部配合下，英勇战斗，不怕牺牲，苦战几日，损失严重。3月5日汤头镇被攻占。敌军乘势进逼白塔、太平等村庄，临沂城暴露在敌人面前。随后，3月10日，日军坂垣师团约9000人，在20余辆坦克、数十门重炮及航空轰炸机10余架掩护下，开始对临沂发起猛轰，瞬时间，庞炳勋部的防守阵地上就变成了一片炸药钢铁的火海。

面对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精准的炮轰，准确机步枪射击和无数次疯狂的进攻，庞炳勋部靠手榴弹和数量不多的迫击炮也是勉强维持。牺牲之大，远超以往所见。由于双方的武器装备过于悬殊，开战不久，庞炳勋所部就出现伤亡较大情况，所以连电告急。3月10日，第五战区李宗仁令参谋长徐祖贻亲赴临沂前线指挥，同时命位于滕县附近张自忠第五十九军紧急增援临沂守军。

张自忠接到调令后，二话不说，抱定“拼死杀敌”、“报祖国于万一”的决心，于3月10日夜率部出征。为尽快赶到临沂，部队轻装一昼夜，强行军180公里，于12日抵达临沂北部沂河西岸集结。

庞炳勋见张自忠援军到后，当即请求张自忠五十九军接替临沂的城防。张自忠则感觉光守城，最终不是办法，其消极防御，不如以攻为守，从侧背夹击，一举击败日军一部，当解临沂之围。对此，徐祖贻和庞炳勋均表示赞同。



二

3月14日凌晨，张自忠指挥五十九军暗渡沂河，以两个师的兵力，从日军第5师团右侧背突然发起猛烈的攻击，第一次临沂之战打响。

张自忠第五十九军分左右两个拳头，轮番猛击，在亭子头、大太平、申家太平、徐家太平、沙岭子等处突破敌防线。敌初不及料，损失惨重，一夜之间，歼敌逾千。日军第五师团被迫放弃攻城，转回头和五十九军作战。

第五十九军由于轻装赶路，所携带重武器不多，不得和日军短兵相接。双方展开混战，在沂河两岸反复冲杀，战线犬牙交错，形成逐村、逐屋争夺之拉锯战。双方冲杀不下数十次，几度形成白刃战，五十九军两师连、排长几乎全部易人，营长也伤亡近半。日军白刃战历来训练有素，一个日军士兵同时对付三个中国士兵，仍然不惧。刘家湖、茶叶山头的阵地皆失而复得，反复争夺达三四次，战况极其惨烈，刘家湖的湖水竟被鲜血染红。

战至16日，张自忠部伤亡近半，徐州战区在听取徐祖贻的汇报后，也认为五十九军伤亡过大，提议是否先向郯城撤退休整补充。

但张自忠在观察战场情况后，坚持再打一天一夜。他说：“我军伤亡很大，敌人伤亡也大。敌我双方都在苦撑，战争的胜利，决定于谁能坚持最后5分钟。既然同敌人干上了，我们就要用精神和血肉拼命干一场，不打败敌人誓不罢休！”

战区同意了张自忠的请求。16日夜10时，五十九军倾尽全力，向日本王牌师团发起空前猛烈的攻击，雷霆万钧，大地震颤。拼杀至17日凌晨4时，五十九军胜利攻克日军全部主阵地。

临沂城的庞炳勋部也在日军后背发动攻击，激战一昼夜，攻占了日军的前沿一线。18日，张、庞两军从东、南、西三面夹击，聚歼汤头、三疃、傅家池、草坡附近多处日军。经过三天血战，李家五湖、犂沂庄、车庄、前湖崖等阵地先后被中国军队收复。在中国军队猛烈的攻击下，日军坂垣师团完全被击溃，无法支持，只好向莒县突围窜逃，第一次进攻临沂的计划彻底失败。

经过一周的激烈鏖战，日军受到重创，节节败退。中国军队共毙敌4000余人，坂本支队第11联队长野裕一郎大佐、牟田中佐和一名大队长被击毙。有资料说：“日军以载重汽车运回莒县尸体约一百余车。敌在汤头、葛沟屡次焚化尸体，来不及运回者、就地掩埋者达七八百具。”

临沂大捷，蒋介石亲自致电张自忠，嘉勉临沂告捷。李宗仁通电全国告捷。报纸舆论盛赞：“是役亦当增我抗战中之光荣一页。”



张自忠在临沂大战中缴获的日军指挥刀赠给冯玉祥

这次战斗，张、庞两军也伤亡惨重。五十九军伤亡4400多人，其中军官伤亡199人，全军可战之兵仅有1.3万人。成建制战死者有独立26旅678团第2营，113旅226团第6、第10连，114旅227团第12连，38师225团第7连。张自忠心情沉重地说：“多年患难的弟兄们为国家牺牲了，这心里的难过，真比油煎还狠！但我相信，我领导他们走的是一条光明大道，虽死犹荣！军人

报国，此其时也！说不定哪天我张自忠也会牺牲在抗日战场上，这是一个军人在国家危难时应尽的责任。”后来张果然牺牲在抗日战场上。

此时，应邀在徐州参与采访徐州战场的中外记者及各国大使馆前来观战的武官不下几十人，大家都想不到一支所谓最优秀的日军王牌，竟受挫于一支名不见经传的地方部队。一时之间，中外媒体四处哄传，喝彩之声四起，甚至有人称赞他们是保卫中国的“雄狮”部队。

战败的日军第5师团师团长坂垣征四郎无可奈何，只好硬着头皮，通过日本侵略军第2军的参谋冈本清福大佐向在兖州的第10师团长矶谷廉介通报了战斗失利的情况，表示进展十分困难。

矶谷廉介接到坂垣征四郎的通报后，根据日军西尾寿造中将对夺取台儿庄战略要地的要求，实行围魏救赵的策略，第10师团立即进攻徐州外围台儿庄，以解临沂之困。

三

临沂大捷后的当晚，第五十九军奉李宗仁命令，不等休整，马上离开临沂，向日本侵略军矶谷廉介的第10师团侧后翼的费县地区集结，准备在日军第10师团进攻台儿庄时，在其左后背发起突然攻击，以便在关键时刻策应台儿庄正面区域的防御作战。

此时，坂垣征四郎获知张自忠部离开临沂，感觉时机来临。3月23日，坂垣征四郎亲自指挥，火速从铁路增兵，集结第5师团所有的后援，再次进攻临沂。庞炳勋部不支，再度告急求援。张自忠第五十九军星夜再次回援，于25日返抵临沂。

3月25日，第五十九军在张自忠的率领下，不顾赶路的疲劳，全军官兵挟胜利之余威，立即和坂垣征四郎的第5师团展开了浴血鏖战，强硬拼杀，冒死冲锋，给日军的王牌铁军以极大的震撼。几日下来，中国军队伤亡日以千计，日军伤亡也不少。

3月29日，李宗仁指挥原东北军第五十七军三三三旅和汤恩伯第二十集团军的一个精锐机动骑兵团增援临沂。中国军队士气立即大增，张自忠乘势下令全线突然发起最后的总攻，坂垣征四郎的第5师团在中国军队的四路夹击之下，全线崩溃，向汤头方向逃窜，沿途日军尸横四野。

二次临沂之战，张自忠的第五十九军与敌连续激烈血战7个昼夜，在其他部队的有力配合下，痛击日军，将日军号称“钢军”的坂垣师团全线击溃。坂垣征四郎突出包围，狼狈率部逃窜。撤退中，坂垣征四郎的军事指挥杖及一些私人物品等，均被中国军队所缴获。第五十九军也付出了巨大牺牲和代价。两次血战，五十九军伤亡惨重，仅连长就伤亡120名。3月30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军令部致电李宗仁指出：“张军坚忍抗战，毙敌累累，希传谕慰勉。”

号称“钢军”的日军精锐第5师团两次败北。日军第5师团从3月3日发起临沂之战，苦战至月底，仍未能越雷池半步，这对于日本“钢军”来说，实在是太难堪了。坂垣征四郎羞于屡次战败的结果，几次欲自杀。

李宗仁指出，临沂战役的最大收获，“就是将坂垣、矶谷两师团拟在台儿庄会师计划彻底粉碎。造成台儿庄血战时，矶谷孤军深入为我围歼的契机”。

在不久后的台儿庄之战中，中国军再次歼灭日军王牌军队。日军王牌第10师团、第5师团、第13师团在侵略战争中受到中国军队接二连三的致命打击，尤其是号称“钢军”的第5师团，屡战屡败，被打得垂头丧气，没有了往日的傲慢。这在日军侵华战争甚至是日本明治维新的现代化建军以来，尚属第一次。对日军来说，这不仅是兵力数量上的损失，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挫折，“大日本皇军不可战胜”神话就这样破灭了。日军《步兵第10联队战斗详报》载：“不识他人，徒自安于自我陶醉，为国军计，更应以此为慎戒。”日军对中国军队不得不刮目相看了。而中国军队战胜日本侵略军的辉煌战史又写下了新的一页。

后记：

壮烈殉国 国人敬仰



张自忠灵柩抵达重庆

1940年5月16日，已任第五战区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的张自忠在湖北枣宜会战中壮烈殉国。“一战于淝水，再战于临沂，三战于徐州，四战于随枣，终换得马革裹尸还”的张自忠将军一生的传奇戛然而止。

在这次枣宜会战中，他奉命率部渡过襄河，侧击南撤的日军第三十九师团。在襄河东岸宜城的南瓜店，由于无线电报被日军破译，他所率的总部直属队和第七十四师遭到日军包围。张自忠率部与敌激战，在战斗中壮烈牺牲。张自忠在牺牲前曾给他的部下写信，表达誓死抗敌的决心：“看最近之情况，敌人或要再来碰一下钉子，只要敌来犯，兄即到河东与弟等共同去牺牲。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的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致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愿与诸弟共勉之。”

以集团军总司令之位殉国的张自忠是抗日战争中战死沙场军衔最高的指挥官。5月28日晨，张自忠灵柩运抵重庆。蒋介石、冯玉祥率文武百官臂缀黑纱，肃立码头迎灵，并登轮绕棺致哀。28日下午，蒋介石率文武百官和各界群众为张自忠举行了盛大隆重的祭奠仪式。蒋亲自主祭，还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通电全军，表彰了张自忠一生的功勋。随后，国民政府为张自忠举行下葬仪式。

冯玉祥以极沉痛的心情题了“张上将自忠弟千古苍忱不死”挽联，写了很长的祭文，还为张自忠书写了墓碑，并将北碚安葬忠骸的小山命名为“梅花山”。

时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的于右任亦题词：其立志也坚，其制行也烈，初啮齿于危疆，



终受命于前敌，身死功成，永为民族之光荣，是军人之圭臬。

国民政府为避免影响全国抗战士气，未立即发表消息。直到同年“七七”抗战三周年纪念日，才将此消息公诸报端。随后，全国各地都先后举行了不同规模的追悼和公祭仪式。

对于张自忠的殉国，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表示了深切哀思。在延安中央大礼堂召开的追悼大会上，朱德总司令和中共中央领导同志都参加了悼念活动。《新华日报》特地发了悼词。毛泽东主席赠词“尽忠报国”，周恩来题写“为国捐躯”，朱德书挽“取义成仁”。

郭沫若书有颂文：云山贵乎惇惇之嘉名，以修能重其内美，自有取舍进退之权衡。曾举世非之，而未尝加阻；纵举世誉之，亦何所溢乎其风声！日月失其耀，雷霆失其鸣，泰岱失其高，金石失其贞，更何有于雕虫小技之营营！余唯知寇犹未灭，毅魄必常附旗旌，直向目标迈进，偕国旗而永生。

1943年5月16日，《新华日报》发表周恩来的文章《追念张荃忱上将》，纪念张自忠将军殉国三周年。文中说：张上将是一方面的统帅，他的殉国，影响之大，决非他人可比。……抗战既起，张上将奋起当先，所向无敌，而临沂一役，更成为台儿庄大捷之序幕，他的英勇坚毅，足为全国军人的楷模。而感人最深的，是他的殉国一役。……其忠义之志，壮烈之气，直可以为我国抗战军人之魂！

抗战胜利后，张自忠获颁国民政府荣字第一号荣哀状。1947年，北平市政府颁令将铁狮子胡同改为张自忠路，此后，上海、天津、武汉、徐州、济南等城市均有街道被命名为“张自忠路”。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几度拨款，重修重庆北碚梅花山张自忠将军陵园以及南瓜店张将军殉国处纪念碑和衣冠墓。1982年4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为表彰张自忠在抗日战争中的英雄业绩和告慰英灵，追认张自忠为“革命烈士”。



在华东野战军——

开国上将钟期光

初学者好吧

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在华东，蒋介石把矛头首先对准与南京隔江相望的苏中解放区。此时，钟期光任华中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兼华中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在司令员粟裕、政治委员谭震林等直接领导下，主持前线部队的政治工作。面对4倍于己的国民党军即将开始的大举进攻，苏中解放区党政军民齐动员，百里战场忙备战。

7月10日，钟期光主持下达了《华中野战军政治部关于“开始打”的指示》。军民严阵以待，充满了“蒋必败，我必胜”的坚定信念。

13日，华中野战军趁国民党军大规模调动而部署未妥之际，先机制敌，主动出击，首战宣（家堡）泰（兴）获胜，打乱其入侵部署。15日，钟期光签发《华中野战军政治部关于泰兴、宣家堡战后政治工作的指示》，对首战获胜的单位表彰工作作了部署，提出了再战动员和加强战场政治工作的措施。

17日晚，华中野战军挥师东进，一夜强行军50余公里，直插如皋以南。18日至20日又取得如（皋）南战斗胜利，歼国民党军万余人，其中俘虏6000余人。24日，钟期光主持下达《关于如皋战斗后的政治工作指示》，提出了夺取更大胜利的方针与具体措施。

此后，华中野战军又连续进行了海安防御战和李堡奔袭战。8月12日在连续4仗胜利后，钟期光主持起草并参与签署《华中野战军首长争取自卫战的更大胜利告全体指战员书》，要求“政治工作上不间断宣传鼓动，奖励英雄模范，使部队锻炼如钢，百战百胜”。当时华中野战军没有专职后勤指挥机关，钟期光还参与紧急成立的军地联署办公、分头负责战地后勤司令部的领导，负责协调后勤保障、战伤救治和民运支前等工作。8月21日至27日，华中野战军又相继取得丁（堰）林（梓）攻坚战、如（皋）黄（桥）公路遭遇战、邵伯防御战的胜利。华中野战军一个半月连续作战7次，歼国民党军6个旅、交通警察部队5个大队共5.3万余人。中共中央军委延安总部发言人称誉苏中战役为“七战七捷”，毛泽东8月28日致电全军，对苏中作战给予高度评价，称：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敌一部，故战无不胜，士气甚高。电报还指出：“这一经验是很好的经验，希望各区仿照办理。”

钟期光总结了苏中战役政治工作的四条经验：首先，坚决贯彻最高统帅部的战略意图，政治工作才有高度；其次，针对战争实际提出问题和解决



问题，政治工作才有深度；第三，大兵团作战的政治工作要发动大家来做，政治工作才有广度；第四，不同时期的政治工作要有不同招数，政治工作才有创新与发展。

二

钟期光在解放战争初期开展的政治工作中，还以极大精力总结推广了“评定伤亡，研究战术”的经验。1946年10月至12月，华中野战军先后打了两次涟水保卫战。在战后的战斗检讨中，大家惊异地发现，仗虽然胜利了，但部队也付出了重大代价：第一次涟水保卫战虽然歼国民党军8000余人，华中野战军亦伤亡6000余人，第十纵队司令员谢祥军不幸牺牲。第二次涟水保卫战歼国民党军4000余人，华中野战军亦伤亡4000余人，未能粉碎国民党军进攻，被迫撤出涟水城。而且，新的更大更残酷的战役战斗又迫在眉睫。

这种战争的长期性与残酷性，在基层部队中引起了许多新的问题。有的说：“胜利是胜利了，我们也打伤了。”有的讲：“这么多人挤在一起打，怎能不伤亡大！”还有人无可奈何地说：“总有一天要报销！”显然，这种早晚“报销”、“一拼了之”的消极思想，已成为当时基层指战员的思想倾向。

正当钟期光在思索如何用积极的方法解决上述问题时，他收到了第一师第三旅九团政治委员梁竹吉、政治处主任夏峰《关于从评定伤亡中来提高战术的经验》。他们改变以往“动员、打仗、检讨”三部曲的“老一套”政工方法，在班、排、连队中，发动大家对实战中的每一个伤亡作具体分析，哪些伤亡是不可避免的，哪些是可以避免的，通过具体事例总结经验教训，来提高战术水平，以利再战。比如第四连在一次战斗中伤亡14人，经评定，只有2人是不可避免的，其余12人都是因不讲战术而盲目伤亡的。因为找到了造成伤亡的具体原因和减少伤亡的对策，从而增强了指战员的战术意识和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信心。

“我们的指战员是多么好啊！”钟期光反复琢磨着第九团的经验，十分兴奋，感慨万千。他想，战争是力量的搏斗，更是智慧的较量。我们年轻的指战员们，既面临着战争的考验，又在战争中锻炼成长。他们在正义的旗帜下，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一定能够赢得这场战争。于是，他拿起笔在12月5日满怀激情地写下了《对评定伤亡工作的意见》：

一、从评定伤亡中来提高战术，是自卫战争中政治工作新的成就之一。我们决定推广到全野战军中去。

二、评定伤亡以后，始知谁是可以避免或减少伤亡的，从血的经验教训中，证明消极的所谓“报销”思想是毫无根据的。

三、十年内战、八年抗战的政治工作中，注意了与非战斗减员现象作斗争，但对于战斗减员常认为是不可避免的，而政治工作人员对此似亦无责任。评定伤亡以后，明确了战斗中也可以做到少减员。这样，就提高了上下研究战术的积极性。所以在政治工作的创造性上来说，是比土地革命战争与抗日战争时期有了新的突破。

四、这个经验告诉我们，只敢打，但不会打是不行的，这叫“有勇无谋”。应当提倡“智谋与勇猛相结合”。另一方面，徒有智谋而无勇猛，只是口头讲、笔头写，而不敢在战场上去使用，也是不行的。应该是“谋而行”，不然便是“纸上谈兵”。

五、在自卫战争中，一般的军事宣传，报道“志士成仁”的多，报道“志士成功”的少。这是产生悲观消极思想、对斗争厌倦的根源。评定伤亡以后，证明了对敌作战只要自己战术动作熟练，就能既消灭敌人又保存自己。只有斗争，前途才是光明的。谁不为革命事业战斗到底，谁就会招致恶果。

六、共产党、新四军所遇到的困难，没有不可以克服的。根本的方法就是团结一致，以新的方法去战胜它。方法不完全是出自上级机关，而是从群众中来。

七、评定伤亡做到了军政工作的一致。保证了军事技术的提高，加强了部队的战斗力。



1948年钟期光与华东野战军政治部同事合影

这是战争中的经验总结，但不能看成是呆板的公式和法则。

钟期光的这个《意见》和第九团的经验，得到陈毅、粟裕和谭震林的赞同，先在华中野战军逐级传达贯彻，然后华东野战军政治部印成小册子《政治工作经验介绍之一：从“评定伤亡”提高到战术研究》，在华东野战军贯彻落实。陈毅在《一年来自卫战争总结》中，把“评定伤亡，研究战术”等列为“自卫战争得到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第四野战军前身）以《华东解放军始创“战评”》为题，将《从评定伤亡来研究战术技术》收入《连队工作丛书之一》。随后，人民解放军全军许多部队，也陆续推广了“评定伤亡”的经验。这对保证解放战争的胜利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三

战役战斗的规模越打越大，部队流动频繁，伤亡重，困难增加，在指战员中产生了一些埋怨与怀疑情绪。有的甚至对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有了怀疑，对长期作战和最后胜利缺乏精神准备和充足的信心。为此，钟期光以学习理解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战略方针为核心，加强了形势任务教育，引导指战员们通观全国战局的发展，结合部队思想实际，深入贯彻军委和野战军首长的战略战役意图。他组织政治机关采取自上而下，先干部后战士，从党内到党外，利用一切机会，短期培训与边行军边作战边教育相结合，把形势教育搞得生动活泼，深入人心。这期间，钟期光主持野战军政治部先后下达了《撤出两淮准备打大歼灭战》、《北线首次出击战斗动员提纲》、《从思想上保证爱国自卫战争的胜利》、《最近战局的讲话材料》、《北上山东打胜仗，要把威名天下扬》等大量政治工作指示和形势教育材料，从思想上武装全体指战员，树立敢打必胜的坚定信念。

华中野战军面对的国民党军，毕竟是抗战胜利后接收了百万日军装备、获得美国全面军事援助、正向解放区大举进攻的“强弩”。苏中战役后，华中野战军虽然取得大兵团作战的初步经验，人员装备有了发展，但随着新成分、新装备的大量增加，又面对国民党军连续进攻，在基层指挥能力、政治素质和士气等方面，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如何正确理解中共中央

规定的战略方针中关于歼灭国民党军有生力量和暂时放弃若干地方的关系，如何在长期作战和连续作战中加强指挥，管理好部队，保证继续打胜仗，成为政治工作的当务之急。

这时，由钟期光派到第一师二团任政治处副主任的军区文艺科长赖少其，和政治处主任郑克一道，总结了由士兵提出的“记功劳”的作法。第二团正式作出《关于开展功劳运动的决定》，得到指战员们的热烈响应。大家提出：“功劳功劳，刻苦耐劳，把仗打好”，“党员应在功劳运动中立头功”。通过实践，第二团开展的“功劳运动”不断完善与发展：连有功委会，班有记功员，随时为大家记功、报功。全团还建立了“三证”：个人有个《功劳证》，功劳随人走，调到哪里也光荣；连队有个《功劳簿》，大家记功，集体光荣；向立功者家里发个《功劳状》，一人立功，全家光荣。从此，全团政治思想面貌焕然一新，战斗力大为提高。该团在涟水保卫战中被评为全师先进团。

1946年11月11日，延安《解放日报》综合华中解放区和山东解放区开展立功运动的情况，发表了《加速全面抵抗胜利的到来，华东开展立功运动》的头版头条新闻，并配发《号召普遍响应立功运动》的短评，称“这是人民自卫战中的一个创举”，“华中新四军某团所提‘有了功劳不骄傲，功劳上面加功劳’的口号是很好的。我们号召全解放区普遍响应这一运动，作为争取全面抵抗胜利的有力武器。”

11月中旬，钟期光主持召开华中野战军宣教部长联席会议，在全野战军推广第二团的经验。他把“功劳运动”列为当时六个政治工作“范例”之首，充分肯定，号召全军学习；将赖少其撰写的《二团“功劳运动”第一阶段初结》的万字长文，刊登在野战军政治部编印的《建军增刊》第17期上，推动立功运动的发展。12月4日，钟期光又在全野战军工作总结大会上，作了《目前野战部队中政治工作报告》，进一步肯定立功运动的“群众化”和“普遍化”，并向大会直接推荐了第二团的经验。钟期光还利用战争空隙，举办战时政治工作训练班，其中开设了“立功运动”专题课，培训开展立功运动的领导骨干。

四

1947年1月，遵照中央军委的决定，新四军番号取消，改称人民解放军。华中野战军与山东野战军合并，组成华东野战军，下辖12个步兵纵队（至1948年7月发展到16个步兵纵队）和1个特种兵纵队，共约27万人。陈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粟裕任副司令员，谭震林任副政治委员，陈士榘、刘先胜分任正、副参谋长，唐亮、钟期光分任政治部正、副主任。在以后一个较长时间作战中，陈士榘、唐亮经常指挥几个纵队组成一个兵团独立执行作战任务，谭震林则兼山东兵团政治委员，因此华东野战军政治部的工作经常是由钟期光实际主持。

解放战争中，华东部队在执行俘虏政策上，有许多创新与发展。钟期光认为，“宽待俘虏”的意义与目的包括两层含义：瓦解敌军；壮大我军。过去的俘虏政策，往往重视了前者，忽视了后者。结果是“捉了放；放了又捉”，不少国民党兵“二进宫”、“三进宫”，甚至被捉放五六次。他在解放战争中总结了总结经验教训。

早在1946年9月5日，钟期光就在给俘管处正副处长韩念龙、房少庸的信中指出，要从战争全局和发展的观点看待俘虏，从“瓦解敌军”和“加强我军组织建设”的高度，而不是仅仅从处理俘虏的狭小意义上对待俘虏工作。并就俘虏军官和士兵的处理分别提出了原则意见。他归纳了争取俘虏士兵入伍的三条好处：一是节省根据地人力动员；二是减少蒋介石兵源；三是利于我们连续作战，并利用其军事技术，提高其政治质量。

莱芜战役后，包括宿北、鲁南战役的战俘总数达10余万人。孟良崮战役后战俘人数更多。野战军政治部俘管处设5个大队、27个中队和1个将校队，收管俘虏军官6万余人。俘虏士兵则由各纵队管训后大部分充实连队。

打张灵甫整编第七十四师，干净利落，全师人员极少漏网。班长以上被俘官佐，都集中

到了俘虏管处，形成了整编第七十四师较完整建制的俘虏军官集体。钟期光认为，这是一个研究敌军、获取情报、知彼知己、以战教战的极好机会，报请陈毅、粟裕批准，决定对整编第七十四师被俘军官进行一次全面审讯调查。他让联络部长吴宪牵头，组织20余名得力干部，找了百余名各级各类被俘军官座谈调查，并参照缴获的文件资料，分9个专题写成10万余字的《蒋军七十四师的调查研究》，钟期光题写了书名，印发部队。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得悉索要，他们立即报送。这对洞悉国民党军的短长、改进人民解放军的战术技术和指导作战产生了良好的作用。

教育改造俘虏官兵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开始，整编第七十四师的多数被俘军官对打败仗很不服气。他们认为凭装备、论训练，解放军远不如整编第七十四师，他们的失败是“部队误入绝地，带有偶然性”，只不过是“关云长大意失荆州，不是没有本领”。经过形势教育、辩证唯物主义战争观教育、人民战争的思想教育和政策学习，目睹解放区的军民关系、官兵关系和对他们的宽待，多数人的思想立场开始转变。陈毅亲自给被俘军官们作报告，接见被俘将校军官。钟期光曾找整编第七十四师少将参谋长魏振铎谈话，还指定政治部秘书长谭肇之与其谈心交朋友。经过教育开导，魏振铎心悦诚服，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了南京军事学院的古代战史教员。

“溶俘教育”的重点是被俘士兵。从政治上分析，他们绝大多数出身于被剥削被压榨的劳动人民，尤其是解放战争中后期的国民党军士兵，基本上是来自国民党占领区的穷苦农民。通过两种社会、两种军队对比的“阶级教育”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建军宗旨教育，特别是“诉苦”、“挖根”和“换心”教育，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说到伤心处，满场悲声欲绝，许多人难过得在地上打滚；然后站起来举枪宣誓：“报仇雪恨”，“为人民立功”！再加之对他们的关心爱护，不叫“俘虏”而称“解放战士”，共产党员和各级干部又处处以身作则，深深地感染了广大解放战士。

截止1947年9月，华东野战军经过一年多的解放战争，共歼国民党军43.1万余人，其中俘虏官兵26.2万余人。被俘士兵经教育后绝大部分补入人民解放军。为了教育越来越多的解放战士，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宣传部教育科长奚原写出了3万余字的“溶俘经验”，经野战军政治部讨论通过，钟期光题写了《改造俘虏工作的初步总结》的书名，以《华东前线》增刊第11期的形式印成小册子下发部队。

五

华东部队继苏中战役后，相继取得了宿北、鲁南、莱芜和孟良崮等许多战役的胜利。战争实践证明，在诸多胜利因素中，政治工作的保证作用是重要因素之一。而“立功运动”的创立与发展，又为新时期战时政治工作增添了崭新的内容与形式。凡是立功运动开展得好的单位，士气就高，战斗力就强，胜利就大；反之，结果就相反。这使钟期光领悟到，作为政治工作领导机关，既要抓大事，又要注重实效；既要发扬传统，又要善于创新。“立功运动”的实践，做到了这两者的统一，必须抓住不放，一抓到底。

钟期光一面要求各纵队政治部总结上报开展立功运动的经验与教训，一面从野战军政治机关组织巡视组，下部队调查研究，重点搜集“立功运动”的材料。他派宣传部教育科长奚原到第四纵队第十师第二十九团（由首创“功劳运动”的原第一师第二团整编而来）和第三十团搞调研。奚原调查4个月后回到机关，钟期光对他说：“其他什么事情你也不要管，就躲起来总结立功运动。”在激烈动荡的战争环境，奚原在野政印刷厂驻地的一个村庄，用十几天时间写成了《华东野战军一年来立功运动的总结》。这个总结，经钟期光主持华东野战军政治部讨论通过后，10月又由钟期光亲笔题写书名，印成《建军增刊》单行本，发至全野战军，上报中央军委，并通过西线兵团传到了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给予了肯定。

10月，华东军区政治部编印了《连队工作的三把钥匙》，将“立功运动”、“诉苦复仇运动”、“团结互助运动”一并作了介绍。新中国成立后，立功运动被载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条令》和《战时政治工作经验选编》。几十年后的1991年3月，钟期光应约撰写了《我军政治工作的一个创举》，对开展立功运动作了精辟概括。他指出：立功运动是群众的创举，是华东部队广大政工干部集体智慧的结晶。立功运动之所以具有很大的推动力与生命力，首先，在于它的先进性。其基本内容，是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贯彻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这也是人民军队本质与根本宗旨的体现。其次，在于它的群众性。“每人立一功，胜似数万兵”。仅华东部队解放战争时期涌现的功臣就有56万余人。第三，在于它的实践性。以先进事迹为基础，各行各业、不同时期的各种对象均可适用。第四，在于它的创造性。这是从红军以来政治工作的一个新发展，解决了政工方法上的一个重要问题：表扬为主，批评为辅，启发自觉，提

高战斗力。

六

1948年3月中旬至5月下旬，华东野战军前委在河南省濮阳县召开扩大会议，开展“新式整军运动”，史称“濮阳整训”。这次整训给钟期光的组织结论是：“积极负责，直爽坦白，斗争性强，爱总结经验（如溶化俘虏、立功运动等）；但也爱冲动，不冷静客观，有时也没有掌握以正确对错误的原则。”整训后期，朱德亲临指导，作了著名的“放长线，钓大鱼”的报告，还送给团以上干部每人一本马列主义经典著作。钟期光得到的是有朱德亲笔题词的《社会科学简明教程》。

7月，在睢杞战役后的行军路上，第一纵队的团长栗亚报告钟期光：战斗很激烈，虽获大胜，但部队伤亡减员也大。为保证连续作战，又保持原建制，他们采用了一边作战一边将俘虏士兵补充连队的办法。钟期光问栗亚：这样不经教育补入的解放战士跑不跑？栗亚说：整个战争形势向胜利的方向发展，加上基层骨干强，能团结解放战士，解放军战斗作风好，补入的解放战士都能听从指挥，纷纷争取杀敌立功。连队兵源有了保证，战斗力得到增强。钟期光随即将这个团“火线扩军，随补随打”的经验，报告了中央军委，并迅速推广到其他纵队，普遍获得成功。

9月，华东野战军发起济南战役。钟期光在为野战军政治部起草的《关于攻济打援的政治工作指示》中，正式列入了“随捉、随补、随打”的扩军方针，野战军上下一致认为这个方针是正确的。后来中央军委将这个经验转发全军时，改提为“即俘、即补、即战”和“随战随补，随补随战”。淮海战役中，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共伤亡13.4万人。当时后方不可能动员和输送这么多新兵到前线，“即俘、即补、即战”的扩军方针满足了这个需要。华东野战军在战役前仅36万人，到战役结束后改编为第三野战军时，已发展到58.1万人，所增人数大部分是解放战士。

1948年11月开始的淮海战役，钟期光参加了由陈毅、粟裕、谭震林、唐亮、陈士榘、张震、刘瑞龙组成的中共华东野战军前线委员会。淮海战役第一阶段，陈毅仍在中原野战军，谭震林一直随山东兵团指挥作战，唐亮率组织部长王文轩等留在曲阜准备召开政工会议的材料，实际在华东野战军前委主持作战的是粟裕、陈士榘、张震、钟期光、刘瑞龙5人。上下通达的综合性电文，仍署“粟谭陈唐张钟刘”或“华野前委”；属军事方面的上下电文只署“粟陈张”；属政治方面的电文只

署“粟钟”或“野政”；属后勤方面的电文只署“粟刘”。

在中央军委和中共总前委领导下，粟裕主持华东野战军的全盘工作，政治工作由钟期光具体负责。从挺进苏南的抗日先遣支队起，他们一直合作得很好。粟裕有倒骑战马的本领。战争环境，频繁流动，有时路窄骑马不能并行，粟裕就背向前，面朝后，倒骑马，与骑马走在后面的钟期光边行军边研究工作，走一路谈一路，许多重大战役战斗的决心与政治工作部署，都是在行军途中的马背上形成的。粟裕在原则问题上考虑很周到，而具体工作则放手让钟期光去做。12月3日，中央军委批转粟裕、钟期光上报的《关于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总结报告》时指出：“总结甚好，望本此精神继续指导追歼徐州逃敌的当前战役，期获全胜。”淮海战役经过66天浴血鏖战，华东野战军以伤亡10.5万人的代价，取得歼国民党军44万余人的空前胜利（整个战役，华东、中原两个野战军共伤亡13.4万人，歼国民党军55.5万余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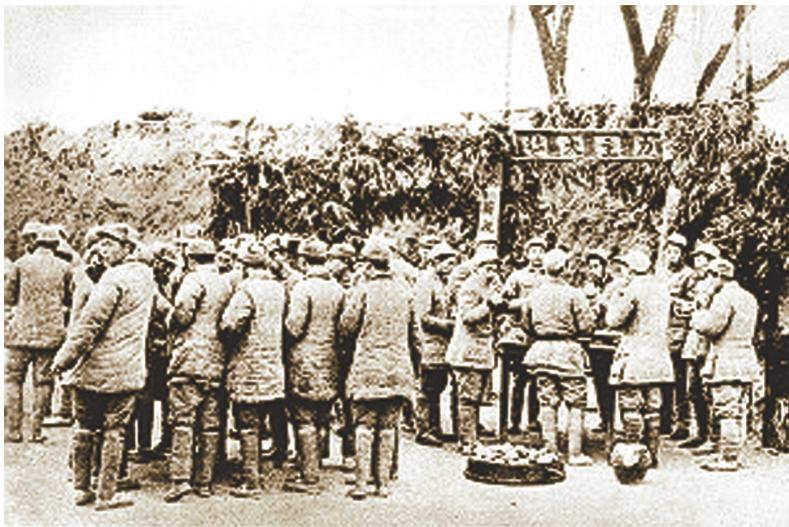
1949年2月，遵照中共中央军委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和番号的决定，华东野战军改称第三野战军，钟期光任第三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

在渡江战役中，钟期光比第三野战军机关早一个月到达长江北岸，主持前线部队渡江作战的政治工作。部队攻占南京后，钟期光参与指挥第三野战军乘胜追击，通过积极的、不断深入的政治思想工作，在友邻部队协同下，保证部队夺取了上海战役的胜利，迎来了华东全境的解放。上海解放后，钟期光协助陈毅参与军管会的领导，任上海市军管会政工部主任兼党委书记，主要工作是贯彻落实中共中央的城市政策与部队入城纪律，实施对国民党政权在上海的政工机构的接管工作。

1949年6月，华东军区与第三野战军两大机关合并，改称华东军区暨第三野战军。钟期光任政治部副主任、三野前委委员。

抗战八年的滨海区和滨海八路军 (上)

谢辉、刘鸿若、张万祥、韩枫、万里云、段维绍集体座谈。万里云执笔



滨海地方部队升入主力后会餐

一、富饶的土地，英雄的人民

在我们伟大祖国的东端，有着这样一块美丽而富饶的地区，它南起横贯着大半个中国的陇海铁路，北至山东半岛的大动脉——胶济铁路，东滨黄海，西界沂河，地形长方，由东北斜向西南，东西约200公里，南北约300公里，其中贯通着沂河、沭河，交杂着台潍、海青等数条公路干线。这儿有巍峨壮丽的山区，有一望无际的平原，有古代名城莒国(即莒县)，也有适宜现代海军建设的天然良港——青岛、连云港、石臼所和岚山头。它盛产无穷尽的食盐和鱼类，也蕴藏着丰富的煤炭与金沙，有质地优良的云母矿，也饲养有大量的山蚕和猪羊。在农作物上生产小米、小麦、大米、花生和地瓜，高粱与黄豆。

这一地区，就是抗日战争时期著名的滨海区；这一地区的军民，就是曾经与日寇血战八年的滨海军民。

抗战中，面对侵略者的摧残，这里的人民用无数可歌可泣的英勇行动来保卫自己的家乡。他们也永远不会忘记，共产党是怎样领导着他们从血泪中慢慢地站起，顽强抵抗，打败了侵略者。

二、星星之火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寇的兽蹄踏进了富饶的山东，飞机和兵舰在山东的领空和黄海到处逞凶，韩复榘军队一枪不放成批成批地沿着黄河和陇海铁路向西窜逃，或者隐蔽到鬼子找不到的地方。

敌人的炮火毫无阻拦地毁灭了一个又一个村庄。纯朴的农民离不开自己可爱的家乡，整个山东都充满着恐怖与混乱，到处弥漫着生离死别的悲哀。

中国共产党山东省委在这样的情况下，号召全省党员：“脱下长袍，到游击队去！”拯救我们患难同胞，收拾祖国破旧河山。滨海区的共产党员也与其它地区的共产党员一样，纷纷响应，挺身而出，汪洋、崔介二同志在临沂努力宣传抗战，鼓舞和振奋人心。刚刚出狱的“政治犯”谢辉同志在故乡莒县十字路（今属莒南县）集合起300多年青的农民和学生，高举义旗，成立“十字路抗日游击大队”。邵得福、李仲林两同志在沂水组织了一支救国武装——六大队。赵剑同志在南岭也拉起一个小小的队伍。这些星星之火，好象一座座小小的灯塔，照亮了滨海人民自救救国的道路，热血青年纷纷加入了这些抗日的队伍。

这些队伍虽然力量尚小，但却有着严明的纪律，官兵平等，上下一致，不侵扰老百姓，与人民同甘共苦。因此，它就特别受到人民的爱戴和拥护。大家纷纷传说：“十字路有一支‘红红’的队伍！”

拥有五六千人队伍的国民党莒县县长许树声，对十字路这支新生的人民武装抱着敌视态度。9月的一天，他突然派了30多个带着驳壳枪骑着自行车的“便衣”，把十字路包围了，企图收缴游击大队的武器。谢辉一面作坚决抵抗的准备，一面严厉教育来者，晓以团结抗日的大义，对方见有了准备，只好连称“不要误会，不要误会”狼狈而去。

不久，许树声又亲率3000余众进驻大店，打电话找谢辉谈判，责问谢辉“为什么要拉游击队”。谢辉以“抗战守土，人人有责”反驳了他。气得许树声愤愤地摔下听筒大骂不止，还扬言要采取“必要行动”。谢辉知道情况严重，便连夜率部队离开了自己的家乡，悄悄向临沂转移。谁知到了临沂，又遇到一个不幸的事：国民党鲁南第三专员张里元硬把游击大队改编为“第三专署保安司令部独立营第三连”，谢辉任连长，赵剑的队伍也被编为“第四连”，赵剑任连长。

张里元对这支“改编的”队伍，并不信任，谢、赵两个连开赴葛庄作战，还派了人员随军监视。沿途行军，一个营有两样军队。一、二连和营部的军官们都骑着高头大马，一路上有车有粮，三、四连则完全不同，谢、赵两同志不仅不骑马，而且除经常背着自己的大背包外，还要帮两三个病号扛步枪。这真是一个鲜明的对照。

当队伍走到坡里时，赵剑由于干涉二连一个排长拿老百姓的药不给钱而被痛打一顿，同志们莫不义愤填膺，提出要上营部讲理，但为了不把矛盾扩大，还是忍下来。从此以后，营长更加歧视三、四连，日夜派人监视。到下汪时，他终于下了毒手，计划在当夜全部消灭我军。幸亏事前露出迹象，就在他们动手前数分钟，我军奋起自卫，激战一夜，将营部及一连解除武装，二连亦被我正义行动所感召，事变时采取中立态度。营长、营副被我军活捉。不久，队伍重新调整机构，选汪洋同志为团长，张刚同志为政委，崔介同志为团参谋长，迅速向北挺进，与徂徕山起义的四支队汇合。

邵德复、李仲林两同志率领的六大队，也由数十人发展到数百人，但由于受到托洛茨基分子的破坏，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的海军陆战队也向他们进攻，因之人数大减。但在邵、李两位同志的领导下，队伍又很快地壮大起来，后来成为滨海部队的基干。

1938年秋，六大队整编为二支队，刘勇任司令，他带着二支队，以泊儿镇为中心，驰骋沿海。是年底，我军为严惩汉奸，讨伐叛国投敌的大汉奸张步云（原为国民党第二师师长），王村一役，首歼张逆部百十人，给投降派以严重打击，伸张了民族正气，振奋了由于正面战场失败给予滨海人们的低沉情绪。

三、严重的挫折

1939年夏天，敌人展开大扫荡后，以万余兵力，进攻滨海一带。我军虽处绝对劣势，但

为维护祖国尊严，保卫人民利益，不惜重大牺牲，领导滨海人民英勇奋战。谢辉亲率警卫连阻击二十倍于我之日寇于公婆山（莒城西），血战竟日，歼敌数百，全连健儿亦牺牲很多。刘勇的另一个连在杀伤200余日寇后，全连同志均壮烈牺牲。当此紧急之际，国民党遗留在敌后部队（如莒县之许树声、日照之张希周、郯城之严丽天，地方军之李延修、王照祥、姜立川等）虽拥有二万余人，但不仅不和滨海军民同舟共济，抵抗日寇，反而不战而逃。我军一面呼吁团结抗战，一面又以自己坚决的行动打击日寇，影响他们。经过我军民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粉碎了敌人的扫荡。

此次反扫荡，我军虽获辉煌成果，但损失亦颇惨重，所有武装部队平均减员半数以上。国民党部队亦纷纷瓦解，遂使滨海抗战力量骤然大减，形势极为混乱。中共滨海区党委立即号召全区党员，紧急动员起来，再接再厉，不屈不挠，坚持抗日统一战线，协同党外人士，重整滨海局面，组织抗战力量。谢辉、艾光楼、卞子策、王玉璞、刘鸿若、郑子久、张子亮诸同志首先响应，各阶层热心抗战人士及广大人民亦积极支援，不久又组织起一支三四千人的子弟兵。

同年底，八路军一一五师东进支队挺进郯马地区，驰骋于临郯平原，首创日寇于重坊，再败敌人于马头，威名远震，敌伪胆寒。临郯民主政府亦于此时诞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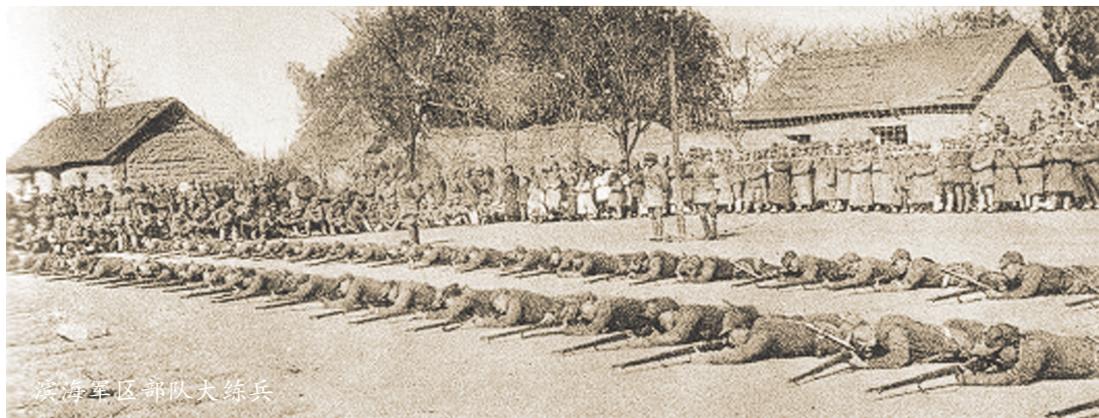
以上就是我滨海区初创时期。

四、民族旗帜的树立

1940年春天，鲁南军区派刘海涛、林浩、刘其人诸同志率领九支队挺进滨海，坚持游击战争，扩大了路北根据地，加强了滨海的斗争力量。3月，谢辉在上涧建立莒县县政府，刘鸿若在张兰建立日照县政府。这两面民众的旗帜，一经树立，就成为团结各阶层人士的标志。谢、刘二同志日夜奔走于人民之间，排难解纷，组织力量，一致对敌。虽然日寇与顽军部队把他们排挤到穷乡僻壤，但千千万万的农民仍衷心拥护自己的政府和军队。人们常在田野、庄头、路边和矮小的泥屋里，拉着谢、刘两同志尽情倾诉胸中久积的怨愤。广大人民深深知道民主政府是一颗明亮的救星，日益紧密地团结在它的周围。正因为如此，就被日寇视为“眼中钉”，反民主力量也诽谤这是“非法组织”，并公然捉拿我抗日人员，进攻我民主政府和人民武装。

是年夏天，滨海反民主力量结成反共阵线，鼓动封建道会门，围歼我路北根据地，许树声的5000余人进攻石场、桑园、板石河，李延修直逼街头镇，梁钟亭攻占红凝子、松柏林一带。我军为了团结抗战，忍痛撤离用鲜血解放的路北，告别共患难的同胞。我二团政委罗真在顾家沟中伏牺牲。

新生的力量是不可征服的，民主政权和革命武装在人民的支持下日益壮大起来。10月，滨海区所有部队统编为山东纵队第二旅，孙继先同志任旅长，江华同志任政委。这支强大的



滨海军区部队大练兵

人民武装，这时已发展到1万多人了。

年底，山纵二旅南下横扫赣榆敌伪、土匪，建立赣榆沐水民主政权，四县（莒县、日照、赣榆、沐水）联合办事处亦于坪上成立，谢辉同志任主任。在常恩多将军（五十七军一一一师师长）所属万毅部配合下，先后收复滨海区重镇大店、碑廓等日寇据点，更鼓舞与加强了人民的胜利信心。

五、粉碎日寇第二次扫荡计划

1941年春，八路军一一五师教导二旅挺进滨海，首先发动青口战役，连克青口、海头、兴庄、朱堵等十余据点，毙伤和生俘敌伪800余，并向陇海铁路沿线展开攻势，敌伪闻风丧胆，纷纷逃窜。我山纵一旅亦坚决与敌争夺海岸线，保住了黄海西岸唯一的海口柘汪。

9月22日，常恩多将军清洗通敌叛国的五十七军军长缪征流，开展了著名的“九·二二”锄奸运动，因之，抗日友军与投降派之分歧日益加剧，而投降派与专门制造民族分裂分子遂结成一股反人民反民主之逆流。梁钟亭等部均先后投敌，滨海斗争形势更加紧张。

年底，5万日寇“扫荡”沂蒙山区，为保障其改修台潍路为铁道计划的完成，一部兵力进攻我区，我立即投入了猛烈的反“扫荡”。我军一面派部队驰援鲁中兄弟部队，一面与日寇争夺台潍路。全区军民均以忘我之斗争精神，写下了无数可歌可泣的故事：我增援鲁中的独立团第九连在李村与6000余日寇展开血战，被敌重重包围，从晨至午，连续粉碎了敌人的多次进攻，虽弹尽粮绝，仍以空枪及石块与敌人决战。副营长秦鹏飞、连长孟友三及全连同志均壮烈殉国，日寇亦伤亡400余，最后剩下唯一的朱排长英勇突出重围。我山纵二旅五团一部亦以劣势兵力阻击强大敌人，击毙日寇百余。当敌人突入我中心区后，沐水县渊子崖民兵及全村民众，英勇抗击1500余日寇进攻。在战斗中，妻子帮丈夫装填土炮药包，弟弟替战死的哥哥继续战斗，幼小的儿童也拿起倒下的父兄的武器，坚决抵抗敌人。终因众寡不敌，除部分突围外，区长冯干三及大部民兵均光荣牺牲。

为了破坏敌人建筑铁路的计划，我区军民在台潍路上日夜猛袭日寇，三攻许口，三战萝沟，给敌人以重大杀伤，使敌人不得不放弃修铁路计划，而被迫“暂且停工”。

敌人扫荡失败后，在沐河西岸又建立起密密丛丛的据点，切断滨海与沂蒙地区的联系，使我区之处境又趋紧张起来。

八路军一二九师津浦支队始末

程明三 周裕来

1937年11月，八路军一二九师到达晋东南辽县（现左权县）。为侦察平汉铁路以东情况，联络中共地方党与一切抗日组织，开展游击战争，由师教导团的30名干部组成了挺进支队，支队长是三八六旅（旅长陈赓）七七二团原参谋长孙继先（红军长征时，孙曾任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第一营营长，是十七勇士抢渡大渡河的最直接、最具体的组织者和指挥者之一）、政委是胥光义。支队经过短时间的准备，于12月13日横越平汉铁路，到达冀南任县。这是八路军由太行山开往冀鲁豫大平原的第一支部队。

1938年1月中旬，八路军东进纵队（1937年12月组建，属一二九师）司令员陈再道（原三八六旅副旅长）、政委李菁玉率部抵达任县、隆尧地区，与挺进支队会合，在陈再道统一领导和指挥下，共同组织和开展抗日活动。2月8日，东进纵队进入南宫县城。9日，以挺进支队和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七六九团五连及一二九师后方留守处军政干校的部分学员为骨干，组成津浦支队，支队长孙继先，政委王育民（故城县人，原为中共地方党组织负责人）。下辖：五连，曾参加过长征和烧毁24架日军飞机的阳明堡夜战，连长杨万兴（四川人）；工兵连，由师直工兵连的一个排在南宫扩充而成，连长肖荣连（现名肖福）、指导员孙怀堂，特务连，原是南宫地区党组织新建的抗日游击队。三个连共约400人。主要任务是炸黄河铁桥，破坏津浦铁路，阻挠日军南侵，配合鲁南中国军队（包括国民党正规军和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的抗战，协助中共地方党组织广泛发动群众，建立各种组织，创建抗日游击根据地，对国民党的地方武装进行统战，团结支援爱国将领范筑先抗日，积极作战，消灭敌人，扩充、壮大自己。

2月15日，在中共鲁西北特委张承先同志的陪同下，津浦支队从南宫县城出发，由武城东渡运河，进军夏津县城。这是八路军进入山东境内的第一支部队。随



津浦支队支队长孙继先中将

后，恩县党的负责人刘子蔚、马诚斋派党员王玉成（现名王克东）前往迎接。接着，离开夏津城关，进驻恩县县城（现属平原县）附近的夏寨、八里庄、大洞头。

津支初到恩县后，在中共恩县县委的协助下，夜袭了德县城（现德州市城区）南的黄河涯火车站，炸坏了黄河涯的铁路桥梁。2月下旬，又奔赴济南市郊的泺口，准备乘夜爆破黄河铁桥。但日军岗哨林立，铁桥上安有探照灯，戒备非常森严，部队不能靠近，几次行动均未成功。炸桥不成，就改为掀铁轨。前几次由于没经验，全支队忙活大半夜，敌人到白天几小时就修复。后来，两个扳道工献计说，只拔道钉，不掀铁轨，轧路车通过没事，列车一到就翻，并提供了部分工具。这种方法果然奏效，破坏了敌人的运输。此后，支队返回夏津，又由夏津进驻恩县旧城，以旧城为中心，开展抗日活动。4月中旬，支队袭击了平原火车站，打死日军10余名，活捉2名。继之又派出两个排奔袭德县以北的连镇火车站，其

中，连长肖荣连带的一个排炸毁了站北的铁路小桥。在此期间，支队除积极出击作战外，还协助张承先创办了军政干校，派支队民运干事李仁贵(现名王化先)参与干校的日常工作，还支持帮助中共恩县县委建立了八路军恩县武装工作团和恩县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简称战委会，在当时一二九师活动区域内为半政权性质的抗日群众组织)。经中共恩县县委同意，把中共党员白金荣、李华珍等组织的抗日游击队升入津浦支队编为第二连；陆续接收了一些自愿参军抗日的进步青年和会道门武装。随着部队的扩大，津浦支队成立了第一营，营长杨万兴，下辖三个连：一连是工兵连改编的；二连是原恩县县委领导的地方武装，连长白金荣；三连是在恩县一带扩充建立的，连长王吉文。五连独立(直接受孙继先指挥)，特务连番号不变。5月上旬，政委王育民带领骑兵排西赴南宫取电台，11日，在归途中被反动会道门“六离会”围困在南宫城东南的小屯，王育民等24名官兵全部惨遭杀害。后由潘寿才继任政委。

津浦支队在袭扰打击日、伪军，协助地方党组织宣传发动群众，创建抗日根据地政权和武装的同时，还和土匪杂顽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1937年10月3日，日军侵占德县城，山东第四行政区(专署驻临清)以专员兼保安司令赵仁泉为首的大小官员闻风携款而逃。在国民党县乡政权垮台、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还没到达、日伪势力尚未深入广大农村之际，土匪、兵痞、青红帮和会道门头子等趁机蜂起，招兵买马拉起“义勇军”。一时，团长、司令多如牛毛，他们打着抗日的旗号，干着蹂躏、残害人民，干扰、破坏抗日的罪恶勾当。从1937年冬至1938年春，扰害高唐、恩县、夏津、平原、禹城等县的大股土匪、杂顽武装主要有二皮脸子(冯寿彭，原清平县人，旧军人出身，后当日伪长清县县长)、高粱楂(王化三，出身土匪，原恩县人，后任日伪恩县县长)、张八(张栋臣，夏津县人，民国初年即当土匪，曾在军阀张宗昌、日伪军刘配臣部任过职，后任国民党军石友三部暂编第八师师长，继续勾结日伪，和共产党、八路军为敌)、李九(李彩题，高唐县人，老土匪、青帮头子，是1928年5月4日破坏中共鲁北特委的首犯之一，后任日伪高唐县县长)、胖娃娃(李俊兰，原恩县人，青帮分子，老土匪。后任国民党军石友三部暂编第八师副师长)、程荆璞(禹城县人，先被国民党收编，后投降日寇)和白菊花(张子成，平原县人，兵痞，1938年夏投日，先后任日伪恩县和平原县县长)等。这时，在恩县旧城附近的土顽，除王化三以外还有一个孔宪圣(绰号孔三滚子)。津浦支队进驻恩县旧城以后，王化三对我军表示友好，愿意合作抗日，并派其子王桂华到旧城参加我党举办的抗日军政干校。而孔三滚子既和我军对立，又和王化三闹矛盾。为了争取、团结王化三，打击孔三滚子，津支用智取的办法，收缴了孔三滚子百余人的枪。5月中旬，陈再道指挥八路军主力一部，进入山东临清河西街。为策应主力作战，津支由旧城向南活动，牵制临(清)、夏(津)、清(平)交界地区的反动武装。5月26日，八路军六八九团、东纵二团和第五支队，在临清城南消灭伪军张殿卿部1000余人，有力地震慑了临清一带的伪军和土顽。以冯寿彭为首的“抗八联军”迅速瓦解，为中共地方党组织的活动和八路军继续东进创造了有利条件。

高唐的李九，既欠有杀害中共鲁北特委书记李春荣等人的旧债，又在张八的支持下，犯有勾结反动县长谋害地方抗日武装首领崔子固、吴子杰(已被张承先代表范筑先收编)的新罪。盘踞高、恩、夏、平、禹交界地区的李俊兰与其帮凶张八更是十恶不赦。李俊兰自称独立混成旅旅长，拥有六个大队(营)、两个小团(一个刚收编的，一个新建立的，实力相当于连、排)共1000多人，分驻平原四区大崔、梨园和五区柳庄、西黄庄、郑官屯、大白佛屯等土围子，虽然表面上接受范筑先收编，但实际上匪性不改。他不仅备有铡人的“龙虎铡”，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无恶不作，还和平原的日伪县长相勾结。张八部的1000多人，分驻平原五区的祖庄、崔庄和高唐的北镇等土围子，与李九、李俊兰南北呼应，沆瀣一气，严重地威胁着中共地方党组织领导的抗日活动，阻塞八路军东进破路的重要通道。

自5月底到6月初，李俊兰部到处搜罗口袋，准备强抢小麦。为了粉碎李匪的抢粮企图，

为当地党组织和人民群众除害，东进纵队司令员陈再道根据一二九师副师长徐向前“相机解决李九和李俊兰”的命令，令津浦支队消灭李俊兰。津支于6月6日进驻平原五区腰站。6月7日上午，津支一部用声东击西的战术，架云梯爬入大白佛屯土围子，消灭了李俊兰卵翼下的小寇团(寇宝成部)。午后，经过激烈交火，攻克西黄庄土围子，消灭李匪第三营之大部，其营长郑宝信(绰号郑大麻子)在率残部向柳庄逃命时被打伤。同日，还分兵突破郑官屯和小崔庄土围子，打垮了被李收编的小王团(头子王金榜，100多人)，收缴了张匪卵翼下的小张团的枪。接着，集中兵力包围了盘踞在柳庄大围子里的李匪主力第二营(营长李吉发，绰号二牛子)。柳庄大围子墙高而坚固，围濠宽且水深，李二牛子仗恃人多(近400人)、枪好、子弹足、工事坚固，负隅顽抗，固守待援，因而战斗陷于胶着状态。次日，陈再道指挥八路军七六九团(团长陈锡联)、六八九团(团长韩先楚)和第五支队(支队长曾国华)，由临清东进高唐、平原交界地区，增援津浦支队。6月9日，我军白天炮击柳庄震慑守敌，侧击张华赶跑李匪援兵，晚饭后采取攻三面留一面的战术，在轻重机枪和迫击炮的掩护下，向李二牛子发起总攻(津支负责攻打北面)。由于白天匪兵们已被炮声吓破胆，李二牛子也失去了往日的嚣张气焰，我军战士很快便由西面爬上柳庄大围子。顿时，匪军鬼哭狼嚎，仓皇弄开东门，象受惊的兔子一样，拚命往枪声稀疏的东北方向窜逃。其后尾刚到小围子东北角，前头即进入我伏击部队火力圈。顷刻，轻重机枪和步枪一齐射向敌群，匪兵们跑在前边的纷纷倒地，跑在后边的回头南逃当了俘虏。此外，窜出东门即由大小围子之间向北逃跑的数十人，跑到原恩县城南十里铺附近，被红枪会团团包围，全部死于枪刀之下。经过三天的战斗，李俊兰部被打死打伤200多人，俘虏160多人，缴获长短枪约400支，骡马数十匹。同时，在高唐城东北双庙尹集一带消灭了张八、李九各一部。由此，李九龟缩高唐城里不敢露头，张八、李俊兰成为惊弓之鸟，连夜率残部过铁路东逃。不久，我军又收编了平原五区近百人的地主武装。初步打开了高唐、恩县、夏津、平原、禹城五县的抗日局面。当月，在夏津城里建立了以张承先为书记的中共鲁西北特委，有力地促进了各县党员和党组织，以及党领导的群众抗日团体、抗日武装的迅速发展，为创建以平原五区为中心的五县抗日游击根据地打下了组织和群众基础，为孙继先、曾国华和肖华先后挺进冀鲁边区打开了通路。柳庄战斗结束后，正规部队迅即返回临清，津浦支队仍留原地区坚持抗日活动。这时，一些进步青年纷纷参军，津支很快发展成为两个营(二营长王吉文解放济南时任师长，在战斗中牺牲)，一个警卫连，共700余人。

同年6月，由于日伪杂顽的夹击，冀鲁边区形势急剧恶化，中共地下党组织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处境十分危险。为此，中共中央决定将这一地区划归北方局和一二九师领导(党政工作由冀鲁豫边区省委代管)，并调津浦支队和第五支队从夏津出发，经过平原城西南的腰站等村，于6月29日晚上，在平原城东南的姚屯车站(现林庄车站)附近东越津浦铁路，进驻平原城东北的马务等村。第二天继续向乐陵、宁津方向进军。我军尚在进军途中，夹击、围攻庆云、乐陵的日伪杂顽即闻风撤逃，冀鲁边之围随之而解。7月初，津浦支队和第五支队到达宁津、乐陵、庆云地区。当月，津支与五支队一起，在庆云县城(老城)西北的黑牛王庄，全歼反动武装刘颜臣部800多人。此后，又与五支队配合，在南皮(现属河北省)南部接近宁津、乐陵县境的莲花池、罗张、杠子张等村，打垮伪军穆金城部2000余人，从而扭转了冀鲁边区的抗日局面。8月，津浦支队和五支队一起西上破袭津浦铁路。破路后，津浦支队进驻宁津县城，用智取的办法生俘已暗中投日的宁津县长张伯荣、大队长张立志、公安局长吕子久等共500多人，并将张伯荣押解乐陵处决。9月27日，肖华率领八路军一一五师的百余名指战员到达乐陵。10月初，东进抗日挺进纵队正式成立(归一二九师指挥)，并整编了冀鲁边区抗日部队。在纵队司令员兼政委肖华的统一领导和指挥下，津浦支队(整编后有的称其为第四支队，仍属一二九师建制)向北进军，接连打了几个胜仗，开辟了东光、南皮、盐山、孟村等县的广大地区。袭击了桑园、连镇、七里店等火车站，迟滞了日军的铁路运输。同时，津支本身也得到了扩充和壮大，零星接收了很多新兵，又于8月2日接受宁津“抗日铁血团”负责人的请求，

将该部改编为津浦支队教导大队。到11月初，津支已发展到人员枪支齐全的三个步兵营、一个骑兵连，共1000多人。在攻打宁津城西赫庄之敌时，一营一连连长肖荣连负伤，二连连长白金荣英勇牺牲。

1938年11月13日，日军由泰安、东阿出动两个联队西上进犯聊城，聊城告急。为此，中央军委和一二九师电令津浦支队和青纵三团迅即增援。接电后，津浦支队提前结束在宁津县柴胡店地区的休整，昼夜兼程进军聊城，火速为爱国将领范筑先解围。不料，由于国民党顽固分子李树椿、王金祥的阴谋破坏和出卖，津浦支队刚到博平附近，青纵三团也未赶到时，日本侵略军的铁蹄已经踏入聊城，范筑先、张郁光、姚第鸿等将士壮烈殉国。之后，原以范筑先为司令的鲁西北游击司令部辖区内军队分裂，人心惶惶。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及时稳定人心和抗日局势，扶持范筑先生前所辖的抗日武装，继续坚持斗争，免遭日伪和国民党顽固派的消灭与吞并，协助中共鲁西和鲁西北两个特委恢复与开展工作，中央军委和一二九师决定成立八路军先遣纵队(属一二九师)，并调八路军青年抗日游击纵队(简称青纵，属一二九师建制)司令员兼政委李聚奎任先遣纵队司令员兼政委。李聚奎奉命到达鲁西北之后，于12月9日正式组成了纵队司政后机关。津浦支队、青纵三团、一二九师骑兵团以及冀鲁边游击支队(以张承先为书记的中共鲁西北特委组建的地方武装，简称冀鲁边支队或冀鲁支队)，在李聚奎的统一领导和指挥下，在南起聊城，北迄德县的广大平原上坚持游击作战。日军侵占聊城、临清以后，为遏止我军的抗日活动，派一中队日军和一部分伪军占据了清平县城。津浦支队为拔除这一钉子，在青纵三团的配合下，夜袭清平县城，全歼了东、西、南三个城门楼上的敌人。后因天将拂晓，敌人援兵赶到，我军主动撤出战斗，转移乡村，随后，残敌弃城逃跑。继李聚奎入鲁之后，为进一步加强鲁西和鲁西北的军事力量，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师，又令三八六旅旅长陈赓率六八八团(属一一五师建制，配属一二九师行动)和本旅补充团，于12月7日由冀豫交界地区起程，东进鲁西和鲁西北两特委辖区，统一领导和指挥八路军及其它受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部队。

1939年1月10日，为掩护三十二支队(中共博平县委组建的地方武装，约1400多人)集结，免遭国民党顽固分子的暗算，陈赓遵照师部指示，亲自指挥六八八团、津浦支队、青纵三团攻打高唐县城。按照作战部署，津浦支队部署在县城东面，负责打援，以防禹城之敌。夜11点开火，约12点基本上攻占高唐城。后因敌人退据中心据点，凭借强大火力，居高临下，负隅顽抗，一时不能攻克，激战约3小时，我军撤出战斗。11日拂晓，陈赓指挥部队全部转移到夏津东南部。这次战斗共击毙日军10余名，俘虏伪军10余名，缴获步枪10余支，横扫了县城周围的伪组织。13日，鲁西北特委直接领导的冀鲁支队也开到夏津。同日陈赓令其随津浦支队行动，和六八八团、青纵三团一起争做袭击恩县县城、破袭津浦铁路，配合冀南反扫荡的战斗准备。突然，师部电令陈赓改变原计划，并率六八八团于16日赶到邱县(当时属山东，党组织归鲁西北特委领导)、威县交界地区，进行新的机动。同时命令津浦支队、青纵三团进驻临清、夏津之间，相机策应各方行动。同月24日，冀鲁支队在临清境内正式升入津浦支队，整编为新一营，营长龙宗义，副营长曹丕堂，教导员彭天琦，下辖四个连，400多人。当时，为了策应陈赓歼敌，冀鲁支队继续随津浦支队老部队与青纵三团在临清一带活动。完成任务以后，返回津浦前线，仍以平原五区腰站为中心，战斗在高(唐)、恩(县)、夏(津)、武(城)、平(原)、禹(城)、德(县)边区。

2月10日，陈赓率主力一部，在紧靠山东边界的香城固全歼日寇一个加强中队，毙敌大队长以下200余人，活捉8人。14日，陈赓率主力移驻卫运河东岸，师部电令其全部南下冠县集结，执行新的任务。不久，陈赓带领主力西回冀豫交界地区，迎接、掩护陈光、罗荣桓入鲁。同月19日(农历春节)，津浦支队(已化名巴州支队，不含新一营)从冠县以南的莘县北上，返回齐(河)、禹(城)、高(唐)、茌(平)交界地区。21日，在禹城城南破袭津浦铁路，炸翻火车一列。随后，于一天夜间，在青纵三团(化名成安团)的配合下，对已向反面转化、教育争取无效

并部署部队和我军对抗的李惠民，及深受其影响的李连祥、吴春阳等三股土杂武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起进攻。经过激战，将李惠民部全歼，李惠民被击毙。消灭李连祥之一部，吴春阳部狼狈逃窜，缴获迫击炮一门，步枪数百支。李连祥挨打以后，表示愿意接受我军改编，改编后被任命为独立营营长(后又叛变)。3月4日晚上，津浦支队驻禹城县的陈武营，青纵三团驻在平县的许楼(现属高唐县)。同日夜间，鲁西区党委和先纵机关及先纵二团由鲁西冠县一带进驻在平的琉璃寺(现属高唐县)。3月5日(农历正月十五日)、拂晓前，先纵司令员兼政委李聚奎召集各部队负责人商讨行动计划，部署战斗任务。黎明发现3000多日伪军前来扫荡，随即令孙继先等回部队指挥战斗。孙继先赶回陈武营时，这里的战斗已经打响。从早晨一直打到黄昏，消灭日军200多人，缴获迫击炮两门。夜幕降临，津浦支队先让管理员李华珍带领部分后勤人员向北突围，迷惑敌人，接着，又由孙继先等指挥战斗部队乘机向南突围。同时，驻琉璃寺、许楼的鲁西区党委和先纵机关，以及先纵二团、青纵三团等也都胜利突围。此役，我军虽然消灭很多敌人、缴获一些武器，但也付出相当代价，鲁西区党委委员、秘书长赵伊坪和先纵二团团团长荆维德等同志不幸牺牲。

津浦支队在陈武营突围后，奉李聚奎之命渡过黄河(当时黄河已在河南花园口改道，河水很浅)，转移到泰西大峰山区。新一营未随支队领导机关行动，继续留在原地区坚持斗争。津浦支队到达泰西以后，在肥城地方党组织的协助下，攻克董家庄等日伪据点。3月中旬，陈光、罗荣桓率一一五师师直及六八六团(不含三营)，由鲁西南进入泰西地区。3月底，李聚奎率先纵二团、青纵三团、一二九师骑兵团，赴太行山区执行新的任务，留下津浦支队归陈光、罗荣桓直接指挥(仍属一二九师建制)。4月22日傍晚，津浦支队新一营从平原县境出发，到德县县城与黄河涯之间炸毁铁路数百米。次日拂晓，转移到高、平、禹交界地区的常、赵二庄。天一亮，千余日伪军分别乘汽车、骑洋马和步行，将新一营包围，日军用机枪、大炮凶狠地扫射和轰击，我军在群众的积极支援下，凭借围墙与民房英勇顽强地予以还击。战斗到下午5点左右，新一营打退敌人的八次进攻，自身伤亡30余人(包括连长和正、副指导员各一名)。最后敌人增兵500多人，一次又一次地施放毒瓦斯，所以新一营不得不在敌人调整兵力发动第九次总攻时，提前(原计划到天黑)由敌结合部分路突围，并决定夜间赶到平原五区腰站。当部队到达第一集合点时，营首长召集各连连长、指导员开会研究，认为腰站地处要冲目标明显，敌人很可能跟踪而至，决定改驻平原五区西窑上村。第二天，敌人果然跟踪而来，直扑腰站。在敌人忙于包围腰站之际，我部队化整为零，在广大群众的掩护下，依靠村庄和交通沟，与日伪军进行周旋。结果，日、伪军一无所获。日、伪扫荡之后，新一营分散到平原五区各个堡垒村庄，协助地方党组织宣传发动群众，开展锄奸、破路等抗日活动。5月，支队部派李春健(原恩县人，1938年春任津浦支队参谋)回平原五区，将新一营接到泰西大峰山区同支队部会合。

1939年5月11日，在八路军一一五师代师长陈光的统一指挥下，津浦支队同六八六团等部队一起，在肥城的陆房地区，凭险据守激战终日，打退敌人九次进攻，毙伤日、伪军大佐联队长以下1300余人，粉碎5000多日伪军的九路围攻，突出重围。同月，中央军委和十八集团军总部决定组建八路军第一纵队，由徐向前、朱瑞分别担任司令员和政委，统一指挥活动在南起徐州，北至沧州广大地区内的一一五师和山东纵队等八路军部队。6月7日，徐向前、朱瑞等从冀南来山东，津浦支队奉一二九师之命派老一营进行护送。老一营随徐向前等到达鲁中后，被留在八路军第一纵队总部，脱离津浦支队建制。

同年9月18日，津浦支队奉命由鲁西进军鲁南，途中在宁阳县杏山庄遭日军包围。支队部警卫连首先抢占山头，激战到天亮，全连只剩10余人。新一营顽强战斗一天，不仅伤亡很大，营长龙宗义失踪(以后定为牺牲)，还有一些指战员因和部队失掉联系，返回鲁西北家乡(多数又参加了当地的抗日斗争)。天黑，新一营将集中起来的部队缩编成一个连突围，当晚东越津浦铁路，开往鲁中南地区。

11月4日，奉十八集团军总部命令，津浦支队脱离一二九师建制，改属山东纵队。1940年2月，津浦支队与山东纵队第二支队合并，合并后称山东纵队第二支队，孙继先任支队长，潘寿才任政治委员。至此，八路军一二九师津浦支队完成了其历史使命。



夜袭阳明堡的769团勇士们

护送黎玉赴延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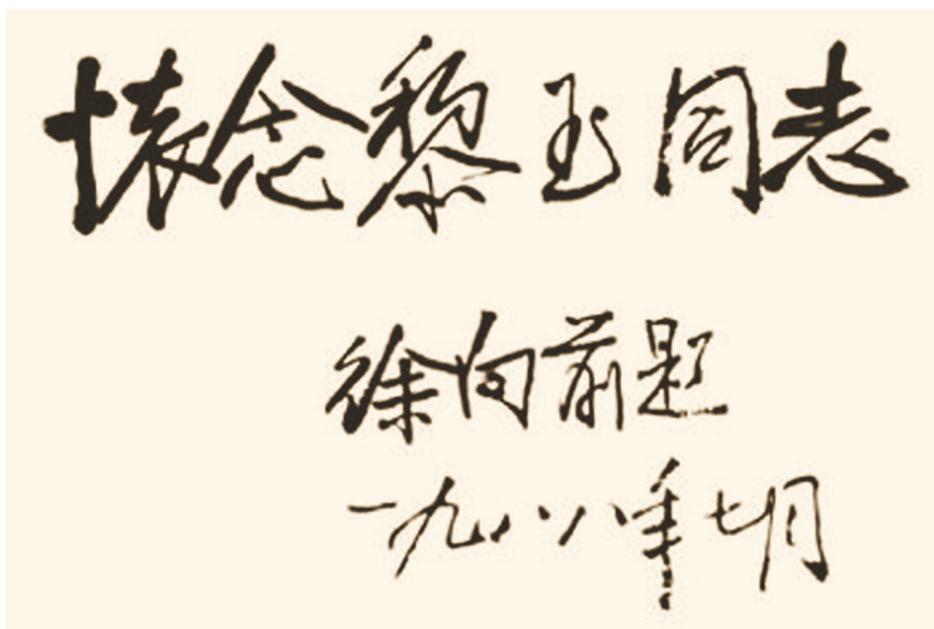
鄧润清



1938年2月下旬，中共山东省委刘杜会议结束之后，四支队即兵分南北两路：以省委机关、四中队机关及一、三、四中队为北路，由司令员洪涛、政治部主任(后为政委)林浩率领，去莱芜、博山、章丘一带活动；以二、五中队及省委机关部分工作人员为南路，由政委黎玉、副司令员赵杰率领，去新泰、蒙阴、泗水、费县一带活动。

当部队到蒙山前时，我们发现山下有个万寿宫，在这个寺庙里，住了100多名四方云游的道士。寺庙周围，都是青松古柏，嶙峋怪石，再加阵阵松涛，潺潺流水，风景优美宜人。部队在这里驻下之后，黎玉政委找我谈话，要我做警卫员，跟他到延安向中央汇报工作，请求派干部来山东。我一听非常高兴，连忙说：“我去，我去！”

3月8日，黎玉政委身穿大褂，头戴礼帽，化装成一个教学的先生。冯平同志打扮成教员，是他的助手。我打扮成老百姓，是他的随从。还有两位化装成农民的警卫人员。我们一



行5人，从万寿宫出发，直奔台儿庄。走了不到两天，黎玉政委脚上磨起泡走不动了。他很着急，问我怎么办。我说：“花两块大洋，买辆独轮车，我推着你走。”黎玉政委听了有点犹豫。我赶忙恳求说：“政委放心，我保证能行！”经再三劝说，他终于同意了意见，买了辆木头独轮车。黎玉政委坐在车上，我推，两位警卫人员拉，走得更快了。

几天之后，我们越过台儿庄到达徐州，偷偷爬上了西去的火车，火车就顺着陇海线奔驰，高山、丘陵、沟壑、隧洞飞奔而来，又飞速逝去。大约走了两天两夜才到西安。

西安有咱们八路军办事处，林伯渠同志在那里负责。黎玉政委向林伯渠同志汇报了工作后，办事处让我们等候去延安的通知。

在西安住了大约10天，一天早上，办事处的同志引我们搭乘一辆装载大米的汽车，直奔三原县城。三原是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分界线，我们从三原下车后，就爬山越岭，日夜兼程，奔赴延安。到4月2日，我们终于到达延安，住进了党中央招待所。

到延安后，黎玉政委去党中央汇报工作，我们没事干，就各处走走看看。党中央负责同志王稼祥、洛甫同志听说我们是山东来的，主动和我们交朋友，每逢看见我们，就热情地招呼：“山东小老弟，来啦格啦格哟。”我们就走过去和他们交谈。他们问我们的姓名、籍贯，问山东抗日游击队的情况，问山东老百姓生活风俗习惯。我们就将所见所闻，无拘无束地告诉他们。

在延安期间，党中央领导人作报告或开群众大会，我们都去参加。毛主席作报告，听懂的人都说好，不断被掌声和笑声打断。可惜，我听不懂毛主席的湖南话，实在是太遗憾。延安有个鲁迅艺术剧院，每天晚上都演戏，我们天天晚上去看。

黎玉政委汇报后，党中央同意了山东省委的要求，决定派郭洪涛同志率领一批地方干部和军事干部到山东开辟工作，并携带两部电台和医疗设备。这批干部主要有霍士廉、段君毅、王文、杨国夫、钱钧、王彬等50人左右。黎玉政委和冯平同志没有同我们一道回山东，而是去武汉到长江局，请罗炳辉来山东做军事总指挥。后因情况发生变化，中央派张经武来山东任职。

4月下旬，我们从延安出发返回，我既是警卫员，又是向导。5月20日，我们回到了山东省委驻地泰安市南卜庄。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指引下

——怀念抗日时期的张里元将军

何志斌 高来宾 王义琛



张里元

张里元是鲁南地区与中共抗日武装团结合作坚持敌后游击战的爱国将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的指引下，我们曾在他的部下抗击敌寇，卫国保民，度过了长达8年的艰苦而难忘的岁月。1944年6月22日，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在延安招待中外记者参观团时说，山东张里元、赵保原部是华北、华中战场坚持在敌后“不择手段地求得自己的存在”的三部分地方军队之一。这是对张里元及其所部的最公正的评价。

张里元是山东定陶人，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与何思源同学。他秉性刚直，待人宽厚，生活俭朴，一生清廉。在上世纪30年代国难深重，外祸日亟之际，他投笔从戎，曾在冯玉祥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部任军法官。1933年冯玉祥下野后，张先后任山东省文登县、沂水县县长。其时，沂水县境土匪出没无常，抢劫掳掠，人民不得安宁。张在任期内公正清廉，关心民间疾苦，为了肃清匪害，他不辞劳苦，亲率保安队搜山剿匪，安抚百姓，使沂水人民得以安居乐业。因其政绩卓著，有“模范县长”之称。1936年以后，升任山东省第三行政区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并兼任临沂县长。该专署下辖蒙阴、日照、沂水、莒县、临沂、费县、郯城、峯县（现枣庄市峯城区）八县。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揭开了抗日战争的序幕。济南被日军占领后，李宗仁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兼徐州前线总指挥，委派张里元为第五战区第八游击司令。张对国民党蒋介石当局不积极抗日，曾公开指责。特别对山东省主席韩复榘，拥有10万大军不战而弃山东，极表愤慨。于是挺身而出，抱守土有责、誓与城共存亡的决心，动员所属各县民众团结抗日，在鲁南竖起了一面抗日救亡的大旗。

1938年3月间，日寇坂垣师团向临沂进犯。张里元率特务营和保安一、二团与国民党第五十九军（军长张自忠）、第四十军（军长庞炳勋）三军配合，在临沂城周围血战。临沂之役，战斗相当激烈，毙伤了大量的侵略军，给日寇严重打击。同时，张以地方专员的名义，积极发动民众支援前线，供应食物，运送弹药，抢运伤亡官兵等。军民合力，工作得很出色。接着部队奉命转移敌于台儿庄地区而聚歼之。虽然我军也伤亡惨重，却狠狠地杀伤了来犯的日寇有生力量。

二

正当1938年日军向临沂疯狂进犯、战争激烈进行之际，我们以蒋介石撤销韩复榘第三路军总指挥名义，改组了高来宾所在的军事教育团（何志斌任教育团第二队少校队长），归新任命的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孙桐萱统率。教育团的学生、教官800余人大多不愿继续留团里，纷纷各奔前程。何志斌因久闻张里元在敌后坚持抗日的声望，就与郝云溪、高来宾等五个志同道合的教官和队长，一起由山东省曹县赴临沂投奔张里元。我们翻山越岭到了临沂，张里元司令接见了我们。何志斌问张司令是否继续在临沂敌后抗日。他斩钉截铁地回答：“身为国家官员，守土有责，不收复失土，何以见山东父老！”我们深受感动，对他说：“我们是学军事的。张司令有此决心，我等愿在您领导下共同抗日！”他极为高兴，委任何志斌为抗日第八游击司令部独立营营长，高来宾为副营长，拨新兵1700余名。何和高二人配合得很好，在临沂会战中就奉令到费县梁邱练新兵。

1938年初秋，张里元派独立营由梁邱开往蒙阴县十二连城驻防，以阻防日寇向蒙阴县境侵犯。7月间，共产党抗日第四支队开到蒙阴县西常马镇，欲挺进沂蒙山区，但受到当地大刀会的阻止。何志斌闻讯后，亲赴四支队与负责人郭洪涛（司令）、林浩（政委）、王彬（参谋长）面商办法，由何志斌去做大刀会的思想工作。大刀会乃让路给四支队，使其顺利挺进到沂蒙山区，建立抗日根据地。

1938年秋，张里元命独立营由蒙阴十二连城开往临沂西南张家沟村驻防，维持地方治安。9月间在我防区的爱曲村伏击由临沂开往枣庄的日军，打了一次胜仗。打死打伤日寇20余名，击毁汽车1辆。独立营阵亡连长1人、士兵5名。这是继台儿庄大会战胜利后，独立营在鲁南第一次伏击日寇获胜的纪录。驻扎在张家沟附近兴明集的八路军第四团团团长张光中特派政治部主任朱道南带酒肉前来慰劳。

张里元主张国共合作共同抗敌。在他的支持和影响下，何志斌去兴明集回访了八路军四团。张光中团长留何午餐。席间，张团长与政委李乐平、政治部主任朱道南等与何谈了今后两军合作抗日的策略。不久，两支部队配合在临沂西南公路上的何庄伏击日寇，由独立营埋伏，八路军四团打侧。此战获胜后，日军从此未敢出动。

三

1938年后，国共摩擦加剧，关系恶化。张里元对蒋介石的反共军令阳奉阴违。他继续与八路军张经武及徐向前司令、中共山东省主席黎玉经常联系，配合得较好。早在1938年初坚守临沂战役时，张里元与中共鲁南地区地下党负责人郭子化、朱道南（中共发起组织的抗日救国教师联合会负责人）、谢辉等就有联系，共同协商动员民众，组织抗日力量慰劳抗日部队等事。临沂失陷后，张里元又与中共在朱满等地共商开展敌后根据地工作。到1938年夏至1939年间，八路军派郭子化来第八抗日游击司令部联系（此时我营的番号已由独立营改编为山东省第三专署二团一营），阐明中共合作抗日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进一步引导张里元部队与八路军密切合作，共同对敌。八路军为了表示合作的诚意与对张里元的支持，把八路军第四团划归第八抗日游击司令张里元指挥。所以当时虽然国共两党关系紧张，但在鲁南，我们两军相处仍很融洽。

1939年1月11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任命于学忠为苏鲁战区总司令，沈鸿烈为副司令兼山东省主席。4月30日沈鸿烈提出破坏抗日的三个反共口号：“宁匪化，勿赤化”、“宁亡于日，勿亡于共”、“日可以不抗，共不可不打”，张里元对此进行了暗中抵制。张里元在费县办的一所培养抗日骨干的干部学校，即抗日军政训练学校，校长潘某，其中政工人员全部请共产党人担任。先后在费县城、费县上冶东岭办了两期。沈鸿烈知道后，就向上级控告

张里元办的学校是“带红帽子的学校”，迫其解散。张里元为了不让国民党抓住辫子，在解散干部学校时，把原在干校的政治教官都派到他的第二旅旅部，建立旅政治部，由共产党员担任政治部主任。有一天，张里元对其部下说：“沈鸿烈说共产党部队不抗日叫我们打共产党，消灭八路军。可是共产党是和我们一致抗日的，为什么要消灭八路军？”“我们非但不打共产党，而且要更进一步与八路军紧密团结，共同抗日到底！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他们要诬告我，就让他们去告吧！”后来，因沈鸿烈继续施加压力，张里元只好请中共把调来二旅搞政治工作的共产党员全部调回八路军。

1938年秋冬，张里元为了建立游击根据地，把司令部由费县转移到了沂水县城里。沈鸿烈闻讯，命国民党第四师师长吴化文开来沂水要消灭张部。张里元与吴化文都是冯玉祥的旧部属，当吴化文师进至沂水八里洼时，派人通知张里元，大意说：“沈主席以你与八路军有勾结，要我来消灭你部，我不得不来。盼派员来商善后。”张里元考虑到何志斌也是冯玉祥的旧部，就派何为全权代表赴八里洼与吴化文谈判。那时，何已是张里元司令部的特务团团团长兼沂水县保安团副团长。何志斌曾于1934年春吴化文任山东韩复榘的手枪旅旅长时，做过该旅某连连长，而现在吴化文新四师师部的参谋长、参谋等，不是何的老师就是学生。何志斌在吴化文师部受到热情接待。住了几天后，吴化文对何说：“震环，你回去对里元说，把司令部撤离沂水县城，就算我完成了使命，可以向沈主席交差了。”何回去复命，张迫于形势，当即撤离沂水县城，开往沂水西南依汶庄一带。

张里元部被沈鸿烈强迫开到沂水西南地区后，与八路军的联系更密切了。只是不象以前那样公开。八路军四支队开进岸堤办一所培训干部的学校。张里元应聘任副校长和讲师，多次应邀去该校讲话，或讲抗日形势，或讲当地情况。张里元为提高士兵政治军事素质，请中共山东分局和八路军山东纵队派共产党员童陆生担任副司令兼训练处处长，共产党员狄井芴为政治参议和政治联络室主任。张派何志斌为军事室主任，高来宾为副主任。对士兵进行抗日救亡教育和军事训练，以增强部队思想、组织、军事建设。张里元同当时共产党领导同志张经武、黎玉、朱瑞、郭洪涛经常互访，交换意见。还选派有志青年去岸堤干校学习，学后回部队工作。我们与童陆生、狄井芴等共产党人朝夕共事，关系融洽，他们身行言教，艰苦踏实的工作作风，给我们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1939年初夏，日寇以鲁南国共抗日力量发展壮大，受到威胁，就集结了几个师的兵力，陆空炮兵配合，向鲁南地区大扫荡。张里元即率司令部直属处室和部队及前来帮助建军的共产党员等转移到沂蒙山，命何志斌指挥特务四团，把日寇的扫荡部队诱向费县方向。张部转移到蒙阴东北山区一百零八亩，与八路军郭洪涛司令会师，共同行动，同村居住，共渡难关。何志斌的特务四团在执行诱敌任务时，于某日早晨8时，被日军疯狂追上。何团强占铁峪山山头，居高临下，阻击日军，敌以山炮猛烈轰击，掩护步兵进攻。激战半小时，双方均有伤亡。何团因众寡悬殊，不得不向费县北山区撤退。敌寇派空军扫射，派步兵搜山，迫使何团越过费县北沙河，于次日拂晓赶到梁邱村，八路军张光中团长派员前来热情慰问，还送来了一头猪。

四

何志斌不但训练新兵有一套，带兵作战也颇有办法，在日寇夏季大扫荡中，英勇奋击日军，因此张里元对何志斌倍加青睐。1940年初，张里元命何在沂水西南李庄一带，协助张里元收容在日寇“大扫荡”中被击溃的地方武装组成的“九旅十八支队”的散兵和山东省保三旅、保九旅等剩下的官兵数千人，编为“鲁苏战区游击第一纵队”，另以何团官兵为基干，拨数百人编为纵队补充支队。张里元专员仍兼第一纵队司令，司令部转移到莒县的上芦沟村，下辖三个支队和直属特务团、警卫部队以及参谋、军需、秘书等处室。何志斌任第一支

队支队长；郝云溪为第二支队支队长，高来宾为支队副，驻莒县一带防击台淮公路上官帅、招贤之敌；孙业宏为第三支队长，驻临沂西南地区。在三个支队中，进驻临沂层山一带的第三支队系改编地主武装组成，加上国民党派来的纵队副司令朱耀东的暗中煽动，他们曾多次与共产党部队闹摩擦。张里元一经发现，即下令制止，以保双方的抗日力量。纵队成立后，张里元即命何率补充支队至鲁西定陶等县招募抗日新兵，途中经过八路军防地时，受到热情接待。

当何志斌行至鲁西南成武县境时，突遭日伪军截击。在近郊展开遭遇战，激战约一小時，打得日伪军狼狈逃回县城，敌军伤亡十余名。此后，我部与驻地八路军加强联系，在八路军全力支援下，我部在鲁西、定陶、曹县、菏泽等县展开游击活动。在三个月时间内，转战鲁西苏北一带数千里，打击敌寇扫荡。使日伪军龟缩在县城内，不敢出来窜扰。

1940年秋，张里元命何志斌率补充支队去日照县建立海滨根据地。何部由沂水县境翻山涉水开到日照县西北境内的丰台村，把支队部设在日照西北的汤家沟，部队分驻在日照县街头一带村庄。从此，何部在日照县建立了游击根据地，与共产党日照县抗日民主政府负责人刘鸿若秘密商议了分区防守、合力抗日的协议，在驻地领导人民发展盐业、农业生产，保卫地方安宁，在日照坚持了三年的抗日游击战争。在这三年中，何部先后出击日伪军达数十次，闹得日伪昼夜不得安宁。战果较大的一次是1942年2月25日粉碎日伪的扫荡，击毙日军少佐其胜次，日伪军伤亡70余名。

1940年，国民党从后方派饶岳生以特派员身份到张里元纵队司令部做政治部主任。饶千方百计抓权，自兼参谋长，又借故第一支队长卢连章贩卖桐油，将卢撤职。张里元派何志斌接任第一支队长。1942年春，何部在日照击毙其胜次后，举行祝捷大会兼追悼抗日阵亡官兵。饶在会上号召反共，强迫部属集团加入国民党。张里元识破饶岳生的企图，就与骨干密商并设法“劝走”饶岳生，仍然与中共保持联系。

1943年秋，张里元接到共产党山东分局负责人朱瑞来信。信中说，为打通滨海通道，要求张把驻在日照沿海一带的部队撤出，以免发生冲突。张立即邀集何志斌和其他军政负责人举行紧急会议，决定放弃滨海地区，命何志斌把驻在日照、莒县的部队全部撤出，同全纵队各部一起转移到临沂西南兰陵以南大小良壁等村。

五

1944年春，国民党军政部任命张里元为鲁南军区司令官兼陆军第三十六师师长，下辖三个团。将第一支队编为第一团（团长刘振纲），第二支队编为第二团（团长李作范），特务团团团长王义琛仍属军区司令部，将第三支队改为补充团（团长孙业宏）。另收编原临沂西南乡地方所谓抗日队伍扩编两个纵队，成立为山东省抗日挺进军司令部，张里元兼司令，辖第十二纵队和三十二纵队。委何志斌为第十二纵队少将司令，郝云溪为三十二纵队少将司令。

第十二纵队下辖三个支队，并指挥第三十六师第一团。那时，抗战已进入后期，日军士气逐渐低落，一般只是固守据点，不敢轻易出动“扫荡”了，而我军抗日士气则日益高涨。在这种形势下张里元与驻在北面的八路军继续密切联系，尽力保持友军关系，防止可能发生的冲突，并联合一切抗日力量，对付台儿庄、临沂、枣庄的日伪军。对南面江苏邳县的日伪军，采取防击结合的方针，西防日军窜扰，南对郝鹏举伪军进行打击。

1945年夏初，为了打通鲁南到江苏淮河走廊，使鲁南到江苏的陇海铁路以南的新四军防区连接起来，中共鲁中南军区要求张里元率部撤离淮河两岸驻军防地。当时张部与当地群众关系有一定基础，全军上下不愿撤离防地。但张里元为顾全抗日大局，还是命令部队撤离淮河两岸向枣庄山区行进，并连夜抢渡台儿庄以东运河向河南方向转移，行军至徐州北的微山湖南边。

徐州大汉奸郝鹏举闻讯，当即派一中校参谋来军区司令部劝降。张里元痛斥了汉奸卖国贼罪行，表达了抗日的决心。郝鹏举劝诱不成，恼羞成怒。第二天即由徐州调来大批伪军企图歼灭张里元部。张里元连夜率部冲出郝伪军的包围，向江苏铜山县转移。翌日在铜山县又遭日伪军袭击。由于人地两生，立脚未稳，在日伪军突然袭击下只好四面突围。这次遭遇，部队被冲散了，军马全部丢失，被冲散的队伍经集结只剩千余人了（以后又陆续归队千余人）。这样，张里元只好回军肖县北部距徐州40余里的陆庄暂驻，并在肖县群众的支援下修建土围寨，准备固守伺机出击敌人。想不到修寨动工不数日，日本帝国主义就宣布无条件投降了。

六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为摘取胜利果实，命令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下令，调张里元率部开赴山东临城驻防，负责维护滕县南至韩庄北的铁路沿线，防范八路军“侵入”接收，并监视日本军待命受降的一个团的行动。

不久，国民党军李延年（兼山东省主席等职）以张里元在鲁南暗中与八路军有联系，挟嫌撤销了张里元的鲁南军区司令官兼陆军第三十六师师长职务，降为山东省第一专署专员（不久专员也撤掉），只留一个特务团（团长王义琛）给张里元，进驻兖州。其余部队交何志斌（第十二纵队司令）整编。一个月后，国民党陆军第十九集团军又下令，将第十二纵队归该集团军指挥。这样，我们和张里元在鲁南敌后坚持战斗了七八年的部属关系与战友情谊，就被完全隔断了。同年11月，国民党十九集团军命第十二纵队开驻陶庄煤矿，控制该地区，严防新四军活动。这以后，风云变幻，几经曲折。第十二纵队于1948年9月19日在济南前线起义，后被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五军，何志斌任该军一〇五师师长，高来宾为师参谋长，并奉调南下参加了淮海、渡江、解放南京诸战役。1946年初，何志斌有幸在滕县东南木石村的新四军军部，受陈毅司令的约见。陈毅司令员一见面头一句话就说：“张里元部在鲁南坚持抗战，很好。”但张里元在国民党时期未被重用，解放后又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何志斌与高来宾曾向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市公安局反映张的情况，张里元、李慧淑夫妇的历史反革命一案才由政府予以平反。

张里元以一介书生，在民族危机深重之际，毅然投笔从戎，知难而进。在国共第二次合作时期，不论顺境逆境，保持了在任何艰难复杂的条件下与中共合作，与

日伪汉奸势不两立的爱国节操，坚持了一条与中国共产党人携手并肩团结抗日的正确道路。张里元一生以爱国主义教育青年，训练部队，要大家学习民族英雄岳飞、文天祥。我们在他属下抗战八年，他没有下过一次打共产党部队的命令。张里元是坚持鲁南敌后抗日游击战的爱国将领。我们谨以此文，表达我们对他的敬重与怀念。



抗战时期张里元所书“为国捐躯”残碑

夜读《王献堂年谱》有感

心向清风



王献堂（1896—1960），号风笙，以字行，日照韩家村人。曾任山东省立图书馆馆长、中央国史馆副总纂修。长于金石文字、版本目录之学，对诗、书、画、印也有较好的功力。王献唐生前著述颇丰，如《山东先哲遗书》、《国史金石志稿》《山东古国考》、《中国古代货币通考》、《古文字中所见之火烛》、《春秋邾分三国考、三邾疆邑图考》，但大部未曾印行。今有《王献唐遗书》刊行。

一

1926年，王献堂始研求治印，尝与弟子崔君论印云：“世人治白文印竟言秦汉。秦与汉不同，西汉与东汉又不同。鲁人能作真西汉印者，唯一桂未谷；东汉印者，唯一王西泉。世人治朱文印又竟言师松雪。松雪但求清整。清整不难，难在朴茂于秦汉之间，流美于机杼之外。”

清风按：王献堂于印学发展之源流熟然于胸，于桂未谷（即曲阜桂馥）、王西泉（即潍县王石经）之篆刻尤所推崇！

二

1930年10月，王献堂在复傅斯年书中，谈及拟编辑《齐鲁先哲遗书》，信中说：“内容略分数门，尤偏重金石小学。以此事在山东方面，为陈簠斋（即潍县陈介祺）、刘燕庭（即诸城刘喜海）之于金石，王菴友（即安丘王筠）、桂未谷、许印林（即日照许瀚）之于小学，丁以此（日照丁惟汾之父，字竹筠，许瀚弟子）之于古韵，皆卓绝一世，尤应及先表扬。献唐所最注意者，为牟陌人（即栖霞牟廷相）、许印林两家。”

清风按：王献堂拟编辑之《齐鲁先哲遗书》，因日寇侵华而不得其成，但抗日期间其保护山东图书馆之珍贵图书文物功莫大焉，今之《山东文献集成》才得抢救保存山左先贤遗著，遂成迄今为止最大之地方文献丛书。

三

1937年9月，王献堂为《山东省立图书馆善本书目甲编》作序。提出自己的“善本观”：“世稀之本，可谓孤本异本，不可尽谓善本。善本必如汉隋唐宋，以写刻校勘定之。舍是而言早晚，宁非请诬罔？”又批评好宋本者是“论迹则贱近贵远，究实则重少轻多，此皆好事者所为，非真知灼见者。”

清风按：此虽论古籍之言，用之字画亦是不二规律，于名人字

画偏求其稀奇古怪，而不论其水平高低、意境有无，此正是王献堂所批者！

四

1947年六月，王献堂在协和医院作开颅手术。术后，寓北平，作《双清图》曰：“病后腕弱，力不从心，……尚不甘为青藤门下走狗也。”

清风按：假设王献堂能专心于书画，未必不能跟徐青藤一样名留书画史，但历史赋予他更神圣之使命却不在此，在于考古、史学、金石文字、版本目录、小学音韵等。

五

1949年12月，四川解放。李义贵（抗日期间跟随王献堂和屈万里保护山东图书馆珍贵图书文物南下之工友）即向当地专员请示有关山东省立图书馆运川书籍的处置问题。王献堂就此事亦上报山东古代文物保管委员会。

清风按：从1937年10月，到1949年12月，李义贵就一直伴随着那批珍贵的南下图书文物，从济南而曲阜而汉口而宜昌而万县而重庆而乐山，历经艰难困苦，甚而险丢性命，甚而经费难以为继时靠帮工或摆地摊维持生计，但他始终与那批“珍宝”同在，他的名字将与王献堂、屈万里一样不朽！

六

1957年，王献堂作红梅扇面，王统照为之题诗：

铁骨冰胎古艳姿，冷欺霜雪破胭脂。
莫言枯干闷生意，老树著花无丑枝。

清风按：此正是王献堂老晚年多病尤不辍笔耕，勤奋研究之写照！



王献堂书札

老城夜话

(连载)

刘家骥

展书堂错杀黑脸 韩复榘怒斩人妖

临沂近代史的匪患始于民国五年（公元 1916 年）。该年 2 月，抱犊崮股匪王为等开始劫掠，后来逐渐形成多股土匪，至上世纪 20 和 30 年代匪患达到高潮。著名的有横行中国北方数省的刘黑七（刘桂堂），在本地区有名的女匪赵妈妈。很多到现在只知其混名而不知其真名了。这些土匪到处绑票劫掠，无恶不作。

有个绰号叫张黑脸的匪首在上世纪 20 年代横行乡里到处抢劫。虽然多股土匪被政府军队围剿和农民联庄会打击消灭了，但张黑脸股匪却一直未被消灭。于是政府施行安抚政策，想招安他。政府得知他对父亲十分孝敬，于是派人去沭河东将他父亲接来县城，然后通知他前来接受招安。这招果然有效，张黑脸迅速解散了土匪武装，只身前来投诚。可惜他失算了。原来他并未到县城，而是就近到了相公区驻地投诚。这相公区的区长一心要得到当年悬赏捉拿他的赏钱，于是假装欢迎，用酒将他灌醉捆上，押着他到县城去领赏。张黑脸被押到八十一师师部，师长展书堂亲自审问。张黑脸见到展书堂后连称冤枉，说自己是前去投诚的；而押送者却称是捉拿的。这展书堂是个老粗，听信了押送者的话，不由分说将张黑脸打入大牢。知情者皆为其鸣不平，皆道张黑脸是孝子，的确是为其父而投诚的。在牢房里，狱卒们还和他结拜为兄弟。张黑脸知道自己日子不长了，于是告诉狱卒他还有埋下的钱财，让狱卒取出分用。狱卒取出后每天和他一起吃喝。张黑脸被处决时一路上高呼冤枉。行至今沂州路南段的福记京货店时停了下来，狱卒向店老板肖思九说犯人要几件东西：一顶礼帽，一床俄国毯子，一丈红绸，店老板一一照付。事后人们评说：“展书堂错杀黑脸，肖思九仗义疏财。”

民国二十二年（公元 1933 年）11 月，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前来临沂视察。为了显示他是清官，韩下令不准招待，不参加宴请。他还亲自“坐堂问案”，诏告百姓有冤者他会给予伸冤，一时间多年的积案苦主皆来喊冤。韩复榘每日坐在原知府大堂上断案，但有些案件仅凭问话很难破案，自己又不好收回成命。正在骑虎难下时，发生了一件奇案。城西乡岗头三岗店一带来了一个年轻尼姑，自称会给妇女治病，还会教妇女做针线。这尼姑在附近各村到处游走，其特点是不接触男人，只找妇女，在一处住得时间不长就离开。这天“他”在三岗店住在一老年妇女家里。一次，老年妇女发现这尼姑在厕所站着小便，觉着蹊跷，便告诉了村民。村民们把尼姑捉住，发现竟是一个男人，于是将他暴打一顿押解进城。可巧韩复榘正在升堂问案，马上接着审问。首先让法医验明确是男性，

然后问他姓名籍贯，这骗子只是一言不发。韩复榘大怒，动了大刑，这骗子还是不开口，只从他身上搜出了不少钱财。村民告发，他既骗色又骗钱。因《聊斋志异》上有一“人妖”的故事与此近似，于是将这个骗子当“人妖”罪处决，押到南关外斩首。韩复榘也以断此案“英明”落了个“清官”的虚名，就此结束断案回了济南。

范筑先说唱戒烟歌 李善全贩毒遭恶报

范筑先在临沂任县长时禁毒是非常有名的。他的手段是教育和惩罚相结合。他首先处决了一个鸦，接着又办起了戒烟所。他的另一手就是大搞宣传。他让临沂县民众教育馆组织人画禁烟的宣传画。城内西门里有一个张扎彩，曾给寺庙画过壁画。范筑先就请他在四城门洞和八小集巷北首路东的墙上画了“苦海无边，回头是岸”的戒烟宣传画。他又命民教馆用文艺节目的形式宣传戒烟。这民教馆中有一位范持九先生甚有文艺才能，他编写了《戒烟歌》，范筑先看后十分欣赏。于是让他在正月十五城隍庙会上演唱。在城隍庙的戏楼上，范筑先亲自主持节目演出，他首先向大家讲了禁食鸦片的重大意义，然后就请范持九演唱《戒烟歌》。这范持九手执渔鼓和拍板走上前台，首先念了四句诗：“西国进来一女流，一朵粉花插秀头。王孙公子亲一口，倾家荡产入下流。”接着说道：“大家尽管听书，我说书不收费。”指着范筑先说道：“这说书钱全由我当家子给包了。”台下一阵哄笑。他接着开始唱道：都说吸鸦片不好，我今天却要说说它的十样好。打了一阵渔鼓接着唱道：

吸大烟头条好，不纳粮不纳草，抗官吗？——土地卖没了。
吸鸦片二样好，爹不骂娘不吵，孝敬吗？——早都气死了。
吸毒品三样好，妻不怨儿不闹，和睦吗？——早已带子改嫁了。
吸老海四样好，蚊不叮虱不咬，仙体吗？——瘦得少血无肉了。
吸芙蓉五样好，走起路来似云飘，得道吗？——瘦骨如柴了。
吸寿膏六样好，不用上班不签到，有功吧？——早被开除了。
吸烟泡七样好，烟不熏火不燎，卫生吗？——早已断炊了。
吸红丸八样好，不出门不起早，享福吗？——上了烟瘾了。
吸老土九样好，一件单衣代棉袄，节约吗？——棉袄卖没了。
吸云膏十样好，屋不漏墙不倒，坚固吗？——老屋早已易主了。

这范持九将“十样好”唱罢，接着说：各位听众，在下所说的这十样好是十分可怕，奉劝在场的如有吸食毒品的，赶快去戒烟所戒掉，范县长爱民如子，亲自捐款配制戒烟药给戒烟者免费治疗。这时台下一阵掌声。此后，这《戒烟歌》又在其他庙会 and 集市上多次演唱并印成传单广为宣传。因这《戒烟歌》十分动人，故在民间一直流传至今（此戒烟歌由范持九的女儿范雪轩口述）。

临沂城当年有个奸商名叫李善全。此人只顾个人发财，全不顾民族利益。“九一八”事变以后，全国人民都抵制日货，临沂也不例外。爱国商人皆自觉执行，而这李善全却乘机想发国难财，他大量购进了日本洋纱。这时老五中和三乡师的学生上街宣传抗日，抵制日货，得知李善全私卖日货时便对其进行教育，劝他交出日货。李善全拒不交出，愤怒的学生冲入他的店铺将日本纱全部抄出，在大街上当众焚烧。李善全从此对学生怀恨在心。1938年日寇攻占临沂后，他马上参加了“维持会”，并让他的儿子和女儿当了汉奸。他仗着有钱有势，公开在魏家巷西首路南开了一个鸦片馆。他从日本洋行购进烟土后加工成烟泡，



韩复榘



范筑先



庞炳勋

卖给吸食者，售价是一元大洋两个烟泡。若在馆里吸食，他还提供烟具和茶水等。

多行不义的李善全最终遭到了恶报。生意兴隆之时，他出资千元，让日商给他从东北购买关东土。运毒的汽车从枣庄往临沂，刚出枣庄不久就遇上了铁道游击队，一车日货连同李善全的毒品全部被游击队缴获了。后来听说这批毒品被游击队焚烧了。李善全叫苦不迭，终日以泪洗面吃不进饭去，不久就死去了。更可悲的是，他的鸦片馆很快也倒闭了，一双儿女也因吸食鸦片成瘾而中毒，皆悲惨地死去了。市民皆说他贩毒遭到了报应。这就是贩毒害人的可悲的下场。

侵略军误炸天主堂 庞炳勋血战东洋桥

临沂天主教曾属兖州教区，清末时划为沂州教区。1913年临沂天主教大教堂建成。这是一座由德国教父主持建设的罗马式的大教堂，也是目前山东省现存的最大的罗马式的大教堂。

这座教堂在抗战初期也遭到野蛮的日军的轰炸。举世闻名的临沂阻击战中，日军的飞机每日轰炸临沂城，于是城中居民只好躲进教堂以求保护。教会为了保护居民和教堂不被轰炸，在教堂大门上挂上了黄白两色的教旗和德国国旗。那知丧心病狂敌机为了轰炸当时的兵营——司令部，而将炸弹投向了教堂，一枚炸弹正中教堂风琴楼东侧的一个券顶，当场将在堂内颂经祈祷的尤姑娘炸死。至今那根石柱上还有尤姑娘的血迹。当时的首任正权主教万宾来（圣名嘉禄）马上写信告知德国在青岛的领事馆，德国领事向日本国提出抗议，并派人前来调查拍摄了照片。事后日本侵略军只好向临沂教会道歉并赔偿了损失，重修了教堂。居民们知道日本不敢得罪德国神父，所以1938年日军攻入城内后数千居民躲入教堂得到了保护。

为了不让从青岛来的日军与台儿庄的日军会合，中国军队在临沂进行了阻击战。进行阻击战的是以庞炳勋为首的四十军和以张自忠为首的五十九军。日军的坂垣师团自东而来处处受到阻击，这里只讲在沂河老桥的一次阻击战。日军占领河东的九曲后，企图从沂河大桥上过河进攻临沂城。这沂河大桥建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是当时台潍公路上的一座现代化的大桥，故居民称为东洋桥。为了不让日军过河，两军在桥上展开了白刃战。四十军的守军官兵全部光着膀子，手执大刀片杀向进攻的日军。日军以刺刀与军刀和中国的勇士们拼杀。这日军的军刀那里能敌过中国的大刀，只见日军的人头在桥上乱滚。日军抵挡不住只好逃回，大桥守住了。四十军和五十九军就是这样一次又一次地阻击，使得来敌未能与台儿庄日军会合，为台儿庄大战的辉煌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楼主人私通八路 游击队痛击倭商

临沂城的沂州路南段路东有一座五间的二层楼，抗战前这楼的主人是陆士聪和他的夫人张云峰。原来只是五间平房的门面屋，因在繁华的地段，是经商的理想之处。起初在此经营的商号是福记京货店，老板名叫肖思九。此人经营有方，生意十分兴隆。为了扩大营业，他与房主协商，出资将这五间平房改建成了五间楼房，下面是门市部对外营业，楼上放货物和办公。好景不长。1938年日本侵略军侵占了临沂后，在临沂城设立了多家洋行，其中最大的一家叫鲁南洋行。老板是日本人佐藤，他看中了陆家的这五间楼房，便强行把福记商号赶走，在此开设了洋行。这家洋行原来是个半特务半商业的组织，它平日收购军用物资，像花生米、花生油，同时又出售毒品海洛因，同时还暗中为日军刺探情报。这佐藤在楼下经营商业，在楼上还设有“慰安所”。楼下挂着“鲁南洋行”的牌子，楼上写着“聚乐”二字。这慰安所里全是从日本来的歌舞妓女，专为日本军官服务。他还从日本运来了清酒和啤酒，供日本军官享用。这佐藤是个老牌的特务，会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他不但占用了陆家的楼房，还在院中搭棚存放货物。他对住在后院的陆家十分不放心，几次试探女主人是否识字。原来女主

人张云峰是书香门第出身，从小就识字。当日商试探她时，她假装不识字瞒过了佐藤。

在城外的游击队沂河支队大队长李华源，本是学生出身，抗战初期即参加了青年救国军。此人一身好武艺，多次在公路上痛击日军。河东解放区的武装一直在河东王桥一带活动，但武器和弹药皆不足，生活用品也缺乏。冬季快来了，战士们急需棉衣。其实李华源早就盯上了日本洋行的物资，只是一时无从下手。他通过内线找到了陆家女主人张云峰，探听洋行的情报。不久，张云峰得知洋行有一批物资用民用汽车自台儿庄运来临沂，还有一批军用物资自新沂运来临沂，时间和车号也打听得很准，她就将这一消息告诉了李华源。当这辆民用汽车自南而来、行至王桥的某路段时，在此设伏的李华源跳上汽车，打死了开车的鬼子，他自己开着车到了安全地带，将车上的物资全部卸下，又将汽车点着火烧了。这批物资有毛巾、牙刷、牙粉、肥皂等日用品，还有游击队更需要的布匹。这些物资很快转到了沭河以东的解放区。这些货中还意外发现了毒品。当一个战士高兴地用发给牙粉刷牙时（以前战士们皆用食盐来刷牙），一入口即苦不堪言，迅速吐出后向领导作了报告。结果一化验乃是伪装成牙粉的日产海洛因。还有一次，洋行收买了几个奸商去解放区收购花生油。这两个奸商一个是李胖子，一个是孔小鬼。他们在临沭县农村收购了一批花生油，偷运到沭河西岸的重沟装上大篓，雇了一个名叫王二半吊子的人给他们拉车。这消息被张云峰知道了，她很快通知了游击队。刘矩、庞世泽所属的部队当晚在重沟将孔、李二奸商捉住，没收了全部货物。这次洋行又赔了大本。更严重的一次是洋行将收购的铜元装箱欲发往日本，这回他们更加保密，但也没有躲过张云峰的眼睛。消息传出后，在枣庄又被铁道游击队给夺去了。张云峰见了佐藤还故意说：你的发财的大大的。这佐藤不耐烦地说：什么发财大大的，土八路的厉害，我的损失的大大的。这就是游击队严惩日本洋行的一段历史。

五贤祠仰慕先贤 孔子庙追悼英灵

1945年临沂城光复后，万民欢腾，山东省党政机关陆续迁来临沂城。山东省政府和省议会驻旧县署（原老专署所在地），华东局山东分局住在西门里天主堂，新四军军部来临沂后也在天主堂。天主堂的路南部分称南堂，原是圣神婢女会的住地，一座大楼共分三层，下层是医院，二楼修女宿舍和小圣堂，三楼上工作室，有制作祭披、绢花等手工艺品和绣花、绘画的。新四军军部入住后，陈毅、粟裕等皆住在此楼。为了安全，省政府的重要领导黎玉等人亦住在此楼。罗炳辉因为体重上下楼不方便，选择住民房。教堂东不远处的石碑坊巷的北首路东一胡姓的住宅分内外两院，罗炳辉就住在内院北屋（此屋至今尚存）。罗炳辉平易近人，经常和居民交谈，居民皆亲切称他罗司令。

当时省议会经常召集临沂参议会的参议员和本城的士绅名流等民主人士开座谈会。这其中李澄之、范铭枢、马保三、王瑞芝、刘献庭、刘佛言、陈法言、狄建鳌、李明兰、万春圃等知名人士。一次罗炳辉也前来参加座谈。他向与会者询问临沂历史上有哪些名人，大家推拔贡出身的狄建鳌作介绍。可巧当时省政府拨款将城内五贤祠整修一新，于是狄建鳌建议先去参观。听过介绍和就地参观，罗炳辉对诸葛亮十分敬仰，称赞诸葛亮是历史上难得的人才。参观时大众报社记者王力还给他拍了照片。罗炳辉对这些民主人士十分敬重，宴请时还特向他作介绍的狄建鳌敬酒。五贤祠从此又留下了罗炳辉在此怀古的一段佳话。

1946年，蒋介石向山东解区发动了重点进攻。以徐州为大本营从西南方向向临沂发动进攻。山东解放区的军民给以迎头痛击。罗炳辉亲自赴前线指挥了几次战役。1946年6月9日他指挥一举攻下了国民党军与伪军的枣庄据点，歼敌3300人，解放10万多群众。这是他指挥的最后一次战役。由于疲劳过度，曾几次昏倒。6月21日于返回临沂途中，在苍山县兰陵突发脑溢血不幸逝世，终年49岁。当日即将遗体运回临沂，停放在孔庙的大成殿，陈毅同志亲自主持葬仪。当务之急的是需要一口大棺材。消息传出后城内的名人狄建鳌马上表示要捐献他

家的一口大棺。原来他在抗战前就制做了两口柏木大棺，四面皆是六寸厚，并上了数遍老漆，因他夫人早在青岛病逝并葬在了青岛，故余出了一口。陈毅同志听说后感谢这位深明大义的老先生，当即派人前去运棺，并委托参议员王瑞芝、刘献庭两位老先生前往致谢，送去了200元奖金。狄建鳌道：“罗将军为国捐躯，我献口棺木，这是应该的，这奖金绝对不收。”还将原来做的大红棺衣也一并捐出。这一义举受到了人们的赞誉。追悼大会就在大成殿前召开，陈毅同志亲自主持了大会。出殡时用了两辆汽车。陈毅、黎玉等党政军领导人在最前面，汽车上载着灵柩，车上高悬着罗炳辉的画像，后面车上是乐队，吹奏着哀乐。灵车两旁还有两班中乐队吹奏。灵车沿着西门大街向东行至老专署前向南，城内居民沿途摆设路祭。送葬队伍出南门经旧粮食巷出东哨门至老桥头青龙寺处到烈士陵园，就安葬在纪念塔的后面。解放后建成新烈士陵园后，又将罗将军迁葬在烈士陵园内（今华东革命烈士陵园）。

这正是：歼顽敌英雄捐躯，献棺木拔贡仗义。



罗炳辉（右二）在抗日前线

从邾国说到临沂城

赵 炯



邾国是临沂地区见诸文字记载的最早的封国之一。临沂城是该地区存留至今的最古城邑。古代临沂城的兴建，又同邾国的灭亡有联系，因此对于邾国故城的位置、灭亡时间、古代临沂城的位置及兴建时间等问题梳理清楚，很有必要。历代亦曾有不少专家论及，但多有含混舛误之处。就现在手边的几本工具书，说法出入就很大。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辞海》：“邾，古国名。妘姓，建国于启阳，在今山东临沂县北。”这里明确说是“古国”，“建国于启阳”且在“临沂县北”。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辞源》：“邾，春秋列国名。《春秋》昭公十八年：‘六月，邾人入邾’。注：‘邾国，今琅邪开阳县’。在今山东临沂县北。”这里明确说是“春秋列国名”，就是“今琅邪开阳县”，“在今山东临沂县北”。同是商务印书馆出的1978年版《现代汉语词典》则解为：“周朝国名，在今山东临沂县。”这里则又明确说是“周朝国名”，显然以上三种书在邾国立国的时间、疆域及都邑的位置上是各说各的话。下面想就这个问题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谈点粗浅的看法。

一、郕国的灭亡

据《临沂县志》及有关资料记载，郕是妘姓国，子爵，为夏后氏之裔，早在虞夏时代就已存在。说它是古国当然可以，但欠明确。据《国语·郑语》及注，妘姓国是高辛氏之火正祝融的后裔，它同鄆国是临沂地区最早的两个封国，其都邑位置在现临沂市城区北约十五华里的古城村，但却不是后来的启阳或开阳城。地名普查后，更名为郕古城。周初大封诸侯时曾再次受封，中间变迁如何，是否也像杞国那样“殷时或封或绝”至“周武王克殷纣，求禹之后，得东楼公，封之于杞，以奉夏后氏祀”（《史记·陈杞世家》）而重新封的呢？还是一直存在从未绝过呢？若中间灭绝过，那又是何时呢？因一无文字记载，二无出土文物可证，已不得而知。总之，自周以后却是一直存在，直到春秋时被邾国灭亡为止，有史为证。因是小国，又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惊人之举，所以见诸文献的记载甚少。对于它的世系及历代国君名讳，皆无从勾稽核查，但它的灭亡却是有案可稽的。《春秋》就明确记载着昭公十八年（公元前525年）“邾人入郕”的事。

鲁昭公十八年（公元前525年）六月，“邾人籍稻。邾人袭郕。邾人将闭门，邾羊罗摄其首焉，遂入之，尽俘以归。郕子曰：‘余无归矣！从帑于邾。’邾庄公反郕夫人，而舍其女”。这真是一场意想不到的灾难，君出城“巡行踏勘其籍田以督农奴耕种”（杨伯峻《春秋左传注》），谁想邾人竟乘机突然攻袭郕都。邾人仓促间慌忙关闭城门，但为时已晚。邾人羊罗已冲到近前，经短暂搏斗，羊罗将关门者的脑袋砍下，提在手中冲入城内。邾人破城后，便把城中的人全部俘去。郕君闻讯赶回，见城破室空，家人臣民尽被俘去，万分悲痛地说：“我无家可归了！”万般无奈，一横心，也赶到邾国，自愿同家人一起当俘虏去了。邾庄公见此光景，不知是动了恻隐之心还是有别的想法，便把郕君夫人还给了郕君，但他好事并没做到底，又把郕君的女儿给扣留下了。郕君国亡家破，岂肯甘休，便寻求支援，进行报复。向谁求援呢，最可靠的援助者当然就是他的亲戚。《春秋左传》：“十九年（公元前524年）……郕夫人宋向戎之女也，故向宁请师。二月，宋公伐邾，围虫，三月，取之。乃尽归郕俘。”原来郕君夫人是宋国大夫向戎的女儿，当时向戎的五个儿子向胜、向宜、向郑、向行、向宁都在宋国任要职，颇有权势。向宁为了替郕君报仇，夺回外甥女和郕国臣民，便请求宋公出兵伐邾。次年二月，宋国出兵伐邾，包围了邾国重镇虫城（在今山东济宁县境内），三月占虫城。邾国害怕了，就把郕国的俘虏全部放了回去。为了同宋国讲和，平息这次战事，五月十二日（乙亥）邾人出面邀集了邻国徐国和小邾（郟）国，在虫城同宋公会盟。即《左传》所载：“邾人、郟人、徐人会宋公，乙亥，同盟于虫”。至此，这次战事才算了结，郕国得以恢复（参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后来，郕国又怎样了呢？《临沂县志》只说“春秋入鲁”。对此《山东通志》只说“在昭公时并于邾，当哀公时又并入于鲁”。《续山东考古录》、《太平寰宇记》等书也都只有类似简约的记载。《春秋左传》中没有记载，其他也无文献可查。据《山东通志》提供的线索，在“邾人入郕”三十年后的鲁哀公二年（公元前494年），《春秋左传》中才找到一条信息，使我们对郕国的情况有了个间接的了解。

鲁哀公二年（公元前494年），鲁伐邾，邾国战败求和。鲁国在这次战争中，攻取了邾国的“沂西田”（参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这“沂西田”，正是郕国的疆土。此时既然作为邾土被鲁攻取，那就是说，郕国在昭公十九年借助宋国的力量夺回被俘臣民得以复国后，不知在哪一年又被邾国灭掉，疆土并入邾国，现又做为战利品落入鲁国之手。这大概就是《临沂县志》上所說的郕国“春秋入鲁”的事实。宋国既在昭公十九年（公元前524年）干涉过邾国对郕国的吞并。邾国为此也吃了些苦头，怎么又敢轻举妄动呢？对此史书上没有任何记载，但我们从宋国的政局变化中，却可寻出线索，做出推断。

显然邾子在宋国引为靠山的势力并非宋君，而是其妻族向氏，特别是向宁。谁想第二年，即昭公二十年（公元前523年）宋国的政局发生动荡。原因是向氏在宋国的权势引起了“无信多私”的宋元公的不满和猜忌，“而恶华、向”（《左传·昭公二十年》）。臣子被国君所恶，自然要大难临头。为了自保，“华定、华亥与向宁谋曰：‘亡愈于死，先诸？’”（同上）于是先下手为强，发动了政变。“华亥伪有疾，以诱群公子。公子问之，则执之……”（同上）杀了公子寅、公孙援多人，并拘留太子、大臣、公子多人为人质，来要挟宋元公。当宋元公“如华氏请焉，弗许”时，也毫不示弱，针锋相对地拘捕了“华亥之子无、向宁之子罗、华定之子启”，拉出破釜沉舟的架势。政变者害怕了，开始认输，政变失败了。“华向奔陈，华登奔吴。向宁欲杀太子，华亥曰：‘干君而出，又杀其子，其谁纳我？……’”（同上）。向宁成了宋国叛臣，宋国自然不会再为邾国的存亡而同邾国大动干戈。邾国大概窥透了这种形势，便放心大胆地再次将邾国灭掉。如果此说不谬。那么，邾灭邾当在昭公二十年（公元前523年）后。

二、启阳城并非邾国故都

鲁国占领邾国的旧疆后，因其远在东陲，位置重要，便派两家重臣“季孙斯、叔孙州仇帅师城启阳”（《春秋左传·哀公三年》），以便永久镇守。那么这个启阳城是建在什么地方呢？我认为启阳城即在现在临沂城的位置，是临沂城最早的名称；但文献记载却甚混乱，且又传讹承谬、愈错愈远，究其源盖出于杜预。

《春秋》昭公十八年（公元前525年）邾人入邾条，杜预注曰：“邾国，今琅琊开阳县”。哀公三年（公元前493年）“季孙斯、叔孙州仇分帅师城启阳”条，杜预注曰：“启阳，今琅琊开阳县”，从逻辑上说，这两条也都还不能算是错，只是不明确。第一条是就邾国的疆域范围而言，是说邾国疆土在今开阳县的辖区。杜预是魏晋间人，开阳如何改为启阳，他当然很清楚。第二条是就城池而言。是说启阳城即现在的开阳县城。然而后人后不察，将两条连起来看，竟得出了启阳城就是开阳城，就是邾国都邑的结论，于是铸成大错。《太平寰宇记》卷二十三就是如此说的：“汉开阳县城，在（临沂）县北一十五里，即春秋邾国。昭公十八年邾人入邾，注云：今琅琊开阳县也。《左传》又曰：季孙斯、叔孙州仇帅师城启阳，即开阳也。汉以避景帝讳，改为开阳，后琅琊王京徙都开阳。”这里显然是曲解了杜注。《续山东考古录》不做仔细考察就沿袭成说，认为周邾国，后入鲁为启阳邑……今县治正邾国地。开阳（启阳）县故城在北十五里。很明显，《续山东考古录》认为启阳城是在邾国都邑基础上建的，同临沂县城是两回事。

1977年版《辞海》说：“邾，……建国于启阳，在今山东临沂县北。”这里撰者竟认为邾都是在启阳城的基础上建的，就更让人莫名其妙了。但启阳城的位置仍照上述各书的说法，大体没变。

从以上资料看，只因杜预说了“邾国，今琅琊开阳县”一句不太准确的话，引出《太平寰宇记》言之凿凿；《续山东考古录》将“今县治”和“开阳（启阳）故城”明确分开；《辞海》不仅也相沿不变，且更说出“邾国，……建国于启阳”这样让人莫名其妙的话。如果此说能成立，那么经鲁国两家重臣四次修筑，在邾国故城基础上建起启阳城，规模一定相当可观，此后西汉以为开阳县治、东汉至西晋几百年间做为琅琊国都邑，一定是该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必然有众多的历史名人活动于此，有重大的历史事件发生于此。这些都不可避免地给这里留下丰富的名物、众多的胜迹。同时这样一座历经千年的古城是如何废弃的呢？一定也有明确的答案，但这一切都既无文献记载，也无民间传说。为了弄清这个问题，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做了大量工作，然而却令人大失所望。邾都故城遗址即今临沂城北十五里处的古城村，除村东有邾林子是当年邾国的墓葬地遗址外，地上无任何遗迹可寻。地

下考古发掘的结果，也只发现有春秋时代的少量铜戈、铜罍于，铜箭镞等零星文物。由此，我们可以作出如下推断：

一、出土遗物都是春秋时期的东西，战国以后的东西一件也没有。这恰与邾国的存亡相一致，说明邾亡后故城荒废，且自那以后再也没恢复过。

二、数量之少和质量的一般，说明邾国确实是个贫弱小国，都城规模也很小。而要硬将这说成是在邾国故城基础上建成的历经千年的启阳城遗址，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成立的。

与此相反，种种事实证明，现在的临沂城，则正是当时的启阳城。

首先，地理位置与古启阳城相一致。关于启阳城的位置，郦道元在《水经注》沂水条中曾有详细地记载：“治水，又东南流，注于沂；沂水又南，经开阳县故城东。”治水又名祊河。这个在沂河以西、治水（祊河）以南，沂治汇合处的开阳故城，不就是临沂城吗？其次，临沂城大量的出土文物和城周围大批自春秋战国至西汉前期的墓葬群充分证明了城池的建造历史。城内先后出土了“陈逆簠”、“素销”等周代金属制品及“长生无极”瓦当、篆文“万岁”园瓦当等汉代物品。《临沂县志》说：“‘长生无极’汉瓦文也，史称东汉琅琊王京自莒徙宫开阳，此瓦当王宫所用，城为汉开阳县故址，得此益信。”城外墓葬中，出土文物有属于龙山文化的白陶鬲、蛋壳陶等珍贵文物和战国竹简书《孙子兵法》、《孙臆兵法》等稀世珍宝。这都证明自春秋时临沂已建城、时间与启阳城的修筑相一致。同时临沂城的出土文物自春秋战国以来历代皆有，可以完整排列至清代。数量之多、质量之精、档次之高，在全国也是少见的。地上至今可寻的古迹除上述墓群外，尚有东汉琅琊冢，西晋琅琊王潜邸、永嘉故台、王羲之故居等遗址和曾立于普照寺内直到文革中才被坏的集柳碑。可见这里自春秋战国以来，一直是这一带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并且一直延续到现在，中间并没荒废过。

鲁人何以不在邾都旧址建筑启阳城而把城建在这里呢？这是由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决定的。鲁国所以要在此建城，主要是防备临国的侵袭，是从国防角度看问题。古代驻兵，首先考虑的是水源，其次是地势的利弊、位置的适中。这里东临沂水，北依治水（祊河），二河交汇形成天然屏障；南有金、银二雀山，拱卫城池，易守难攻。西经费邑与鲁都曲阜相通，交通畅达，联络方便，当然是难得的建城设防之地。因此鲁国才派出两家重臣，不惜两年四次修整，目的是使其固若金汤，确保边境安全。正是上述原因，此城才历尽沧桑而不废，成为沂蒙山区的门户，历代兵家所必争。若在邾都故城建筑，则失去了这些条件。后来的事实也充分证明了鲁人眼光的准确可贵。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队以疲弱之师，依托临沂城抗击日寇精锐之旅达50多天，日寇只能隔沂河而兴叹。另外春秋时凡在旧城筑新城皆用原名，如《左传·昭公四年》（公元前541年）城西郭、五年城毗、六年城邾瑕等。而这里明确说是城启阳，不说城邾，可见启阳城决不会在邾都旧址。

三、临沂古称何以不是“启阳”、“开阳”而是“琅邪”

临沂城既是由古代启阳（开阳）城沿革而来。何以不称启阳、开阳而称琅邪呢？这也得从春秋说起。

琅邪最早以山名出现，也不在现临沂地区，而是在今诸城县东南的海滨处。春秋时属齐国。所以齐景公曾说：“遵海而南，放于琅邪”（《孟子·梁惠王》），这大约就是琅邪一词最早见诸文字的记载了。到了春秋末期，齐国势衰，南方的越国崛起。越王勾践灭吴后雄心勃发，一心想称霸中原，便跨海北上，迁都于此，都城因山而名曰琅邪。琅邪一名则由山而城，范围扩大。后来勾践又在此建县亦因山名，于是琅邪又由城而县，并筑观台，以望东海。其台亦因山而名，称琅邪台，琅邪之名进一步扩大。《地理志》云：“越王勾践尝治琅邪县、起台。”《括地志》亦云：“诸城县东南百七十里琅邪台，越王勾践观台也，台

西北十里有琅邪故城”。到秦统一六国后，始皇分天下为三十六郡，琅邪又由县名而为郡名，郡治就设在琅邪县。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东巡，曾登琅邪山，并徙民三万户于琅邪，筑台亦曰琅邪台，并立石刻碑，为其歌功颂德，即备受后人珍视的琅邪碑。西汉建立后，“汉承秦制”，琅邪郡并没有撤销，只是治所移到东武（今诸城），且规模较秦更加扩大，设置铁官、盐官，生产更加繁荣，商业交通更加发达，成为当时的大郡。直到东汉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光武帝刘秀封其子刘京为琅邪公，琅邪才第一次成为封号。到建武十七年（公元41年）刘京又晋爵为琅邪王，建藩邸于莒（今莒县）。至此琅邪郡又升格为琅邪国，其名称也由诸城移到了莒。但仍未和临沂发生联系。直到东汉章帝建初五年（公元80年），琅邪王刘京请求将藩邸由莒迁往开阳。章帝准许后，琅邪王藩邸才由莒迁开阳。随着琅邪王藩邸的迁开阳，琅邪之名也就由莒而到了开阳。到这时琅邪之名才和临沂城联在一起，而开阳之名也就是在这时才不复使用。琅邪王从刘京到刘容共传六世，历时141年而国绝。到汉献帝建安十一年（公元206年）“操复立刘容之子刘熙为琅邪王”（《三国志·魏书·武帝本纪》），琅邪国再次出现，直到十一年后即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刘熙被诛，国除，汉代的琅邪国才最后结束。从刘京迁邸开阳到国除历时136年。在此期间，琅邪成了临沂城的正式名称，全国其他各地的琅邪名称则一概废弃不用了。三国西晋时，临沂仍为琅邪国。西晋最后一位琅邪王司马睿，南渡后成了东晋开国之君元帝。北齐至唐，虽有琅邪王之封但不就国，临沂则改为琅邪郡，名称仍存。从南北朝到北宋虽然建制多变，时郡时州，但琅邪之名仍为临沂所专有，书写时还要分行跨书，两名并存。

后北方沦为金国，金国只称沂州。到此，由郡而国由国而郡历时千年的琅邪名称才从地方行政建制中消失，但仍作为临沂城的别名而在民间使用。民国十四年（公元1925年）张宗昌督鲁，复又设琅邪道于临沂，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裁撤。琅邪仍只作为临沂的古称别名留在民间使用至今。这就是为什么临沂古称琅邪而不称启阳、开阳的原因。



2008年在沂州路与兰山路交会处附近发现的明代古城墙

孝悌临沂

——《二十四孝》探源之六

大荒堂主



金代孝子砖：郭巨埋儿

（六）埋儿奉母

郭巨是二十四孝中的主角之一，传为汉魏时人，他的事迹叫做“埋儿奉母”。此故事最早见于汉刘向《孝子图》，曰：郭巨，河内温人，甚富。父没，分财二千万为两分，与两弟，己独取母供养寄住。邻有凶宅，无人居者，共推与之居，无祸患。妻产男，虑养之则妨供养，乃令妻抱儿欲掘地埋之，于土中得金一釜，上有铁券云：“赐孝子郭巨。”巨还宅主，宅主不敢受，遂以闻官。官依券题还巨，遂得兼养儿（见《太平御览》）。刘向是中国小说的鼻祖，擅长编辑民间的故事传说、寓言，郭巨是历史人物还是文学人物，已无法考证。

晋干宝的《搜神记》记述大致相同：郭巨，隆虑人也，一云河内温人，兄弟三人，早丧父，礼毕，二弟求分，以钱二千万，二弟各取千万，巨独与母居客舍，夫妇佣赁以给公养。居有顷，妻产男，巨念与儿妨事亲，一也；老人得食，喜分儿孙，减饌，二也；乃于野凿地，欲埋儿，得石盖，下有黄金一釜，中有丹书，曰：“孝子郭巨，黄金一釜，以用赐汝。”于是名振天下。

翻译成白话文为：郭巨，是隆虑这地方人，另一说法是河内(黄河以北)温县人。郭巨兄弟三个，父亲早年去世，葬礼结束，两个弟弟要求分家，全部家产共有二千万，弟弟们各取

一千万，郭巨与母亲投宿在客店，夫妻俩靠给人帮佣来租赁客舍供养母亲。时间不长，妻子生一个男孩。郭巨心想养儿耽误侍奉母亲，这是其一；老人吃到稀缺的东西，都喜欢分给儿孙，常使自己挨饿，这是其二。于是在荒无人烟之地挖坑，将儿子作为累赘埋掉，却挖到一个石板，石头板下盖着一个铜釜，里面装满了黄金，中间有朱砂写的字条说：“孝子郭巨，黄金一釜，以用赐汝。”于是郭巨孝行名扬天下。

对于干宝的《搜神记》，《晋书》评价是：“宝既博采异同，遂混虚实。”

敦煌发现的《孝子传》是这样记载的，其一：郭巨字文举，河内人也。家贫，养母至孝，妻生一子，年三岁。巨谓妻曰：“家贫如此，时岁饥布德老饮食，供养孝母，犹不充饱，更被婴分母饮食。子可再有，母不可得。共卿埋子以全母命不？”妻不敢违，从夫之意。巨自执，妻乃抱儿来入后园。后令妻杀子，巨即掘地，才深一丈尺，掘著一铁器，巨低腰顾视，乃是一釜，釜中满盈黄金。巨速招妻。妻曰：“抱儿则至。”儿且犹活，妻不忍下手。夫谓妻曰：“卿见此釜之金，其上有一铁券云：‘天帝赐孝子黄金，官不得夺，私不许侵’。”巨既得金，惊怪不已，乃陈于县，县以申州，州与表奏天子。天子下诏曰：“金还郭巨供养其母。”乃表门以彰孝德。

其二：郭巨者，河内人也，养母至孝。时遇饥荒，夫人与佣作，每至吃食，盛食将归，留食老母。巨有一儿，常夺阿婆饭食，遂不得饱。巨告妻曰：“儿死再有，母重难得，你可煞儿存母。若不如是，母饿死。”遂令妻抱儿，巨自将锹穿地三尺，拟欲埋之。天愍其孝，乃赐黄金一釜，并有一文，词曰：“金赐孝子，官不得侵，私不许取。”诗曰：

郭巨专行孝养心，时年饥俭苦来侵，
每被孩儿夺母食，生理天感赐黄金。

到元代郭居敬编定《二十四孝》，里面说：汉郭巨，家贫。有子三岁，母尝减食与之。巨谓妻曰：“贫乏不能供母，子又分母之食，盍埋此子？儿可再有，母不可复得。”妻不敢违。巨遂掘坑三尺余，忽见黄金一釜，上云：“天赐孝子郭巨，官不得取，民不得夺。”

有诗赞曰：郭巨思供给，埋儿愿母存。黄金天所赐，光彩照寒门。

至此，故事似乎仍与临沂没有关联。与临沂沾亲带故较早见于明初成化年间，在歌咏沂水古迹的诗文中出现了郭巨墓，到康熙年间编纂《沂水县志》，明确记载：郭巨墓“在县西一百里，按《蒙阴志》有郭巨墓。郭巨原沂民，或《蒙》所载未详。有碑记。”“郭巨，后汉时人，事父母至孝，详载《府志》。墓碑题孝子郭巨墓，有撰文足证。”

其后，乾隆《沂州府志》一锤定音，将其纳入自己的版图：“汉郭巨，东莞人。家贫，父早逝，事母，每苦甘旨不继，有三岁子，每分母食乃与妻谋曰：“无不能致丰美以奉母，母又分半以饲子，是贻亲以饥也，子可复得，而亲年不可复得，不如瘞此子，并力以事母。”遂掘地欲埋之，至尺余，得黄金一釜，镌字十二曰：“天赐郭巨，官不得取，民不得夺。”有碑载《兖州府志》”

古东莞即今天的沂水。“有郛亭，有邳乡，有公来山，或曰古浮来。（《后汉书·郡国志》）”后汉时归属琅邪国，“汉武帝元朔二年，封城阳共王子吉为东莞侯。魏文帝黄初中，立为东莞郡。（《水经注》）”另一种说法见《晋书·地理志》“东莞郡太康中置。统县八，户一万。”其位置《水经注》里讲：“沂水又东迳浮来之山，《春秋经》书：公及莒人盟于浮来者也。即公来山也，在邳乡西，故号曰邳来之间也。沂水又东南迳东莞县故城西，与小沂水合。孟康曰：县故郛邑，今郛亭是也。”

览蒙山胜境 抒诗家情怀

——《沂蒙诗话》之七（续四）

李兴河

（八）

在游览蒙山并留下咏颂蒙山诗篇的作者中，爱新觉罗·玄烨和爱新觉罗·弘历是两位有特殊身份的人物。他们是清代皇帝，在位期间，文治武功极盛一时，后人称他们当政的时代为“康乾盛世”。他们完全可以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相媲美。在他们南巡期间，都曾驻蹕蒙山麓区，观赏了蒙山风光，并留下咏颂蒙山的诗篇，为底蕴丰厚的蒙山文化增添了新的光彩。至于他们的诗作整体所达到的水平，笔者没有读过他们的诗集，不敢妄加评论，但就他们咏颂蒙山的诗作来看，我觉得还是很有特色的。这里仅举几首，予以赏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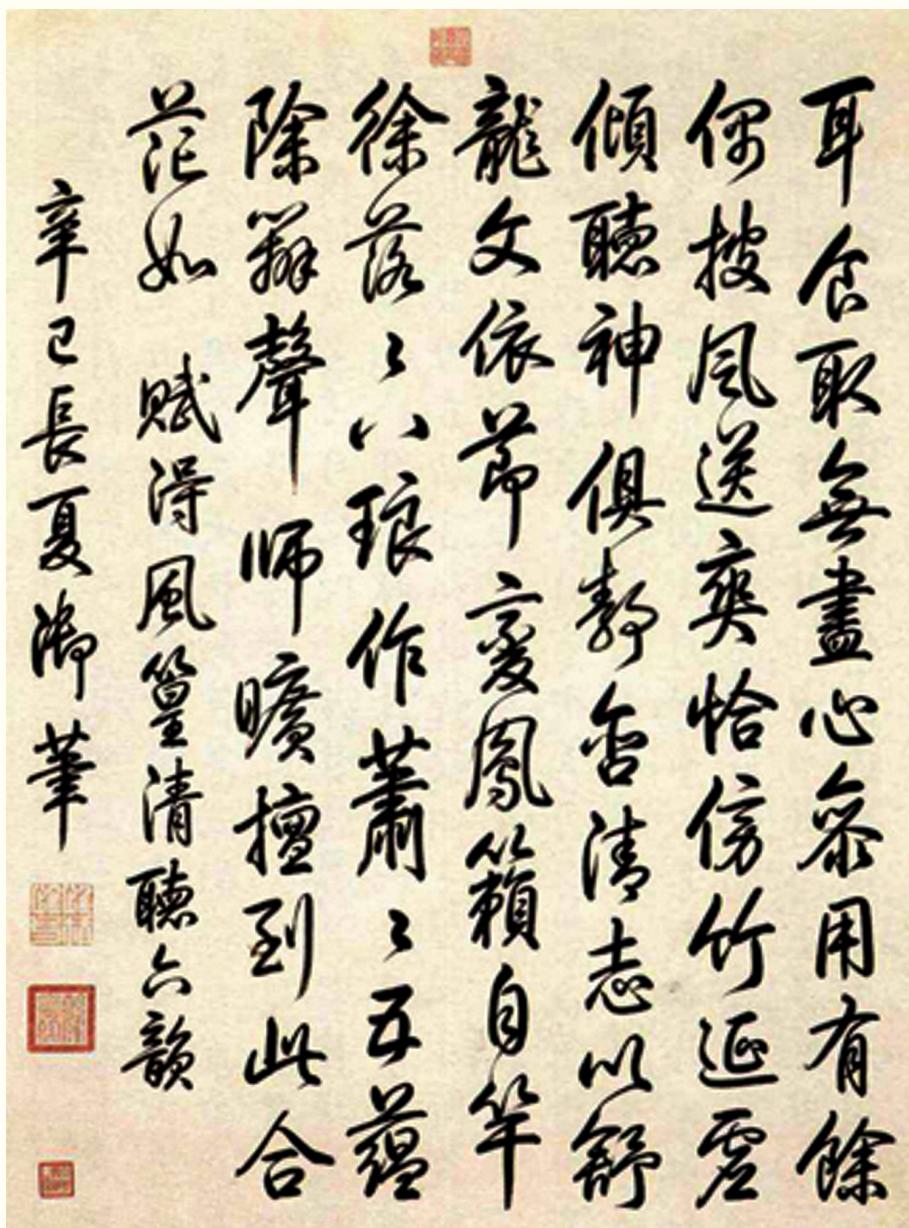
爱新觉罗·玄烨（1654—1722），清代皇帝，年号康熙，谥号圣祖，公元1662—1722年在位。他南巡时，曾三次驻蹕蒙山麓区的蒙阴城东关和费县的荆埠营等地。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农历十月十三日，驻蹕蒙阴，适逢天降瑞雪。十四日观赏蒙顶积雪，遂赋《蒙阴晓雪》诗：

一片寒云向晓封，雪花应候慰三农。
马蹄碎塌琼瑶路，隔断蒙山顶上峰。

这是一首七言绝句。诗的一、二句说，天将亮的时候，漫天阴云密布，大雪应时而降，瑞雪兆丰年，自然使广大农民感到快慰。这次降雪，在“小雪”和“大雪”之间，故称应候。诗的三、四句说，雪越下越大，马蹄踏碎了山路上洁白如玉的积雪，苍茫迷漫的飞雪遮住了巍峨的蒙山峰顶。全诗写景，层次分明，有远有近，有高有低，有动有静，有声有色，先写寒云密布，次写雪花飘飘，再写马踏积雪，最后写雪遮蒙顶，生动形象地创造了《蒙山车马雪行图》的意境，仿佛能听到马蹄踏雪的清脆之声，仿佛能看到人物冒雪观赏蒙山雪景的欢快情态，字里行间流露出作者轻松愉悦的心情。玄烨一直很重视农业，关心农民。他在江南巡视时，写有《初秧》一诗：“一年农事在春深，无限田农望岁心。最爱晴和天气好，绿畴千顷露秧针。”这首诗宛然如画，写出了春天的江南，一望无际的绿色秧田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广大田农都盼望着农业的丰收，自然作者关心农业、关心农民的真情也蕴含在诗中了。这两首诗参看，更能体味作者的用意。

爱新觉罗·弘历（1711—1799），清代皇帝，年号乾隆，谥号高宗，1736—1795年在位。他曾6次南巡，都途经蒙山麓区，驻蹕蒙麓的桃墟、兴隆庄、万松山行宫、荆埠营、注经台等地，并写下30多首咏颂蒙山的诗篇。乾隆十六年（公元1751年）春正月三十日，他第一次南巡，二月初一日，由蒙阴县桃墟驻蹕兴隆庄，作《望蒙山雪色》诗一首：

崇峦积雪昔年同，圣祖巡踪景仰中。
奄有海邦为鲁镇，果然山下出泉蒙。
逢年民鲜饥寒色，敦俗户多醇朴风。



康熙手记

百岁熙和九州宴，自维奚以继鸿功。

这是一首七律。诗通过写在蒙山对圣祖巡踪的景仰及蒙山的形胜和民情，颂扬了圣祖的丰功伟业，表达了继承圣祖“鸿功”的志向。诗的首联，是写蒙山积雪的景色与昔年清圣祖所见的雪景相同，触景生情，对圣祖巡踪的景仰之情便油然而生。诗的颔联，写巍峨高大的蒙山是鲁国的镇山，正如《诗经·鲁颂·閟宫》所写“奄有龟蒙，遂荒大东，至于海邦”。许多清泉出于蒙山之下，更显出蒙山的灵气。诗的颈联，是写蒙山一带年丰物阜，民无饥寒，乡风民俗，淳朴敦厚。诗的尾联，写圣祖时代国家被治理得河清海晏，时和岁丰，作者亦有志继承圣祖的“鸿功”，干一番强国富民的事业。

阴历二月初二日，清帝弘历由兰山县出发，途经郟城，赋《郟城道中》：

龟蒙回望数峰尖，大野春光取次拈。

人意贪程催马策，晴曦送暖入车檐。

江声迎客行行近，诗趣和春旋旋添。

老幼初逢清蹕至，羽林呵禁莫教严。

这首七言律诗，主要写沂蒙大地的早春阳光和煦、景色宜人及南巡途中的欢快心情。诗

的首联，写回望蒙山群峰竞秀的奇观，欣赏广阔原野春意盎然的景色；诗的颔联，写在风和日丽的春光中，催马贪程的急切情态；诗的颈联，写河水的涛声迎接客人越来越近，油然而生的诗兴拌和着春景渐渐增浓；诗的尾联，写告诉禁卫军对前来观看南巡车驾的老百姓不要过于严厉地喝止，表达了作者的爱民之意。

乾隆二十二年（公元1757年），弘历第二次南巡，正月二十七，自泉林驻蹕荆埠营。作《过蒙山》、《蒙山积雪再依皇祖诗韵二首》、《望蒙山雪色再成叠旧作韵》、《渡河》、《鄆城览古》、《万松山小憩》等诗。

《过蒙山》

辛未巡江南，路经东蒙东。兹因驻泉林，取道鲁附庸。
乃在蒙羽阳，颛臾考古封。回首望云岩，崔巍扶郁葱。
升仙传贺元，躬稼忆承宫。是时春雪霁，半积半已融。
其阴积必多，前况想象中。山灵许借问，何以巧遇同。

这是一首五言古体。诗的开头写了这次南巡与第一次南巡所走的不同路线和驻蹕的不同地方。接着写了主祭蒙山的古颛臾国遗址，蒙山胜景白云岩的高峻巍峨、郁郁葱葱的奇观，贺元升仙、承宫躬稼的历史传说，春雪半积半融的自然风光。选材精当典型，抓住了蒙山的独有特色，写出了蒙山丰富的内涵，使诗的内容更为厚重。最后以借问山灵为何两次经过蒙山都看到积雪作结，引人深思：是自然的巧合呢，还是蒙山特意以圣洁的积雪来迎驾呢？全诗虽写的朴实无华，却耐人寻味。

《万松山小憩》

众山多濯濯，一峤独苍苍。想有灵祇护，如看画图张。
清斋梵宫侧，古籁午阴凉。小憩登程去，拈毫兴已偿。

《沂州府志》称：万松山在费县城“东北十里许，蔚然特起，旁无附山。沂水南来，浚水西绕，岩霞错落，松柏苍秀。乾隆二十二年，恭逢圣驾南巡，知府李希贤奉飭建御书房、观山楼於上”。清帝弘历此次南巡在万松山行宫停蹕休息，赋五言律诗《万松山小憩》。诗的首联，写周围的群山，大多草木稀少，光秃秃的，只有高耸的万松山林木茂密，郁郁葱葱；诗的颔联，写万松山松柏苍秀，想来是有灵祇的护卫，观赏秀丽的景致，好像是在欣赏张开的画图；诗的颈联，写山上的清斋梵宫、古籁午阴，给人以静穆清雅之感；诗的尾联，写在这美的环境中，虽仅作短暂停留，但赏景赋诗、拈毫书意，也已尽兴了。整首诗流露出一种惬意愉悦的情趣。

沂州知府李希贤特作《万松山》诗以记山景之美及迎驾之盛：

万松山历几经年，胜地新开景自然。双涧纡回青嶂外，一楼耸峙白云边。
清音谡谡笙簧奏，疏影离离瓊礎连。从此翠华临幸后，应同泰岱古今传。

少宰嵇璜在《春游万松山即事》诗中，也生动地描写了万松山的迷人景胜及游览胜迹的留恋之情：

望里云峰暖翠浮，寻芳萝径窈然幽。千重树色含双涧，四面岚烟抱一楼。
石畔敲诗真磊落，雪中命酒更风流。由来胜地欣初辟，几度停鞭不自由。

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清帝弘历第三次南巡，正月二十九日，自泉林驻蹕荆埠营。作诗《微雪四首》、《蒙阴积雪三依皇祖诗韵》、《望蒙山雪色再叠旧韵》、《望南城山》、《过古鄆城》、《万松山停蹕三首》等诗。

《望南城山》

古鄆城南耸碧岫，卜居养志乐闾闾。
龙门如拟青云士，吾谓斯人善附人。

这首七言绝句，颂扬了宗圣曾子孝敬赡养父亲的美德，也体现了作者选贤用能的人才观念。南城山在古鄆之西南八十里（今属平邑县），志传曾子侍父处，附近有曾子山。诗的第

一、二句说，南城山碧峰高耸，重叠幽深，曾子在此安居恭敬谦和地侍候赡养父亲；诗的第三、四句说，如果要推举德才兼备的英才俊杰，作者认为曾子这样的人就是最好的人选。

乾隆三十年（公元1765年）清帝弘历第四次南巡，二月初三日，驻蹕荣安营（是营后改为注经台行宫），赋《望蒙山三叠旧韵》。继而驻蹕万松山行宫，赋《过古鄆城咏事》、《万松山驻蹕》、《万松山行馆即事杂咏》等诗。《万松山行馆即事杂咏》是组诗，共八首，依次是：

《松》

底论三针与五针，盘虬撑盖总嘉阴。
本来不藉时人种，个个擎枝耸十寻。

《柏》

有松那可独无柏，恰似夷齐弟与兄。
落落庭前正相对，便先忧者也怡情。

《径》

径以萦纡乃致佳，修篁错植护书斋。
一时点笔促成咏，不道畅怀道欲怀。

《窗》

下俯横溪远见山，坐游颌要谢跻攀。
南来大吏咨询罢，恰合消兹片晌间。

《廊》

斋旁轩侧接迴廊，各有云窗俯下方。
屣步其间如读画，一时莫辨孰倪黄。

《石》

突兀玲珑各斗奇，高低位置雅相宜。
尽心用此勤民务，吾不忧无贤有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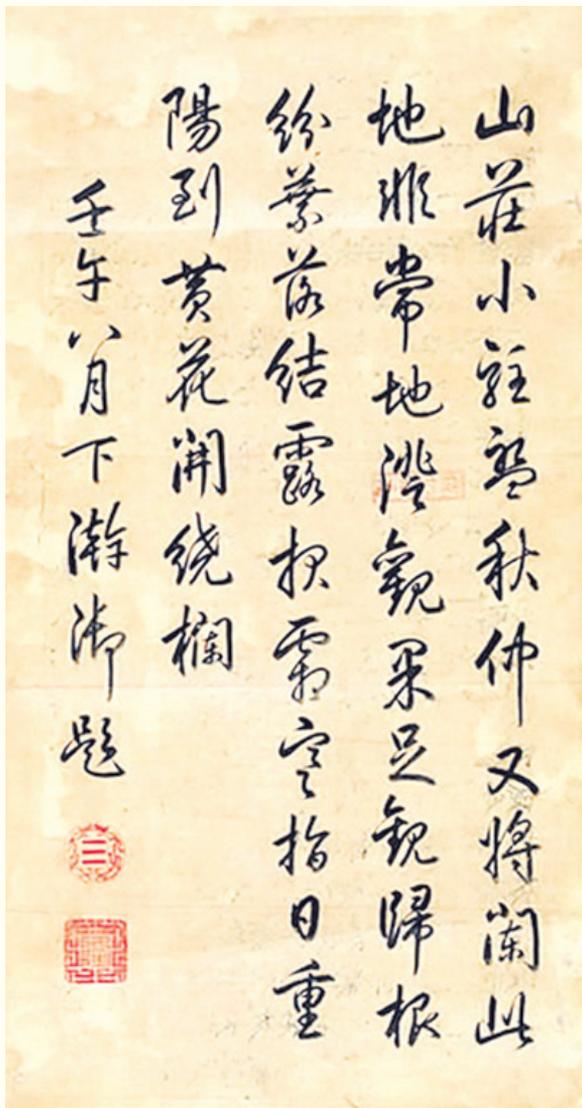
《梅》

盆梅消息递江南，三五疏英清且醜。
故里原称何水部，欲因摘藻却先慙。

《月》

半弯新月又窗前，研洁瓯香伴静便。
一宿底须费尔许，越因适己意怦然。

八首诗都以景为题，看似写景，但又不是单纯写景，而是景中寓意，各有寄托。《松》《柏》二首，可以并看，都是在赞美松柏的风格。松柏耐瘠薄，耐严寒，坚强，高洁，正如《论语》中所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松柏之品格，为历代诗家所咏颂。诗中所写松柏皆自然生长，非藉时人种植，株株高大挺拔，浓荫如盖，其生命力之强可以想见。作者把高卓不凡的长松翠柏比作高尚守节的伯夷叔齐弟兄，看到庭前的落落松柏，心情特别怡悦，这正是作者所赞美的品格。《径》主要写书斋周围的优雅环



乾隆手记

境，曲径通幽，修竹护卫，作者诗兴忽来，点笔成咏，细品诗味，又感到还没有很好地表达出欢快畅达的情怀。《窗》写从窗口俯视行宫外横流的清溪，远眺一座座青山，游目骋怀，“坐游”另有一番情趣。这时，两江总督、大学士尹继善等前来迎驾，召见询问完政务，正好利用这片刻闲暇，一起观赏领略这里的美景。《廊》主要写漫步斋旁轩侧的迴廊，向窗外俯瞰景致的美好感受如读画，但又一时分辨不清哪些景致像元代大画家倪瓒的山水画，哪些景致像元代大画家黄公望的山水画。诗的第三句说观景“如读画”，第四句进而说这如画的山景堪与倪黄二人的山水画相媲美，其美之甚，可以想见。作者完全被这迷人的景致陶醉了。《石》诗的第一、二句写行宫内姿态各异的奇石争奇斗巧，精心安放得恰到好处，极为适宜，看似赞美安置者的匠心，但诗的第三、四句却由此突转到为官勤政，认为如果像尽心尽力地安放奇石那样来勤于人民的事务，我就不再忧虑没有德才兼备的官吏了。诗中看似有赞美之词，实际蕴含规诫之意。《梅》写由行宫益梅开放，三五疏英散发着清香，传来了春天的信息，由此想到江南正是梅花盛开时节，进而想到何逊的《咏早梅》诗：“兔园标物序，惊时最是梅。衔霜当路发，映雪拟寒开。枝横却月观，花绕凌风台。”何逊的咏梅诗为世人所称赞，作者也想铺张词藻写诗赞美梅花，但自知不如何逊而先感羞愧。诗中既赞美了报春的梅花，又赞美了以咏梅而知名的何逊，真是语意双关，耐人寻味。《月》写作者隔一窗疏簾，望半弯新月，浮想联翩，夜不能寐，拈毫写怀，心意怦然，给人以勤于政务，日夜操劳之感。

乾隆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弘历第五次南巡，二月初一，驻蹕蒙山南麓的注经台行宫，赋七言古体诗一首。此不赘述。

乾隆四十九年（公元1784年）弘历第六次南巡，二月十三，驻蹕注经台行宫，赋诗《凭吊郑玄祠》：

平野祠堂经信徵，云为郑氏注经曾。
固殊贾董治乱策，颇胜毛韩议论兴。
何事其傍栋宇建，更教此外榭台增？
设如呼起斯人问，行馆于斯应不应？

这是一首七言律诗。诗篇通过对注经台郑玄祠的凭吊，高度赞颂了郑玄的事业和贡献，同时也含蓄地批评了在郑玄祠旁边建行宫、修台榭的错误做法。诗中体现了作者以儒家思想治理国家的理念。郑玄，字康成，是东汉著名的经学家、教育家。注经台在蒙山前武安村东（今属平邑县），所建注经台行宫，西临郑玄祠。诗的首联，说原野上的这座祠堂经过验证确认是郑玄祠，传说郑玄曾在注经台注经。诗的颔联，说郑玄的贡献已经超过了西汉杰出的政论家、文学家贾谊和西汉大儒董仲舒所提出的治乱之策，更胜过西汉毛萇、韩婴对《诗经》的议论。诗的颈联，质问为什么要在郑玄祠旁边兴建行宫，构筑台榭，这是对毁坏文物古迹行为的严厉批评。诗的尾联，说假若把郑玄呼唤起来问一问，行宫建在这里是应该还是不应该？在八句诗中，有四句诗是对毁坏文物古迹错误行为的批评，作者在提倡什么，反对什么，也就不言而喻了。

大反攻1945

本编

1945年8月10日，日本政府发出乞降照会。山东军区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和八路军朱德总司令关于大反攻的命令，于11日发布向大城市进军的命令。19日，山东军区部队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罗荣桓指挥下，分兵5路向敌占城市和交通要道展开反攻。经过一个多月的反攻作战，歼灭日伪军6万余人，解放了山东108县中的100个县，山东各解放区连成了一片。



罗荣桓部署大反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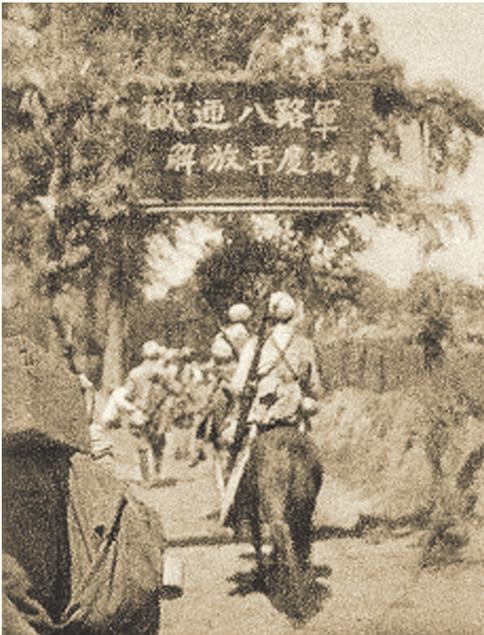
1945年8月15日山东八路军改称山东解放军开始反攻



1945年9月6日解放诸城



1945年8月19日解放胶县



1945年9月10日解放平度



1945年8月20日解放石臼所



1945年8月23日解放博山



1945年9月8日解放峰城



1945年8月31日解放新泰



群众欢呼胜利



山东八路军主力渡海北上挺进东北

碧血丹心医林情

——收藏孙桂珍

刘凤才



与君一席谈，胜读十年书。与市人民医院血液病科、市医林血液病研究所、市医学会血液病医师学会主任，首届临沂市十大名医之一孙桂珍先生一席谈，发现他是一位知识宏富、善于钻研、精心学问之人。心存贻笑大方之志忑，为其作“志”已经捉襟见肘，为此“志”立意尤费斟酌。他是血液病知名专家，题中如能“一针见血”自然最佳。想来想去，考量其为人医，“碧血丹心”一词赫然映于心中。血者，色赤也，称之为“碧”，意为仁义道德、修齐治平之士的心血，可以浸石为玉，极为珍重宝贵。用“碧血丹心”为孙桂珍这位专克血液疾患的医林大家立意，应该十分恰当。

对患者——血总是热的

2009年，血液科收治了一位来自郯城县的重症青年女患者。经仔细诊断，病人得的是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因脑出血导致脑疝，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尽管病情严重，但孙桂珍对治疗此类疾病，早已胸有成竹，只是需要给他时间。数天过去，患者病情虽然趋于稳定，但仍然人事不省。其亲属不明病理医道，见此症状，焦虑不安，心头发冷，信心渐失，数次主动提出放弃治疗。然而，孙桂珍对患者的满腔心血，却始终是滚烫的。他决不忍心一个年轻的、有极大生还希望的生命，就此“长眠不醒”。他耐心反复地给其亲属讲述继续救治的道理，征得他们同意。同时，请来本院神经内外科的专家们，认真会诊，研究制定更加有效的治疗方案。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孙桂珍及同事们的精心治疗护理下，半个多月后，患者终于

苏醒过来，起死回生，其亲属一片惊喜。一个月后，病人康复出院。不久，他们专门前来致谢，给孙桂珍捎来一个个热乎乎的郯城大锅饼，意寓他医德医术圆满，感谢孙桂珍给了他们一个团团圆圆的家，也祝孙桂珍幸福圆满。现在，那位康复的女青年已经结婚嫁人，建立了一个圆满家庭。

1954年，孙桂珍出生于郯城县一个具有光荣传统的家庭。父亲是抗战时期的老革命，为国为民，满腔热血。孙桂珍从老一辈身上继承了这种“红色DNA”，对老百姓有着深厚感情，特别理解体谅他们的难处与不易，更加同情怜悯那些身患疾病、缺医少药者的痛苦与不幸，心中总是流淌着一腔为民祛苦造福之热血。1977年，他从沂水医专毕业，开始实现他悬壶济世的心愿。先于郯城县医院工作，1980年调入地区人民医院。30多年的心血付出，使他得到了业内与社会的充分肯定与褒奖。现在，他除了担任市院、市相关学会协会的专业主要负责人，还担任省医师协会、免疫学会血液分会副主任等职。2012年龙年伊始，他更荣膺“首届全市十大名医”之称号；他所领导的血液科与担纲的血液病学，被省卫生厅列为全省医药卫生重点专业建设单位与项目。所有这些辉煌的“金色品牌”，追根溯源、归根到底一句话：“热血铸就”。

造血干细胞移植，是治疗血液恶性疾病的有效、高端技术。但是，高端往往同时意味着高成本，一般医院难以开展，一般收入水平的患者常常望尘莫及。正因为如此，这一项目在全省的一些省级医院如省立、齐鲁、青医等，至今尚未开展。然而早在2004年，孙桂珍对此项目就已经“热血沸腾”了。他看到病人为了进行这项治疗，不得不跑到北京、天津的大医院，面临诸多困难与沉重负担：来回奔波难，寻找医院难，排队挨号难，医疗费用高，一般至少得数十万元，加上治疗周期长，亲属陪床负担也重，可谓不堪重负。所有这些困难与负担，压在孙桂珍的心头。他下决心，率领自己的科室开展这项技术，他提出的奋斗口号与目标是：“一切都要为患者着想，一定要让患病的老百姓在自己的家门口，享受到技术最先进、成本最低的医疗！”于是，从2004年开始，他把造血干细胞移植确立为血液科的发展重点。有了碧血丹心医林情，没有融化不了的困难坚冰。当年，他就带领大家为一位多发性骨髓瘤患者进行了第一例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获得极大成功。而治疗费用，比去上级大医院节省了一半还多，得到患者及亲属们的高度赞扬与信任。

自此，孙桂珍及他的科室，在移植手术上数量日益增多，技术日臻成熟完善。去年，一位在临沭县某工厂打工的云南大理彝族青年，不幸得了白血病，厂方十分同情，资助其部分费用，让其到北京、天津等大医院诊疗。厂方与患者经过奔波、考察，最后，比来比去，觉得还是在市院血液科治疗省时省力，方便放心。孙桂珍不但接收了患者，还为其进行了难度较高的“半相合”移植术，病人不但康复出院，而且节省了十几万元费用。

孙桂珍用自己的一腔心血，实现了自己的诺言。

孙桂珍是位学问高深的专家，又是一位善于用通俗形象的“平民语言”与人沟通交流的凡人。我们的“一席谈”之开始，未及我言“请”，他首先就给我来了一段“大白话”：“作为一个医生，讲医德，讲敬业，首要一条，就是对患者、特别是老百姓病人与亲属，要发自内心的同情热情与体贴。对他们来讲，大病如塌天，要承担多大的精神与生活压力呀。不论是干部、老板，还是平民百姓，不论地位身份、贫富差别，我们都要一视同仁。其病不论良性恶性，我们都要尽最大努力，争取最好的效果，就是承担风险，也责无旁贷、义不容辞。同时对一般患者要尽量少用专业术语，要用他们听得明白、能够理解的语言，耐心真心地与之‘拉呱’，尽力予以安抚，最大限度地缩小与患者的距离。特别是血液病，不但要讲为什么治，怎么治，对一些病期长、治疗时间长，治愈后还需要巩固治疗、定期诊治的病人，也要把道理讲透。就象侍候得了病的庄稼一样，消灭了病虫害，保住了性命，还得要经常耐心地为她锄草、松土、浇水、施肥等，才能最终收成。这样，病人才能配合治疗，保证疗效。如果你对病人高高地端着大夫的架子，一脸冰凉，一副不耐烦，再用些让他们听着象

天书一样的专业术语，必然拒人千里之外，又让人一头雾水。别说你治不好人家的病，就是给人家治好了，他都不感激你，都得说你的不是。”

谈到医患关系与矛盾，孙桂珍更有一个既定性及量化的独特判断标准，这是他长期观察与总结的规律性，十分易于“操作”：一般情况下，患者及亲属不会主动“找事”，他们求救治病还来不及呢！诊断治疗包括抢救，都需要必须的时间。作为急症危重患者，个别特殊意外，我们尽心竭力也无力回天，其亲属一般是能理解的。但是，如果一个病人在你这里看病治疗超过三天，他还不满意，还有意见，还能找出你的毛病，甚至“找你的事”，那肯定就是“你的事”。要么在表情态度上，要么在语言表达上，要么在服务环节上，要么在哪个细节上，你肯定有纰漏，有不足，甚至有问题。你若再不自觉改进，患者住的时间越长，意见越大，找事越多，一旦闹起来，你的问题越严重，责任越大。“时间就是考验，时间说明质量。”能把判断医患是非的问题研究观察总结得这么深刻而形象，让人叹为观止。

“怎样做人，对医生也特别重要。”这是孙桂珍的人生观与医德观的核心。他说，老百姓不易，很多还不富裕的老百姓有了病尤其不易。他都急得难得连命都顾不上了，你还吃人家的请，收人家红包，就是做人又良心何在？何况你还是一个治病救人、悬壶济世的医生呢！他坦言，从医这些年，他只收过两次“礼”：一位他治好的患者，为表救命之恩，大老远专程赶来，给他送了一份“厚礼”，计有：四块地瓜，一斤绿豆，二斤花生。对此，他也是极力婉言谢绝的，自己上初中的儿子劝道：“爸爸，别的礼，你可以不收也不能收，这份礼，你一定要收下。”最后，他收下了。他很欣慰，自己从老子那里继承的“热血DNA”，遗传到儿子身上了。

医院为扩大宣传交流，促进医德医术的提高，在全体人员中搞了一次“我的格言”征集活动。孙桂珍不假思索、不着修饰地发表了自己的座右铭：“病人理解，是我最大的心愿”。朴实无华，简洁明了。

这恰恰是孙桂珍碧血丹心医林情的最好写照。

对医术——呕心沥血

急性白血病起病急，病人常有发热、贫血和出血三大症状。除皮肤粘膜出血外，尚可内脏出血，而颅内出血又是白血病致命的原因，一旦发生，十分凶险，常可导致早期死亡。此病虽可治疗，但是必须给医生提供必要的治疗时间与机会。这就是能使患者保持情绪与身体的绝对安静与平静，最大限度地减少出血危险。然而患者往往由于身体不适与情绪紧张，更加容易激动，焦躁不安，难以控制，结果导致“血的悲剧”。这一矛盾与难点，一直制约着白血病的治疗，也纠结着孙桂珍的心。

2006年，一位年仅9岁的急性白血病患儿住进了血液科。其时，孩子的眼球结膜已出现明显出血，预示已有或潜在脑出血的危险，这引起孙桂珍的极大担心和重视。偏偏患者从小娇生惯养，受不了疾患痛苦折磨，不时又哭又闹。正当大家束手无策之时，孙桂珍突然灵机一动：既然必须先让孩子镇静下来，完全可以用一点镇静剂之类药物呀。于是，他毅然决定给患儿服用一点“地西潘”，这是最一般也很安全的安定类药物。果然收到了意料之中的“奇效”：孩子从此不再一个劲地哭闹，相对安静下来。孙桂珍抓紧这一机会与一段时间，对患儿实施主要药物治疗。不久，孩子痊愈康复。这次偶然的发现让孙桂珍敏锐而牢牢地抓住了。在以后几例同类患者的治疗中，慎重地再行实验，结果屡试不爽。他立即做为一个科研课题上报，得到批准。最终，充分肯定了这一重大突破性成果：“用地西潘预防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早期死亡”，安全实用，效果明显，费用低廉，一举获得全市医学科技进步二等奖，也在全国达到领先水平。

孙桂珍天生是个特别爱动脑子、喜欢钻研的人。遇到什么问题，总爱打破沙锅问（纹）



到底。从医之后，为民造福的一腔热血与高度责任心，又促使他在攻克医学老、大、难问题上倍增韧劲，在创新突破上倍添勇气，可谓费尽心血，呕心沥血。

应用“DAE方案（药物综合治疗）”治疗急性单核细胞白血病，是国外创造发明。但直到上世纪末，国内尚未应用。早在1991年，孙桂珍就及时发现并加以引用，取得良好效果。他把这一案例及时发表在《中国实用内科杂志》上，领先于国内，引起行内高度兴致与关注。目前，“DAE”已成为治疗同类疾病的经典方案。

2004年，他在造血干细胞移植上实现突破后，再接再厉，不断前进，于2006年成功开展了亲属间异基因全相合造血干细胞移植；后来，他更上层楼，成功开展了异体半相合干细胞移植术，达到全国先进水平。再后来，他继续紧跟国内外先进治疗理念，把目光直接瞄准了“造血干细胞二次移植”这一前沿目标。对多发性骨髓瘤，目前国内外大多采用二次移植的方法，以达到最佳治疗效果。而进行这一手术，最关键的是骨髓造血干细胞冻存技术。这项技术，标准极高，要求极严，按国内标准，造血干细胞在超低温下冻存半年后，经复温，细胞成活率必须达到80%以上，冻存两年后达到70%，才可用于病人二次移植。孙桂珍积极引进这一新技术，一次为病人采足两次使用的造血干细胞，把备用的一份，混合二甲亚砷和白蛋白，经处理后，在零下80度的超低温环境下，冻存6个月；在移植前，对复温后的造血干细胞进行了检测，细胞成活率达到85%以上，再经干祖细胞培养，其细胞集落形成也完全符合二次移植的标准。在此基础上，他们为患者实施了二次移植。手术后，经精心护理，患者康复出院。此项技术，为二次移植打下了坚实基础，创造了必备条件。

免疫治疗，也是治疗多种血液病的有效措施之一。在孙桂珍的倡导下，血液科与天津血液病研究所、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齐鲁医院等合作开展此项目，特别是在省内率先开展了大剂量环磷酰胺治疗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取得了可喜的临床效果。

孙桂珍不但精通西医，对中医也颇有研究，在中西医结合治疗血液系统疾病上，也有不同凡响之举。溶血性贫血、再生障碍性贫血等常见病，不少患者属于自身免疫机理致病，也是老大难。传统疗法，多采用激素类药物。但是这柄“双刃剑”之副作用，常常让人难以接受。一是用药时间一长，反而对免疫系统形成过分抑制，造成并发感染，甚至引起股骨头坏死。二是导致肥胖臃肿，尤其让女性患者畏之如虎。孙桂珍用心研究，融合中西，减少激素类西药，增用中药雷公藤多甙，既提高了治疗效果，又避免了激素药的副作用。

在医术上呕心沥血，使孙桂珍不但不断创造着国内先进、省内率先等骄人成绩，他开展的凝血因子测定还填补了我市空白。他虽然已是经验丰富、学识丰厚的专家，但从不放弃探索追求。近年来，他又致力于“发热原因待查”、“淋巴结肿大”、“骨髓干细胞移植后并

发病”等课题的深入探索。

他共主持完成省市级医学科研课题7项，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30余篇，主审、副主编、参编著作6部。

人们的眼球往往注目于让人青睐的累累硕果，但少去探究培育者付出的艰辛。孙桂珍告诉我，从年轻时起，他就强迫自己养成了一个习惯：这些年，他家的电视平时晚上一过七点半，看完“新闻联播”，就被自己强制叫停。或者是通宵达旦，或者是夜半三更，这其中的时间，他都用来读书学习，研究专业，考虑问题。至少在升任主任医师前，他没改变过这种习惯。他常常半嗔半真地告诫科里的年轻人：不要一打开电视，就整夜整夜、没完没了地从第一频道换到最后一个频道，从连续剧换到广告。更不要一见扑克心就发痒，摸起牌来就“爱不释手”。把精力与爱好、时间与心血多用在学习充电，钻研专业上，才是业内正道。基础不牢，怎么成就学问大厦？满足现状，怎么能为人先？

孙桂珍还有一个名震临沂的桂冠：知名收藏家，重点是字画，也是中国的国粹之一。此本来只是他一项无意激发的业余爱好：装点一下自己的房间，从中受点文化熏陶，多一点儒雅的思考与沉静，少一点急功近利的浮躁与虚荣。不意无心栽柳柳成荫。这“柳荫”，同样发源于他喜欢钻研。正如院长尹传贵所说：“孙桂珍，你聪明就聪明在搞了收藏上。”院长话里有哲理。孙桂珍首先钻研的是收藏中的文化，文化中的人文，人文中的社会，社会中的医生与患者。最终还是联系着自己的本职。他举了一个例子：要收藏真正的文化精品，你不深入研究能行吗？现在到处是膺品，没有真眼力，必定要上当。如同当医生，你不满腔热血地对待患者，不殚精竭虑地研究医术，那不成了“医林膺品”，成了庸医？庸医最终是逃不出患者眼睛的，是要被社会抛弃的。

——医林精品，也是呕心沥血炼成的。

对同事——血浓于水

在血液科刚从大内科独立出来时，孙桂珍就担任了科主任。时光荏苒，日月如梭，一晃就是20多年。

谈起自己的团队，孙桂珍掩饰不住的自豪与欣然。他说，血液科，是医院公认的和谐团结、生机盎然、开拓进取、成绩斐然的团队之一，是一脉健康、热情、充满活力的“血液”。

他率领与凝聚这个团队的“秘笈”，仍然是他的一腔热血与真情，内核是：对同事，对团队，总是血浓于水。

无论是对“同行是冤家”的自私封闭的旧行业传统观念，还是对今天正在不断恶化的“利益是根本”的人际间的“油水关系”，这种同事间、人际间“血浓于水”的理念，都是一种正本清源，都是一种真情回归，都让人感到那么亲切亲近，又那么振聋发聩。

他说：血浓于水，就是把科室当作一个血缘之家来看待。我们都是一家人，事业亲是“本”上亲。又象两口子过日子，都是为了这个家庭圆满幸福，兴旺发达。情深才能心齐，心齐才能共力。如果各存各心，各争各利，这个家庭不四分五裂就不错了，还谈得上什么兴旺发达？

他说：要当好一家之长，首先你得有个家长心、家长情，就是你得一心为大家，顾大家，为“全家”谋利益，图发展。而对自己，一无所求，别无所图，这是家长的责任，也是义务。这些年来，不管我为科里做了什么，为大家做了什么，我什么好处也不要。大家想着你，你应当心存感激，就是想不到你，你也应当毫无怨言。谁让你家长呢？听了他的这番话，我不由想起了人血液中的健康血细胞：辛辛苦苦，兢兢业业，为人的一生输送着丰富的氧气和营养，抵御着各种侵袭伤害，弥合着创伤，调节着机能，维持着内环境稳定，无怨无悔

悔、无私奉献着自己的一切，然后默默无闻地再生再造，循环往复。如果每位“家长”都有这种血浓于水的感情，都有这种顾全大家的健康“血细胞”精神，这个“家”，肯定生机无限。

他说：当个一家之长，必须一视同仁，公平待人。在一家人中，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离开谁也不行。他是传统的“大医生、小护士”观念的坚决批判者与颠覆者。他特别重视护理工作，特别尊重护士长。“其实，在医院的一个科室中，护士长这个位置特殊重要。她好比是根‘揽腰绳’，把诊疗与护理、医生与护士都有机地联系到了一起，团结在一起。离开了这根‘揽腰绳’，各项工作，各方面人员，就很容易散了伴儿。”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位好护士长，他才省了不少心，大家才更齐了心。

他给血液科提出的“建科精神”是：“科有特色，人有所长”。为了最大限度地调动每个人员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强化每个人的责任感与事业心，他独树一帜，学习企业的管理办法，大胆放手，在科里实行了“最小单元管理化”制度，把床位分别分配到几个医护人员身上，每一组形成一个医护单元，全方位、全程负责。同时，按医疗项目的不同，实行了“项目经理制”，同样建立该“项目”的负责制。从而，对全科所有人员、所有工作实现了责任的全覆盖、总落实。孙桂珍的这种管理，显得有点过于放手，过于大胆。院长尹传贵对此不无担忧，提醒他：“老孙，这几个‘项目’，你可得给我罩住了。”他淡定轻松地一笑。他用各个“单元”与“项目”卓有成效的工作和不断发展的成果，给院长交了一份让他放心的答卷。

而让孙桂珍最满意满足的是，他的“血浓于水”的理念与真情，形成了强大的亲和力、向心力、凝聚力，以科室为家早已变成了大家的自觉行动。尽管各人的“小家”都有忙碌之事，但只要是科室“大家”需要，只要他一声召唤，所有的“大家成员”，无一不舍小家顾大家，积极响应，出计献策，尽心尽力。

孙桂珍所带领的团队——血液科，已发展成我省目前规模最大的血液病专科，市医学重点专科。年收治各类血液病患者2000多人次，出院病人数量连续7年居全省第一。在常见血液病诊疗上，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在出血性疾病、贫血性疾病、各种恶性血液病上，均能做到分层化、个体化优化治疗。并能参照卫生部关于血液病8个病种的临床路径，规范化地治疗MDS、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多发性骨髓瘤、血友病和免疫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原称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等，均取得了良好的临床效果。

科室重点项目“造血干细胞移植”，更是配套成龙，臻于完善。移植室设有两间百级无菌层流病房，引进世界先进的全自动血细胞分离机。在移植病人数量与质量上，走在了全省前列。2011年，移植病人数量，除解放军90医院外，居全省地方医院第一，移植成功率达到100%。血液科也成为临沂市乃至鲁东南地区造血干细胞移植中心。

血液科下属的血液实验室，已发展成为临沂市乃至鲁南地区唯一一所有一定规模的血液病专业实验室。占地面积达到260平方米，设有骨髓细胞形态分析室、细胞组化分析室、血液病染色体分析室、细胞免疫学检测及基因检测分析室、干细胞分析室、血液病实验分析室、血栓/止血室、临床细胞室等8个独立的实验室。与省立医院、齐鲁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天津血液学研究所、解放军301医院等著名院校合作。有的项目达到国内先进水平，有的则填补了省、市内空白。获得市科技进步奖8项。可谓成绩卓著。

血液科每年都要举办临沂市血液病学会，并成功举办了鲁南血液病高峰论坛、山东省血液医师协会第三届学会，已完成并获奖科研课题12项，现正承担省科研攻关课题1项。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

2010年，经市卫生局、科技局、民政局批准，成立了“临沂市医林血液病研究所”。孙桂珍作为所长、法人，正致力于把血液病的常识、预防、治疗、研究推向更大空间，提升到新的层次，让更多的人有一脉健康新鲜之血液，有一腔和谐仁爱的热情之血。

与孙桂珍一席谈，笔者感受至深，受益匪浅。无以表达敬意，谨借当年为国人求福祉洒热血的革命女豪侠——秋瑾女士的《饮酒》诗句献上：“一腔热血勤珍重，洒去犹能化碧涛。”

姓氏百家漫谈——陈姓 (中)

赵丹峰

明清时期，一批陈姓人士分别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政治、经济方面，陈诚和陈瑄颇有建树。明成祖朱棣即位后，为强盛国运，确立了“怀柔远人”的对外交往方针，力求与周边相邻诸国和睦相处，通过采取来使朝贡和遣使封赏等形式，与周边邻国建立、加强了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联系，为大明早期的发展营造了一个较为有利的周边环境。陈诚，则在明王朝开展的这一成功的政治外交活动中，不辱使命，堪当重任，做出了可圈可点的杰出贡献。陈诚系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进士，永乐十二年（公元1414年），时任吏部员外郎的陈诚与户部主事李暹、宦官李达受命以护送来朝贡的哈烈（一名黑鲁）使者返国的名义出使西域，并诏谕西域各部。他们西出嘉峪关，走遍西域各地，向所经各城邦首领赠送货物，建立联系，次年返回。1416年夏，陈诚又与宦官鲁安再次随哈烈来使出使西域，开展对外友好交往活动。此后，陈诚又数次出使西域。经陈诚的交往努力，西域的哈烈、撒马尔罕、八答里商、迭里迷、阿鹿海牙、赛蓝等计有17个地区先后接受明朝的招抚，并相继派使者随陈诚等到大明朝贡文豹、西马等珍物。如在1419年，哈烈即派出由500余人组成的使团和商团，经肃州、甘州，到达北京朝贡，并进行互惠贸易。继之，元代西域色目商人来内地经商的道路亦重新开通，一度萧条的丝绸之路又呈现出马队往来、驼铃叮咚的繁忙景象。陈诚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撰成《西域行程记》和《西域蕃国志》，对西域诸国的山川、人物、风俗等情况，作了详细地记述，为研究西域提供了宝贵资料。陈诚等出使西域，既巩固了大明西部边陲的安定，又加强了大明王朝与西部各部族及中亚各国之间的联系，促进了大明与西域的经济、文化交往，其意义是重大的。陈诚作为杰出的外交家而名垂青史。

陈瑄亦系明代大臣。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北京辽东仓储不足，朝廷遂命任总兵官的陈瑄督理海运，通过海上由南而北运粮。三年后，朝廷又命其兼督江淮河卫转运，江南粮米遂实行海、陆兼运。为了加快调粮速度，陈瑄通过实地勘察，根据内陆河道水浅面窄的实际情况，对运粮船体进行了改进，于永乐九年六月，打造了2000余艘平地浅船，投入河运后，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陈瑄督理漕运30余年，凡所规划皆精缜宏达，举无遗策。为促进南北经济与文化的交融，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明代，还有一位籍系沂州的大臣值得一书：陈玉，系沂州（今临沂城）人。弘治六年（1493年）进士。三年后授监察御史，因为官清正敢谏，举朝皆惮其风采。不久，又相继调任京师直隶、浙江、福建督学，在任期间，正身率物，斥黜浮伪，择优取士，以正士风。后官至都察院右督御史，成为明代最高监察大员，与六部尚书合称为“七卿”。明武宗朱厚照即位后，太监刘瑾擅权，朝中官吏慑其淫威，多向其谄媚，而陈玉却守正履职，不畏权势，一度严词拒绝了宁王府的贿赂。乞休归里时，朝廷决定仍给其月俸和舆夫，明世宗朱厚熹亲写诏书对其功勋加以褒美。由于陈玉为官清廉，家中只有薄田80亩、住宅一处，与其长期所

居的高位相比，颇显寒苍。陈玉善诗文，其诗散见于方志者有8首。其中《缆夫谣》是一首描写拉船纤夫繁重劳动与悲惨生活的诗作，其中如“官船无停时，风雨共来往，腰间有升秫，草炊充一饷。掬水向河圩，水浊涸吻强”。“揭衣渡横波，双足刺菰蒋。足趺岂敢恤，抑恐负笈杖”。“仰观舟上人，鼓吹隔帘幌”等诗句，读之令人心酸、心碎，决没有歌曲《纤夫的爱》所营造的那种所谓“在纤绳上荡悠悠”的浪漫情调与轻松气氛。

凡是了解中国近代史的人都知道，1840—1842年，英国对中国发动了鸦片战争，腐朽的清王朝抵不住英帝国的坚船利炮，为达求和目的，最后以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为沉重代价，使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应当指出的是，虽然清廷腐朽、国运衰败，但中国军队中仍不乏铁骨铮铮的爱国忠勇将士，陈化成便是其中一位慷慨悲壮的铁血军魂。陈化成系行伍出身。清道光十九年十月，时任福建水师提督的陈化成，率部驱逐了骚扰闽海的英国军舰。同年十二月（1840年1月），调任江南水师提督后，他便率军民加强吴淞口的防御设施，在此筑台置炮，并亲自驻扎防守。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五月，在英军直逼吴淞口时，陈化成对部属慷慨明志道：“人莫不有一死，为国而死，死也何妨？”农历五月八日（6月16日）晨，英军战船和武装轮船14艘向吴淞发动总攻，陈化成督部向入侵者猛烈发炮，击伤英舰多艘。两江总督牛鉴畏敌溃逃后，英军从后路抄袭西炮台，置生死于度外的陈化成亲临前线督战，率部英勇抗击敌人，最后亲自点放火炮，致以佩刀接仗，负伤8处，直至壮烈殉国。这位死后被谥“忠愍”的一代抗英名将，将为国人世代铭记。

在文化领域，颇有建树的陈姓人士：陈淳和陈道复系明代中期水墨写意画的代表性画家。陈淳所作花鸟树石生动有韵，淡墨欹毫，极为逼真。他与稍后的徐渭并称“白阳青藤”，被尊为一代宗师。陈道复的画亦极富个性色彩，所画花卉淡墨浅色，疏斜历乱，风格松爽，生意盎然，对近代写意花卉国画的创作，产生了极大影响。传世作品主要有《山茶水仙图》、《秋葵图》、《瓶莲图》等。其子陈括，亦属当时画界大手笔，所画花卉，颇有父风。陈继儒和陈洪绶是明代后期影响中国画苑的著名画家。陈继儒善画水墨梅花，其画作的特点是，看似漫不经心，随意草就，却潇洒苍劲，造诣深厚，气势宏大，以画寄情。他认为书画同源，妙在笔墨韵味，一幅精品，既出于画家本身的画技，更在于作者的学识修养。代表作有《梅花册》、《云山卷》等。其书法雅而有致，书风在苏轼、米芾之间。陈洪绶是位有骨气的画家，清兵入浙后，以刀逼其作画，他凛然不从。后剃发为僧，表示不做清朝顺民。不久还俗，在杭州卖画为生。他同情下层民众，平生喜为贫不得志者作画，若家富势豪



者向其索画，虽千金而不为其搦管。陈洪绶善画人物，所作躯干伟岸，衣纹细劲清圆。晚年作品，造型夸张，突破陈规。亦工山水、花草，其山水画苍老润洁，具有装饰味；花草画则勾勒精细，设色清丽。

陈第是明代著名的音韵学家。这位万历秀才出身的学者，一生从事古音研究，认为“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指出语音是发展的，古今音并不相同。他的理论及研究成果，对后世音韵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被誉为中国古韵学的开路先锋。传世著作有《毛诗古音考》、《读诗拙言》、《屈宋古音义》等。陈确是明清之际著名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他一生对宋明理学和佛教持批判的态度，针对《大学》“知止于至善”的观点，他认为，没有绝对不变的所谓“至善”标准。他反对朱熹“一旦豁然贯通”的观点。认为人的善恶取决于后天积习，主张“气”、“才”、“性”三者不能分立。他的这些唯物主义思想，富有批判进取精神，在当时理学说教占统治地位的大环境下，显得尤为可贵。

此期，在文学方面，颇有成就的陈姓人士主要有陈铎，明代著名散曲家。他工诗词曲画，精谱音律，当时南京教坊中人称之为“乐王”。所作《秋碧乐府》、《梨云寄傲》、《月香小稿》等，多写闲情逸致和风情月韵。但他的《滑稽余韵》收小令136首，广泛地描写了当时60余种行业和30余种店铺经营，是明代中叶城市生活的真实写照。如《水仙子·葬士》写道：“寻龙倒水费殷勤，取向金穴无定准，藏风聚气胡谈论。告山人须自衬：拣一山葬你先人，寿又长，身又旺，官又高，财又稳，不强如干谒侯门？”寥寥几笔，就将巫师、葬士等一干寄生虫的丑态勾勒得惟妙惟肖，使他们的骗人伎俩暴露无遗，文笔幽默辛辣，针砭入木三分。

陈子龙乃崇祯进士出身，系明末文坛领袖之一和南明抗清将领。清军破南京后，他在家乡松江（今属上海市）起兵后，称监军。事败后避匿山中，结太湖兵抗清。后组织松江二次起义失败，在苏州被捕，解送途中，乘隙投水死，以身殉国。其文学主张继承前后七子传统，强调诗歌的忧时托志作用。早期诗文多师法魏晋。清兵南下后，其诗词多系感时伤事之作，悲愤苍凉，风格大变。前人誉为明诗殿军。其在崇祯十年（1637年）前后写下的《辽事杂诗》8首，便是陈子龙心系国家安危的忧愤之作。如其中第七首诗这样写道：“卢龙雄塞倚天开，十载三逢敌骑来。磧里角声摇日月，回中烽火动楼台。陵园白露年年满，城郭青磷夜夜哀。共道安危任樽俎，即今谁是出群才。”此时的明王朝内忧外患相加，历史处于多事之秋。“辽事”即辽东边事。1636年，皇太极即后金国皇帝位，改国号为“清”。大清对大明的侵扰日甚一日，大明北部的雄关险阻一再被清兵冲破，而朝廷已显露出无人承担御敌守邦的衰败气象。此诗正是陈子龙既担心明王朝即将走向衰亡，同时又期望力挽狂澜的旷世英才早日出现的矛盾心理的真实袒露。其心忧天下的爱国情怀着实令人感佩。

陈维崧乃清代著名词人和骈文家，清代词苑阳羨派领袖。康熙十八年（1679年）举博学鸿词科，授翰林院检讨，参加修纂《明史》。他与词结缘，一生填词1600余首。词作高歌壮语，气势豪迈，长调小令，运用自如。陈维崧生于政治文化世家，其祖父陈于廷、父亲陈贞慧皆为明末东林党的中坚人物，他少年曾师从陈子龙等。在这种环境的熏陶下，他亦满怀政治抱负，所以其词作多表现出虽壮志未酬，但壮心不已的豪气。陈维崧很喜欢写鹰，亦常常以鹰自比。在《地震行》中说：“欲归未归不称意，攫翅学作饥鹰呼。”在以鹰为题材的词作中，其《醉落魄·咏鹰》颇具代表性：“寒山几堵，风低削碎中原路。秋空一碧无今古。醉袒貂裘，略记寻呼处。男儿身手和谁赌？老来猛气还轩举。人间多少闲狐兔，月黑沙黄，此际偏思汝。”此词借鹰抒情寄怀，表达了作者希望如鹰击狐兔一般，一举扫除人间兽类邪恶的心愿。此词风格豪放，几近宋代苏辛二家。

近现代以来，相继有一批陈姓人士彪炳史册。他们中，既有著名的民主革命斗士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又有实业界精英和文化界大师及其他名人。受篇幅所囿，仅举要述之。

陈天华是著名的民主革命家和作家。他于1903年赴日本留学，与黄兴等在日从事反清革命活动。以通俗的白话唱体著《猛回头》和《警世钟》等，宣传革命思想，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翌年回国参与组织华兴会，起义之事未成，又流亡日本继续从事革命活动。1905年参加发起同盟会，担任书记部工作和《民报》编辑。同年11月，日本政府颁布《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为抗议这一刻意约束留学生斗争的规则，陈天华于12月8日愤而投海自溺而亡，并留下绝命书，鼓励同盟会诸同志要誓死救国。有《陈天华集》传世，今日读之，仍令人心绪难平。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和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两起影响和改变中国社会历史发展方向和中华民族命运的伟大事件，这两大再造乾坤的事件均与一个陈姓人士紧密相关，他就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毛泽东语）和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与首任总书记陈独秀。陈独秀，安徽安庆人。1903年，陈独秀赴日留学期间，曾果敢地剪掉了思想顽固的湖北留日学监姚煜头上的辫子。次年回国后，陈独秀便开始致力于剪除国民思想深处的“辫子”。1904年，26岁的陈独秀创办《安徽俗话报》，撰文直指中国的三害是“官僚、军人、政客”，切中时弊。1915年，他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因倡导反对旧伦理和旧文化而名噪一时，成为公认的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一面旗帜。1917年，被刚上任的北大校长蔡元培聘为文科学长。翌年，与李大钊一起创办《每周评论》。“五四”运动爆发后，陈独秀挺身而出，成为这场运动的主导者。1919年6月11日晚，陈独秀站在新世界屋顶花园，向下层露台上看电影的群众散发他手写的《北京市民宣言》，呼吁政府免去曹汝霖等人官职，还市民以言论自由。此时，“五四”运动浪潮正日趋低缓，被捕的千名学生正被陆续释放。陈独秀的行动，将整个运动向纵深发展作了有力的推动。当晚，陈独秀被捕。陈独秀被捕的消息传至湖南后，毛泽东遂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撰文高呼“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陈独秀获释后，李大钊护送其去上海，两人在途中商谈建党问题。到上海后，发起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1920年8月，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基础上成立了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开始向苏皖浙等地发展组织。在陈独秀的推动下，一批共产主义小组相继在北京、湖南、湖北、广东等地成立，为中共一大的召开打下了基础。1921年7月，在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中央局书记。后被选为第二、第三届中国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第四、第五届中央委员会总书

记。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东方支部，一切重大行动均需听从共产国际的安排与决定。当共产国际提出国共合作时，陈独秀等认为中国建党不久，在自身力量还相对较弱的情况下，不宜与国民党实行体制内合作（即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但此议无果。1926年“中山舰事件”后，国民党右派排斥中共的论调博兴，陈独秀正式提出中共应整体退出国民党，由体制内合作改为党外合作，但遭到共产国际的否决。1927年，蒋介石发动“4·12”政变，大批共产党员遭到杀害，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和陈乔年先后被捕，英勇就义，成为中共历史上著名的昆仲双烈。陈延年和陈乔年在赴法勤工俭学时加入共产党，其中陈延年在1922年6月召开的中国旅法少年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与赵世炎、周恩来等同被选为执委会委员，后成为中共旅欧支部的负责人之一。不久转苏联学习，回国后成为党的重要领导干部，先后担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中共江浙区委书记和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系中共五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其弟陈乔年亦系中共旅欧支部成员，回国后相继担任中共北方区委组织部长、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等职，在中共五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当时，中共第五届中央委员共有32人，陈氏父子三人皆名列其中。在党的会议上，父子之间均以同志相称。大革命失败后，1927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改组，陈独秀被冠以“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受到批判，离开了中央领导岗位。1929年7月，因其在“中东路事件”问题上发表对中共中央的公开信，触犯了苏联的国家利益，于同年11月被开除出党。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被国民党逮捕，后被移送南京老虎桥监狱。在狱中，他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屈服妥协。在社会各界的声援下，陈独秀于1937年8月23日获释。出狱后的陈独秀，断然拒绝国民党封官许愿的利诱，亦谢绝朋友要他去国外讲学的建议，一心想去延安，重回党的怀抱和革命队伍中，他托人转告中共驻南京的代表，说明自己早已与托派断绝联系，对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表示拥护，他亲自修书一封，并起草了抗日的七条纲领，托罗汉转送中共中央。遗憾的是，由于王明、康生秉承共产国际和苏共的旨意极力阻挠，并给其加上“汉奸”、“托匪”和拿300元津贴的“日本间谍”的帽子，终使其重回革命队伍的心愿未能实现，只好漂零到四川江津，过着十分清苦但却相对自由的生活。他曾赋诗曰：“悠悠道途上，白发污红尘。沧海何辽阔，龙性岂能驯。”晚年的陈独秀，一是开始研究文字学，二是开始思考民主的价值。他在1940年9月《给西流的信》中指出：“民主是自古希腊、罗马以至今日、明天、后天，每个时代被

压迫大众反抗少数特权阶层的旗帜。”

对陈独秀的处理，党内一直有不少人为其鸣不平。王若飞就是颇有代表性的一位。毛泽东虽然对陈独秀有些批评，但他对陈独秀基本上持比较公正的求实态度。他在1945年中共七大的预备会议上讲话时，称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建党有功”。并对美国记者斯诺说，“他对我的影响也许比其他任何人的影响都大”。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在《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中指出：“过去常说十次路线斗争，现在应该怎么看？彭德怀同志那次不能算了。刘少奇同志这一次也不能算了。这就减去了两次。林彪、江青是反革命集团。陈独秀，还有瞿秋白同志、李立三同志这三人，不是搞阴谋诡计的。”1984年，胡耀邦在修改一篇关于陈独秀的文章时说：“第一次大革命，在那种条件下，陈独秀是很难不犯错误的”。他继而指出：“写陈独秀这种对革命有过很大贡献的历史人物，要像鲁迅写章太炎那样，有一种深邃的历史眼光，采取厚道公正的写法，这样才能正确评价前贤，深刻吸取历史教训，使后人收到教益。”近些年来，随着大量内部材料、苏共有关档案解密，人们发现，在当时的情况下，陈独秀这个总书记非常难当，从1923年到1927年的5年间，苏共中央政治局针对中国革命问题先后作出738个决议。目前，党史界、史学界和文化界的一大批学者，通过对大量新发现的原始史料、重要文献的了解与研究，已基本上形成共识：从党的领导角度来看，陈独秀作为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对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当然应负有责任，但不能负主要责任。因为向国民党新右派退让的政策和主张，实际上是共产国际、联共中央、苏联顾问、共产国际代表的决定。后来对陈独秀的批判与组织处理，也是中共中央听从莫斯科的旨意所作出的，陈独秀成了事实上的替罪羊。2002年出版的中共党史一卷，正式将陈独秀的错误从原来的“右倾投降主义”换成了“右倾机会主义”。两年后，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纪念任弼时诞辰一百周年的讲话中，在涉及陈独秀的错误时，又进一步去掉了“机会主义”四个字。这是到目前为止，中央领导人对陈独秀错误定性的最新说法。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前后，又有一批学者和党内高级干部向中央建议，恢复陈独秀的党籍，承认其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历史地位。这不仅使人想起了1942年5月陈独秀逝世后，在其遗像边悬挂的一副挽联：“纵浪人间四十年，我知我罪两茫然；是非已付千秋论，毁誉宁凭众口传。”笔者相信，将实事求是作为自己思想路线与实践指南的中国共产党人，定会在不久的将来，为这位已逝世七十周年的先贤做出公正准确的“盖棺论定”。



陈独秀塑像

沂南汉画像石上的乐器种类

桑玉厚

汉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经济文化的一个繁荣时期，这种繁荣也表现在音乐艺术上。汉王朝建立之后，曾先后派张骞和班超出使西域，开辟了沟通东西方的“丝绸之路”，吸收了各民族和异域他国的音乐精华。汉武帝时又扩充了乐府机构，增加了乐舞艺人，在中原固有的古典音乐的基础上，注入了新的声律乐谱，一改过去“楚声”独秀的局面和宫廷雅乐的沉闷基调，创造出了许多优美动听的新乐曲。

汉代在乐器方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丰富，在出土的各种汉代文物中已得到了充分的反映。汉代的乐器主要由击乐器（鼓）、弦乐器（瑟）、管乐器（笙、排箫）等三类构成，而最基本的配器原则是以瑟、笙、排箫等演奏旋律，以“为群音之长”的鼓控制节奏。乐器中不仅有中原古乐中的古老乐器，也有从西域、中亚和北方民族传流过来的弹拨乐器、打击乐器和吹奏乐器。汉代的乐器主要有盘、钟、铙、埙、排箫、竽、笛、笙、琴、瑟、琵琶、鼗鼓、鼙鼓、建鼓等，不仅可以演奏有一定节奏感的雅乐，而且可以在许多乐器的配合下演奏出完整的合奏曲和军乐，从而使汉乐进入一个辉煌的时期。

一、“八音”齐备的沂南北寨“乐舞百戏图”



图1

北寨墓群一号汉画像石墓中室东壁横额刻“乐舞百戏图”。在长236cm，宽50cm的画面上，从左至右依次为四组：第一组刻杂技表演，内容有飞剑跳丸、七盘舞、戴竿之戏。第二组为乐队，共15人演奏，分上下两组：上组为雅乐，由鼓、钟、磬三种乐器及乐人组成；下组由三排敲鼓、吹箫、捧笙、鼓瑟等乐人组成。第三组为鱼龙曼衍之戏，由走索、龙戏、豹戏、雀戏、鱼戏和奏乐六组组成。第四组为马戏和戏车。“乐舞百戏图”是沂南北寨汉画像石中人物表现最精彩、最生动的一幅。参加演出的演员、侍者有52人。表演者形象动作各不相同，恰到好处，其间还有以小队奏乐的和送茶水的人穿插其间，增添了生活情趣，可谓匠心独运。整个画面生动展现了一个茶茗酒香扑鼻、流光溢彩迎面、鼓乐丝竹绕耳的乐舞场面，活现出各种精湛绝伦的演技和狂奔、旋转的速度，让人目不暇接、过目不忘。“在汉代画像石中，有许多表演乐舞百戏的图景，但称得上大结构、全景式的画像，莫过于沂南北寨墓画像石的乐舞百戏画像。”（李建平、任世忠《沂南北寨汉画像石刻造型艺术初步研

究》)“这幅百戏图场面之宏大,门类之繁多,在汉代画像中首屈一指,是记录我国古代乐舞杂技艺术最为丰富的一幅造型艺术作品。”(蒋英炬:《山东沂南汉墓画像石·序》)

第二组所刻分上下两组的乐队,上组的雅乐,由鼓、钟、磬三种乐器及乐人组成。最前是一面大的建鼓,树在架子上。鼓腹有卷云纹,鼓面有齿形组成的圆圈纹。架子下面四足,上面有两层圆幢,下层的较大,上层的较小,似用丝帛制成。架顶上立着一只长冠长尾的鹭鸟。幢的两旁,披拂着两层带节系纓的长的东西,这是羽旄编成的葆,即羽葆。鼓的一旁,站着一个戴平顶帽子的人,两手各举一槌,正要打鼓。其次是一个大木架称为虞的,用环悬着两个大钟。虞的两柱带纹饰,下面各有两足,钟上有纹饰,纽作半环形。虞旁站着一个戴平顶帽子的人,用两手扶着一根从梁上用宽带垂系着的长槌在撞钟。最后是一架两柱及横木均带纹饰的虞,其上用带悬着四个刻有纹饰的磬。虞旁有一戴高冠的人坐在一块小方席上,右手执槌在敲他自己前面的那个磬。这人的身后还有一头上戴着圆顶小帽的人端坐着。下组由三排乐人组成,乐人都坐在长席上。第一排是拊节的女乐,计五人,头上都梳着髻鬢,并戴笄。她们的面前有四面状如小鼓的“节”。画面最左一人右手拿着短槌在指挥,左手拊节。其次一人右手略伸,左手拊节。中间一人右手伸着,似乎拊其右一人的节,左手亦略伸。第四人右手伸着,用手拊其前的节,左手亦略伸。最右一人袖手端坐着,前面摆一面节。第二排是吹排箫的男乐人,也是五人,头上都戴着前低后高的平顶帽子,嘴上有须。画面最左一人左手拿着锤子在敲一个有柄的、带花纹的铙,右手拿着排箫在吹。其次一人和中间一人都是右手拿着排箫在吹,左手微举。第四人双手捧着排箫在吹。最右一人双手捧着埙在吹。第三排是管弦乐,计男四人,头上都戴着高冠,嘴上有须。画面最左一人右手的衣袖高挽着,正用右手弹瑟,左手扶着瑟的一端。其次一人两手均放在口旁,似乎在吹什么,但看不见东西。第三人袖手端坐着。最右一人两手捧着笙在吹,笙的长管上还飘着两条纓带。在后两排乐人之间,有一三足圆盘名为旋的,其上置一圆器名为斛的,斛内还有一勺,旋及斛均有花纹。在第三排乐队之后,有个戴矮帽子的人,两手捧着一个小的旋,里面盛着四个杯子,向乐队走来。这人似乎是送茶水来的。

在乐舞百戏图的此组乐队中,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音齐备,这是目前全国所见唯一的八音齐全的汉画像石乐舞百戏图!

“八音”是中国古代对乐器的统称,指金、石、土、革、丝、木、匏、竹八类。“八音分类法”即是指中国古代按乐器的制作材料分类的方法。“金”指用金属制作的乐器,如编钟;“石”指用石头或玉石制作的乐器,如磬;“土”指用陶土制作的乐器,如埙、缶(缶初为先民们装食物饮料的器皿,类似水碗,后发展为打击乐器);“革”用动物皮革制作的乐器,如鼓;“丝”指用丝弦制成的乐器,如琴、瑟等;“竹”指用竹子制成的乐器,如箫、篪(古代两端封闭的笛子);“匏”指用葫芦制成的乐器,如笙、竽;“木”指木制的乐器,如柷(古代打击乐器,像方匣子,用木头做成,奏乐开始时敲打)、敔(古代打击乐器,奏乐将终时,击之使演奏停止)。

二、沂南汉画像石上的乐器种类探析

钟。金类乐器。中国古代的打击乐器,中空,敲时发声。盛行于青铜时代,由于青铜钟质料坚实和耐腐蚀,至今虽已历经两三千年来,仍能给我们留下古代真实的音响。钟通常作为一种军事或宗教建筑的附设器具,用于报时或召集人群、发布消息等。宫廷所用的钟都刻有铭文,以祈求天神保佑。钟在古代不仅是乐器,还是地位和权力象征的礼器。王公贵族在朝聘、祭祀等各种仪典、宴飨与日常燕乐中,广泛使用着钟乐。

钟其大者可以单独悬挂,成为“特钟”,也可以将不同大小、不同音律、不同高音的钟编成组(套)悬挂演奏,称为“编钟”。迄今发现的青铜编钟,都不早于西周中期。编钟的

组合，在西周中期枚数较少，以大小三枚为一组。中期以后，枚数较多，有大小八枚为一组的。春秋中期到战国中期，钟的制作技术日益进步，编钟的组合枚数更多，一组达九枚或十三枚，并且逐渐成为一种礼仪乐器，使这种单纯的乐器扮演起一个政治、文化上的重要角色。到汉代，编钟已走过了辉煌的历程，走向衰落。从沂南北寨乐舞百戏图看，所见钟、磬数量很少，钟只二枚，磬为四件，说明钟、磬在汉代俗乐中不占重要地位，不作为主奏乐器，只能配合丝竹等乐器，处于从属的地位，在乐队中不作为旋律乐器使用，已没有它在先秦雅乐中的崇高地位了。汉代俗乐使用铜钟，大概是利用其音穿透力较强、声音洪亮深邃的特点，在乐队中用于打击节奏或加强某一音阶时使用。

铙。金类乐器。商代始出现的一种打击乐器，钟的前身。铙一般铜铸，横断面扁形，边成棱形。先是单个的，后来逐渐发展为大小不同、三五成组的编铙。历史进入周代，乐匠们对编铙进行了改进，先是把编铙挂在架上，再对铙的形状进行了改进，这就成了编铙，而且数量也逐渐增加。《周礼·地官·鼓人》云：“以金铙止鼓。”说明铙鸣表示演奏一曲乐章的完毕。马端临《文献通考》云：“铜铙，浮屠氏所用浮沔，器小而声清，世俗谓之铙”。在汉画中有许多铙的画面。从安阳殷墟出土的铙和汉画中的铙大致相同。

图1“乐舞百戏图”乐队中，第二排是吹排箫的乐人，共五人，最右一人左手拿着锤子在敲一个有柄的、带花纹的铙，右手拿着排箫在吹。

磬。石类乐器。古代的石制打击乐器，悬挂在架子之上，用木锤敲击，能奏出五个音，音色清脆，悠扬婉转，别具一格。磬初为玉、石雕成，形制在后代又有多种变化，常以金属铸磬。磬最早用于先民的乐舞活动，后来用于历代上层社会的祭祀、宴享等礼仪活动的雅乐中，成为象征身份地位的“礼器”。甲骨文中的磬字的字型，左半如悬石，右半像用手执槌敲击。《尚书·益稷》：“击石拊石，百兽率舞”，“石”即指磬。据考

古表明，约在夏代就有东下冯遗址的石磬，片状，打制而成。形状有多种变化，商代石磬上作弧形，下近直线；西周至战国时期，上作倨句形，下作微弧形；汉代以后，上下均作倨句形。此外也有作鱼形、长条形的。磬可能源于某种片状石制劳动工具。磬身或无饰纹，或饰虎纹、鱼纹彩绘风鸟花纹等，单个的称特磬，一组的称编磬。

“磬”与“庆”同音，因此磬常用来象征好运气，凡吉庆的主题部可用磬来表示。绘着铜磬的吉祥图案，可以表示“普天同庆”。人们用“笙磬同音”来祝颂和谐和睦。另，佛寺中有叫磬的法物，是一种打击乐器，形状像钵，用来敲击以集合僧众。佛僧念经时敲击的木鱼，有人称为“鱼磬”。山东武氏祠汉画像石中有幅孔子击磬图，孔子弹奏的就是七枚一组的编磬，画面刻画了卫灵公等人被音乐感化的动人场面。

图1“乐舞百戏图”乐队中，上组的雅乐中，有四个刻有纹饰的磬，一人右手执槌在敲（图2）。第41幅：下格右上角用带悬着一有纹饰的磬，磬两端悬两璧。第43幅：上格刻周公辅成王的故事，右一人双手举一曲柄的盖，中垂一磬。第48幅：上格梁上垂下的纓带下系一有纹饰的磬，磬下中系一璧，两端各系一幢。

埙。土类乐器。是一种很古老的吹奏乐器，最初的埙可能是先民们模仿鸟兽叫声以诱捕鸟兽，后来随音乐的发展而成为单纯的乐器。《世本》：“埙，暴辛公所造。”《拾遗记》云：“庖牺灼土为埙。”《说文》云：“埙，乐器也，以土为之，六孔。《尔雅》注云：“（埙）烧土为之，大者如鹅子，锐上平底，形如秤锤，六孔，小者如鸡子。”又《风俗通义》：“埙烧土为也，围五寸半，长三寸半，有四孔，其二通，凡六孔。”说明比较完备的陶埙有六个音孔。在浙江河姆渡遗址中曾发现有一个吹孔的埙，距今约七千年，这是目前所发现最早的实物，汉画中的埙由于石质刻画较粗而看不出音孔的数量，但许多汉画像石、砖等都有埙的出现。

图1“乐舞百戏图”乐队中，第二排吹排箫的五名乐人中，最左一人双手捧着埙在吹。

建鼓。革类乐器。在竿上贯鼓，谓之建鼓。在汉代盛行的百戏中，建鼓是一常用乐器，用于宫廷中和韶乐，“它主要起着指挥乐队、敲击节奏、激发渲染气氛的作用。北寨汉墓一块画像石上的汉代乐舞百戏图就较好地说明了这一点。作者以清晰的凸面线刻手法，再现了建鼓在东汉晚期乐舞百戏中的使用情况。”（陈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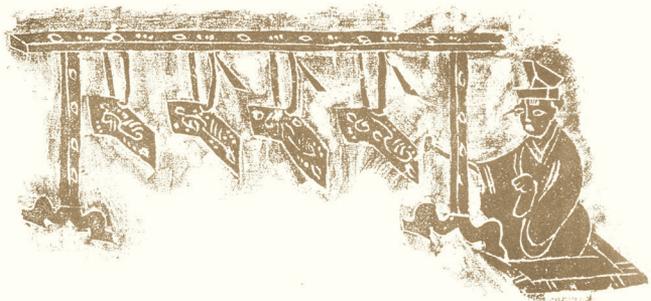


图2



图3

海、卫雪怡：《汉画像石中的建鼓》）建鼓在三千年前的商代至西周之际已有，是我国出现最早的鼓种之一，战国时代已广泛应用。

建鼓古称足鼓、晋鼓、楹鼓、植鼓、悬鼓。高承《事物纪原》云：“建鼓，商人柱贯之，谓之楹鼓。近代相承，植而贯之，谓之建鼓。”《礼仪·大射礼》：“建鼓，在阼阶西，南鼓。”郑玄注：“建犹树也。以木贯而载之，树之附也。”《太平御览》云：“建鼓，木鼓也，少昊氏作焉，为众节之乐。夏加四足，谓之节；商人柱而贯之，谓之盈鼓；周悬而击之，谓之悬鼓，近代相承，植而建立，谓之建鼓，本出于商制也。”建鼓之名可追溯到《国语·吴语》中：“载常（常：旗名，画日月于其端）、建鼓，挟经秉枹（经：兵书，枹：鼓槌。），万人以为方阵。”韦昭注：“鼓，晋鼓也，《周礼》：‘将军执晋鼓’。建，谓为楹而树之。”《礼记·明堂位》载：“夏后氏之鼓足，殷楹鼓，周县（悬）鼓”。郑玄注：“足，谓四足也。楹，谓之柱贯中上出也”。汉代张衡《东京赋》：“鼙鼓路鼗，树羽幢幢。”《隋书·音乐志》载：“建鼓，夏后氏加足，谓之足鼓。殷人柱贯之，谓之楹鼓。周人悬之，谓之悬鼓。近代相承，植而贯之，谓之建鼓，盖殷所作也。”

战国时期铜器上镂刻的花纹图案及汉代石刻画像中多有演奏建鼓的形象。建鼓有扁圆、长圆两种，鼓体较大，中间稍粗，两端略细，两面蒙皮。建鼓“楹而树之”是其特点，即用一木柱直贯鼓身，并牢固地植于形状和造型各异的鼓座（曰“附”）上。汉代建鼓的鼓座形制很多，有十字交叉形、方形、山字形、虎形等。建鼓常以流苏羽葆为饰，羽葆以翟尾（野鸡尾毛）做成。羽葆中间的幢上有流苏，用丝帛制成，可随风飘动。汉

画像石上有些建鼓画在官府之前，也有不少成为百戏音乐表演中的乐器之一，一般有两人在鼓的两侧，手持鼓槌击鼓起舞。在汉代，建鼓舞是盛行于宫廷和民间的一种双人舞蹈。最典型的是对称性构图，建鼓置于画面的正中心，将画面一分为二，增强了画面的稳定均衡感，而鼓舞者的大幅度动作，使画面活跃了起来，气氛热烈而欢快。

图1“乐舞百戏图”乐队中，上组的雅乐中，有一人正用双手击建鼓（图3）。

图1“乐舞百戏图”乐队中，有建鼓舞，舞者着宽袍大袖衣，侧身向鼓，双手各执一鼓槌，双臂高扬，正欲击鼓。击鼓人的体态活跃生动，舞姿健美，仿佛可以听到他所击打的滚滚鼓声。从其舞动的双臂和跳跃的步伐上看，这是一种边鼓边舞、并带有专业性质的建鼓舞。“乐舞百戏图”右下戏车上树有一建鼓，在建鼓上端置一平板，有一女孩双手倒立在平板上。古代文献中没有关于建鼓舞表演动作的记载，此画面却把鼓的形状、结构、色彩以及鼓员表演时的瞬间造型再现于我们面前，使我们知道建鼓舞不仅是鼓员且鼓且舞，而且它在百戏和乐队中起控制节奏和指挥全局的作用。图4、图5、图6亦刻有建鼓。



图5



图6

鞞鼓。革类乐器。此鼓扁圆形，有时置于地上，鼓员手执鼓槌，席地敲击；有时和建鼓配合，挂于建鼓之下。《释名》云，“鞞，裨也，裨助鼓节也。”《宋书·乐志》云：“鞞舞，未详所起。然汉代已施于燕享矣。傅毅、张衡所赋，皆其事也。”

汉画像石上的鞞鼓很多，其含义有二。其一，指骑鼓，古代军中所用的一种小鼓。《说文·鼓部》：“鞞，骑鼓也。”《周礼·夏官·大司马》：“中军以鞞令鼓。”唐李白《战城南》：“旗色如罗星，鞞声殊未已。”宋陆游《书悲两首》之二：“万里扫尘烟，三边无鼓鞞。”陈毅《寄耿星同志》：“黑非独立惊鞞鼓，数行韵语报平安。”《礼记·乐论》云：“闻鞞鼓而思良将”，意为一听到催征进军的鼓声，人们就会自然而然地想起那些能征善战的将领。其二，指小鼓，亦谓应鼓。《礼仪·大射仪》：“应鼓在其东。”郑玄注：“鞞，小鼓也。”晋陆机《演连珠》：“鞞鼓疏击，以节繁弦之契。”清戴震《乐器考》：“《礼仪》有朔鞞，应鞞。鞞者小鼓，与大鼓为节。……作堂下之乐，先击朔鼓，应鼓应之。”古时官府门前和大户人家门口常置建鼓和鞞鼓。官府（寺）门口之建鼓在文献中亦有所记载。颜师古曰：“诸官曹之所，通呼为寺。建鼓，一名植鼓。建，立也。谓植木而旁悬鼓焉。县有此鼓者，所以召集号令，为开闭之时。”寺门建鼓之用途盖如此。建鼓原本置于官府的大门前面，官府启闭，击鼓为号。要向官府伸怨，也可击鼓。古时大户人家门口亦置建鼓，有时在建鼓的下面，还附加一只小鼓，这种小鼓，在古代既叫“鞞鼓”，也叫“应



图4

鼓”，是一种传达的工具，客人到门，门吏们敲一下应鼓，以与大鼓的强声相配合，增加鼓音的变化，以此向家里的主人通报一下，叫“击鼓传音”。随着历史的演进，这种击鼓传达的方式被其它通讯形式所取代，门口的大鼓和应鼓也逐渐失去其原始的作用，成为象征的符号，被组合到大门建筑整体（石鼓），成为一种摆设和装饰。

图4：左端是一座曲尺形的房屋，侧屋的尽头处有栏杆，紧靠着它树一建鼓，鼓腹上还系着小鼓，即鞞鼓。图5、图6上层建鼓之下各悬一鞞鼓。

鼗鼓。革类乐器。古代鼓的一种，原为乐器名。今指两旁缀灵活小耳的小鼓，有柄，执柄摇动时，两耳双面击鼓作响，俗称拨浪鼓或货郎鼓。汉以前，鼗鼓有柱子贯穿，用时树立；汉以后改变为现在的形制。《玉篇·鼓部》：“鼗，似鼓而小。亦作鼗。”《周礼·春官·小师》：“小师掌教鼓、鼗、柷、敔、埙、箫、管、弦、歌。”郑玄注：“鼗如鼓而小，持其柄摇之，旁耳还自击。”因其柄上穿鼓多寡不同，而有路鼗、灵鼗、雷鼗的分别，一般分为一至四面鼓。用于宗庙社稷祭仪的雅乐，汉唐以后也用于宫廷的燕乐。《仪礼·大射仪》云：“鼗倚于颂盘，西纆。”注：“鼗如鼓而小，有柄，宾至摇之以奏乐也。”《释名》：“鼗，导也，所以导乐作也。”《隋书·音乐制下》：“武舞二人执鼗，二人执铎。”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篇·我的种痘》：“一样玩具是朱熹所谓‘持其摇之，则耳还自击’的鼗鼓。”

汉画像石上的鼗鼓一般表现为两种形式，一种表现为奏乐者右手执排箫，左手摇鼗；一种是把鼗鼓作为舞蹈中的道具，艺人边舞边摇鼗鼓。东汉时，鼗鼓在朝廷举行的岁末逐疫仪



图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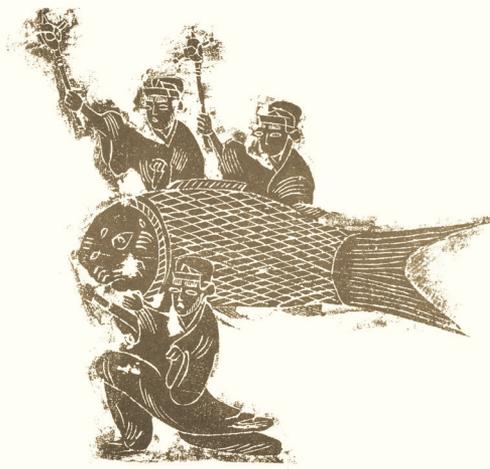


图8

鼓（扁鼓），因此在画像石中易与小鼓相混，实际上尽管他们形状相似，但只要掌握这两种乐器不同的演奏方式是不难区分的。鼓是以桴击以发音，节是以手拊以发音。“节”发展到唐代，形状有了改变，就是装在一个形状像博局，中间开一圆孔，正好能容“节”的框架里面。《通典·乐典》云“节鼓，状如博局，中开圆孔，适容其鼓，击之以节乐也。”从《通典·乐典》的记载，也说明在此之前，“节”是一种圆形的革制的鼓类乐器，与画像石中的画像吻合。

图1“乐舞百戏图”乐队中，第一排即是拊节的五人女乐队。

琴。丝类乐器。现代称古琴为七弦琴。在古代又别称绿绮、丝桐等。琴在先秦时期就已经是常用的乐器，如《书经》：“搏拊琴瑟以咏”；《诗经》：“琴瑟在御，莫不静好。”琴传说为神农所造，《世本》：“神农作琴。神农氏琴长三尺六寸六分，上有五弦，曰宫、商、角、徵、羽，文王增二弦，曰少宫、少商。”《桓谭新论》：“神农氏继而王天下，于是始削桐为琴，绳丝为弦，以通神明之德，合天人之和焉。”《帝王世纪》：“炎帝神农氏姜姓也，人身牛首，长于姜水有圣德，都陈，作五弦之琴……”琴与棋、书、画，构成四艺，是每个文人学士所必须掌握的风雅之事。文人学士之所以特别喜欢弹琴，是因为他们把弹琴看作道德和性情修养的必不可少的一部份。汉代刘向曾说：“乐之可密者，琴最宜焉，君子以其可修德故近之。”古代文人学士出外时，常携琴佩剑，琴心剑胆是文人所追求的儒侠相济的文士风范。文人学士喜欢弹琴，还因为琴能去邪归正，使人心气平和。据古籍记载，东汉灵帝时，陈留郡人蔡邕因为多次上书奏事，违背皇帝旨意，又被得宠的宦官所憎，他担心自己难免被害，就流亡江湖，行迹远及吴会地区。到了吴郡，遇上一个吴地人用相木烧火煮饭，他听了听相木在火中爆裂的响声，就说：“这是一块好木材。”便请求把那块相木给他，他砍削制成一张琴，果然弹出动听的声音。木料烧焦的地方作琴尾，于是这张琴取名叫“焦尾琴”。据现存的图像及文献资料，至迟在汉末已大体定型为后世通用的形制，汉代的琴已是较普遍的乐器，汉代的司马相如等都以善弹琴著称。

式的驱傩大典中是必不可少的法器，因为汉代人认为，鼗鼓的声音可以驱鬼逐疫，给人们带来平安。

图1“乐舞百戏图”的“鱼龙曼衍”之戏中，有5人手摇鼗鼓（图7、图8）。

节。革类乐器。是一种节乐的乐器，演奏方式是用手拊。唱歌、奏乐用节来打拍子，舞蹈时，舞人也是和着节的声音（拍子）表演。《隋书·音乐志下》径直称之为“节鼓”。《宋书·乐志一》云：“节，不知谁所造。傅玄《节赋》云：‘黄钟唱歌，《九韶》兴舞。口非节不吟，手非节不拊。’”《宋书·乐志二》载《弩俞新歌》云：“材官选士，剑弩错陈，应桴蹈节，俯仰若神。”指的就是舞人和着击鼓（或者是以桴击地）的声音和拊节在表演。

节的形状如小鼓，用手拊以发音。在汉画像石乐舞百戏图上也有见到，是汉代俗乐中用于节乐的乐器之一。也正因为“节”状如小

瑟。丝类乐器。瑟传说为伏羲氏所造。《说文》：“瑟，包羲所作弦乐也。”《帝王世纪》曰：“太昊帝庖羲氏，风姓也，蛇身人首，有圣德，都陈，作瑟三十六弦。”目前考古发现最早的实物是湖南长沙浏城桥一号楚墓出土的瑟，约为春秋晚期或战国早期制品，近年来在河南、湖北、湖南均发现有战国至汉代的瑟。据文献记载，瑟规格有两种，《礼记·明堂位》：“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在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二十五弦瑟，可知它按五声音阶调弦。在马王堆一号汉墓彩绘棺头档有一拟人化的神怪鼓瑟图；在汉画像石中，由于雕刻比较粗略，看不出瑟的弦数，但长方形的形体常放置在膝上以手拔弦的姿态是比较清楚的。瑟音悲凉，因此瑟即用于宴享仪礼的活动中，也用于伴奏歌唱，《汉书·郊礼志》：“泰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为二十五弦。”《汉书·张释之传》云：“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意凄怆悲怀。”琴瑟同奏，其音和谐，所以，人们开始以琴瑟比喻友情谊。后来，“琴瑟和鸣”更多地用于讲夫妇和好。“琴瑟调和”也是常用的对新婚夫妇祝颂吉语。

图1“乐舞百戏图”乐队中，第三排是管弦乐，共四人，右为鼓瑟图。最右一人跏坐于席，瑟平放于席树置于右侧，双手掌心向下，右手指抹外组弦，左手四指微曲（大拇指不可见），临于内组弦上方，也很像是采用双手同弹四根弦。这种将瑟树置于右侧进行弹奏，迄今为止只见这一幅，似乎难以想象，有待于深入研究。

琵琶。丝类乐器。拨弦类弦鸣乐器。来源于北方少数民族，被称为“民乐之王”，“弹拨乐器之王”。东汉刘熙《释名·释乐器》：“批把本出于胡中，马上所鼓也。推手前曰批，引手却曰把，象其鼓时，因以为名也。”其名“琵琶”、“琶”是根据演奏这些乐器的右手技法而来的。演奏时竖抱，左手按弦，右手五指弹奏，是可独奏、伴奏、合奏的重要民族乐器。琵琶音箱呈半梨形，张四弦，颈与面板上设用以确定音位的“相”和“品”。到汉代定型为四弦十二品位后，被称为“汉琵琶”、“秦汉子”。在汉画像石上，目前只在四川乐山发现一幅清晰的琵琶伎的画像石，图中为一男性，着冠帻，斜抱琵琶，琵琶长27.5公分，正欲弹奏，此图当为中国目前考古发现最早的琵琶图。

筑。丝类乐器。古代打击乐器。《汉书·高帝纪》应劭注：“状似琴而大，头安弦，以竹击之，故名曰筑。”颜师古则云：“今筑似瑟而细颈也。”战国时期已有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的故事，说明筑的产生年代当更早。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棺头档上有一击筑图像，一神人左手执筑，右手持细棒击之。

夯杵。木类乐器。在汉画像石、汉画像砖上，目前所见到的木类乐器只有夯杵，这是由夯筑城墙发展而来的乐器，用夯杵演奏的乐曲叫《睢阳曲》。《史记·梁孝王世家》索隐引晋《太康地理记》说：“城方十三里，梁孝王筑之。鼓倡节杵而后下和之者，称《睢阳曲》。今踵以为故，所以乐家有《睢阳曲》，盖采其遣音也。”《续汉书·郡国志二》注引《地道记》亦云：“梁孝王筑城十二里，小鼓唱节杵下而和之，称《睢阳曲》。”这一乐曲产生于西汉景帝之时，梁孝王征召劳动人民服役，建筑睢阳城墙。在艰苦的劳动中，筑城民工出于劳动协作与鼓舞劳动热情的需要，协调举杵夯筑城墙的动作创作出来的。以后可能由乐人在这基础上作了加工。因为是在修筑睢阳城墙时产生的，故名之为《睢阳曲》。《睢阳曲》自产生之始便得以传播，并且还流传下来，在刘宋时期，还在演奏，《宋书·乐志一》云：“筑城下杵者，出自梁孝王，孝王筑睢阳城，方十三里。造时倡声，以小鼓为节，筑者下杵以和之，后世谓此声为《睢阳曲》，至今传之。”从记载看，《睢阳曲》所用乐器必须有小鼓和夯杵。用小鼓作为节拍，举夯杵筑地而后可能再伴以唱歌。演奏《睢阳曲》的画幅，迄今只见于沂南北寨“乐舞百戏图”。

图9演奏《睢阳曲》。三位乐人立于场中，左手持杵置于肩上，右手前伸，小跨步，动作协调一致，足前各置一小鼓，图左一人张口作歌，中间一人口部石面残破，漫漶不清，图右一人闭口。图中的乐器——小鼓、夯杵，均与《睢阳曲》使用的乐器吻合。看来《睢阳曲》是熔奏乐（击鼓、以夯杵筑地）、舞蹈（从图中乐人动作一致可证）、演唱于一炉的表演艺术，采取一人领唱，余人和的方式表演。表演时把鼓声作为唱歌和下杵的节拍，但到底是用手击鼓还是以足蹋鼓，或者间或用木杵击鼓，是表演者自演自唱，还是有乐队伴奏演唱，由于资料有限，尚待进一步研究。



图9

笙。匏类乐器。笙是一种古老的簧管乐器，“八音”分类属“匏”，是世界上现存大多数簧片乐器的鼻祖。发音清越、高雅，音质柔和，歌唱性强，具有中国民间色彩。据传为神话人物女娲所制。女娲原是伏羲的妹妹，兄妹两人同入葫芦逃避洪水灾劫。洪水过后，地上只剩他们兄妹两人，他们只好违伦结合，再造人类。后来，女娲制作笙簧。所制笙簧形状像凤鸟的尾巴，有十三只管子，插在半截葫芦里面，以纪念伏羲女娲在葫芦里避洪水的经历。《风俗通》引《世本》：“随作笙长四寸，十二簧，象凤之身，正月之意也。”《帝王世纪》：“帝女娲氏，亦风姓也，作笙簧，亦蛇身人首。”《唐乐志》云：“女娲作笙，列管于匏上，纳簧其中。”《释名》曰：“笙，生也，象物贯地而生，以匏为之，故曰匏笙亦是也，其中空以受簧。”从以上可以看出，笙不仅传说为创世女神女娲所造，且有先民们对生育崇拜的寓意。女娲再造人类，出现婚姻制度，笙的创制与此紧密关连。如今西南苗族、侗族所在地区每年二三月要举办芦笙会。在古代，国有嘉宾，则鼓瑟吹笙。“笙”与“升”谐音，所以笙亦象征着提升。一幅画着花瓶插着三枝戟，旁放笙簧的吉祥图案，表示“平升三级”。

图1“乐舞百戏图”乐队中，第三排是管弦乐，共四人，最左一人两手捧着笙在吹，笙的长管上还飘着两条缨带。

竽。匏类乐器。汉画中有许多乐人吹竽的形象。《汉书·礼乐志》记载宫廷乐队中设有“竽工员”，颜师古注云：“竽，笙类也，三十六簧，音于。”竽也是比较古老的乐器，春秋战国时已有，而且常与瑟配奏。《墨子·三辩》：“士大夫倦于听治，息于竽瑟之乐。”《楚辞·九歌·东皇·太一》有“陈竽瑟兮浩倡”，《招魂》中有“竽瑟狂会”的句子，说明楚乐中是竽瑟协奏之乐，汉代的乐队依然。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竽的明器一件，通高七十八厘米，竽斗、竽嘴为木制，竽管二十二根，竹制。在四川的汉画像砖中，也有很多在马上吹竽的画面。

排箫。竹类乐器。汉画中吹箫的画面很多，一般为乐人一手摇鼗一手执排箫吹奏。

《释名》云：“箫，肃也。其声肃肃，而清也。”表明排箫之音悲沉，《汉书·周勃传》云：“常以吹箫给丧事。”看来箫既用于宴飨，也常用于丧葬。箫的管数多少不一，《太平御览·乐部》云：“箫大者二十三管，无底。小者十六管，有底。”它的形状，据《北堂书钞》箫条：“像凤翼，如凤鸣，其形参差，其声肃清。”陶注云：“其形像凤之翼，十管长二尺。”汉代的排箫在雅乐方面继承了周以来的“礼器”地位，在军乐中占据了军乐队核心乐器的地位，在民间则既广泛应用于民间文化活动中，同时又具有地域性的“神器”地位。河南和山东一带的汉画像石上出现的排箫与鼗鼓多是用于乐舞百戏的伴奏乐队中，而四川一带的汉画像石多有伏羲执鼗鼓、女娲执排箫的图像，且多为一手执乐器一手执太阳。这些画像中的排箫虽不是用于民间文化活动，但由被人们崇敬的女娲一手执排箫一手执太阳，便足以证明当地人们对这一乐器的喜爱，也说明其在民间信仰中也具有“神器”的涵义。无论从汉代哪个社会层面的音乐讲，排箫都是必不可少的乐器，这种情况在乐器的发展史上并不多见。排箫在汉代各个层面音乐中都占据主要地位，形成了一种全面的发展，达到了这一乐器发展的巅峰，也是排箫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时期。

图1“乐舞百戏图”乐队中，第二排五人正在吹排箫。

长笛。竹类乐器。长笛是汉代的竖吹类单管乐器，迄今尚无实物发现，只见于汉画像石、汉画像砖中。汉代乐舞百戏图中，常见一种竖吹竹类单管乐器，形制一致，双手持管，跽坐吹奏，管长近地。此种乐器在山东、江苏画像石和辽阳、内蒙古墓壁画中均可见到。这种乐器可能是在竖吹古笛的基础上，由西汉武帝时的庶士丘仲，参照了羌族双笛（双管笛）进行改良制作的。故应劭《风俗通·声音》亦云：“笛，谨案《乐记》武帝时丘仲所作也。”这种长笛原本四孔，后由京房在背面加一孔，成为五个按孔。大概到魏晋时期，又加了一孔，成为六孔。这种长笛在汉代以至魏晋时期都甚为流行。故此文人辞赋常有歌咏长笛的。除马融《长笛赋》外，晋伏涛有《长笛赋》。蔡邕《警师赋》有“抚长笛以摅愤兮”、魏文帝诗《善哉行》中也有“长笛吐清气”之句。

图10里面一人正在吹长笛。



图10

笛。竹类乐器。笛是横吹单管竹类乐器，在汉代考古文物资料中数量较多。《说文》云：“笛，七孔籥也。”笛在战国时期已经流行。汉魏时期，无论竖吹、横吹都可以称之为“笛”。至唐宋时期始渐明确横吹单管竹类乐器成为“笛”，把竖吹者称为“箫”。战国时期宋玉曾作有《笛赋》，说是用衡山之阳的竹子制成，而且还说有雌有雄。战国时期的曾侯乙墓曾出土两件横吹单管乐器一大一小，恐非巧合，可能与宋玉“雌雄”笛之说有关，演奏时可能是雌雄（大小）配合使用。从战国时期与西汉武帝时期出土的笛来看，吹孔与按音孔均成90度角排列，不在同一平面之上。据研究，其吹奏方式应当是捧握，即吹孔向上，按音孔向里，双手大指托管，置于虎口，掌心向里，余四指按按音孔。又因为按音孔均在吹孔一侧，且在五孔以上，因此捧握吹奏时，理应双手都在嘴部同一侧。

解放军70个军的番号由来（上）

叶青松

众所周知，1948年之后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各个战场上对国民党军发起更加猛烈的进攻，作战规模不断扩大，部队开始跨区作战，不同战略区的部队逐步进行战役协同。比如，1948年8月，华东野战军主力、华北军区一部已实现跨区作战。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部队总兵力也由原来的127万人发展到280万人。整体作战态势表明，解放军更大规模的跨区作战和不同建制部队之间的战役协同成为发展趋势，这就迫切需要统一指挥、统一编制，更重要的是建立起统一的后勤保障体系。这一点，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早已了然于胸。1948年9月8日至13日，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明确提出建军500万，在解放战争第三年开始实行正规化建设任务。

中央军委根据中共中央要求，于1948年11月1日颁发了《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的规定》。规定称：“番号排列数目为70个军210个师，内中空额，留待今后建立新的军和师时补足。”这就是解放军历史上70个军的番号由来。

需要说明的是，在电文来往中，中央军委最早明确全军“统一组织和番号”的时间是1948年10月29日，比正式文件下达时间1948年11月1日早三天。这份早三天的电文是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回复华东局的电报。电报原文称：“饶（漱石）、粟（裕）、谭（震林）并华东局：感已电悉。中央及军委关于解放军统一组织和番号的规定即将发出。吴化文军编入华东野战军序列，排成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五军。其所辖之三个师，排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第一〇三师、第一〇四师、第一〇五师。吴军改编后的军、师番号，即由新华社公开发表。其关防、委令，即将由军委送达。同意何克希任吴军政治委员，吴宪任该军政治部主任。军委、总政。”

电文中的已电，指1948年10月27日，饶漱石、粟裕、谭震林关于吴化文部改编事项致中央军委电。主要内容是：“该部究应编何种番号？如编纵队，则应称十四纵为宜，如编军，则不便称第一军。另派何克希（原一纵副司令员）为吴军政治委员，吴宪（野政联络部部长）为该军政治部主任。”

从电文中可以看出，在全军统一番号使用前，到底使用“纵队”还是使用“军”番号，连野战军的首长们都还不知道。

70个军番号使用了67个军番号

从1948年11月至1949年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式实施统一番号，全军使用了51个军番号。3月，又使用了6个军番号。这样，先后使用了57个军番号。

这57个军番号是：第一军、第二军、第三军、第四军、第六军、第七军、第八军、第十军、第十一军、第十二军、第十三军、第十四军、第十五军、第十六军、第十七军、第

十八军、第二十军、第二十一军、第二十二军、第二十三军、第二十四军、第二十五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十七军、第二十八军、第二十九军、第三十军、第三十一军、第三十二军、第三十三军、第三十四军、第三十五军、第三十八军、第三十九军、第四十军、第四十一军、第四十二军、第四十三军、第四十四军、第四十五军、第四十六军、第四十七军、第四十八军、第四十九军、第五十军、第五十八军、第六十军、第六十一军、第六十二军、第六十三军、第六十四军、第六十五军、第六十六军、第六十七军、第六十八军、第六十九军、第七十军。

后来又使用了10个军番号。它们是：1950年2月，新疆民族军改编成解放军第五军；1949年12月，新疆国民党军起义部队改编成解放军第九军；1949年5月，陕南军区部队组成解放军第十九军；1950年1月，绥远起义的国民党军董其武部改编为解放军第三十六军和第三十七军；1949年8月，金口起义的国民党军张轸部改编为解放军第五十一军；1949年11月，长沙起义的国民党军改编为解放军第五十二军和第五十三军；1952年10月，解放军原第四十四军和第四十五军合编为解放军第五十四军，不久改称志愿军第五十四军，参加抗美援朝；1952年11月，解放军第二十一兵团改编为解放军第五十五军。

70个军番号至今尚未使用过的有3个，它们是：第五十六军、第五十七军和第五十九军。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中，最早使用军番号的是东北野战军所属部队，但其指挥机构“第四野战军”番号使用却是在第一、第二、第三野战军之后。为了清晰看出四野（东北野战军）的整编脉络，先看一份电报：

林（彪）罗（荣桓），并告东北局，及各军区，各前委：

林罗世十四时半电悉中央及军委戌东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的规定已开始发出，内中规定我野战部队在纵队改称为军，师旅统一称师后，一般的均采用三三制，特殊地亦得采用军辖两师，师辖两团，团分为大团小团的临时编制。现林、罗提议将十二个独立师编入各纵队，使每个纵队都辖四个步兵师，这样既便于带领各独立师增强战斗和工作锻炼；又便于各纵在战场使用，减省建立新纵的直属人数。根据东北野战部队现在的环境和各种补充情况及今后的作战任务，我们认为东北野战各军可以特殊地采用每军辖四个师的编制，而暂不增加军的番号。师的番号仍按一军三师制顺序排列，独立师的番号也仍按戌东规定从第一百五十一师排起。除上述十二个独立师外，其余六个独立师，也同意以一个独立师编入第十一纵队，拆散并加强原来的三个师；一个独立师编入铁路纵队；其他四个独立师排成统一步兵师的番号后，暂不编军。东北的地方卫戍部队，至少应该有两个警备旅，方够南满几个大城市哈尔滨卫戍之用。

军委戌江

中央军委的这封电报是针对林彪等人此前给军委的电报而发的。1948年10月31日14时30分林彪和罗荣桓给中央和军委发电报。电报说：沈阳、锦州收复后，准备从北满14个、热河4个共18个独立师中，以13个师编入各纵队，因十一纵人数太不充实和有1个师战力不强，所以以2个独立师编入十一纵队，使每个纵队都辖4个步兵师。这样既便于战场上的使用，又能减去大批直属机关。其余5个独立师，以1个独立师编入铁道纵队，按原计划编成3万人；以两个独立师留营口、锦州一带担任防务；以1个独立师留热河地区活动；另1个独立师王家善部继续改造。此外，以原东北警卫团及总直属机关及各军区的一部分卫戍部队编成1个警卫师，由东北局、东北军区直属使用。

显然，从电报中看出，林彪和罗荣桓对部队编制问题的考虑是提前了，尽管他们还没有考虑到使用军这个番号概念。

大小S——徐氏姐妹的传奇

高雪萍



（姐姐大S）徐熙媛

籍贯：临沂市郯城县

民族：汉族

学历：台北市华冈艺术学校

职业：演员

获奖经历：第28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角提名

出演电影、电视剧代表作：《保持通话》、《流星花园》

（妹妹小S）徐熙娣

籍贯：临沂市郯城县

民族：汉族

学历：台北市华冈艺术学校

职业：主持人

获奖经历：电视金钟奖最佳主持人奖

主持节目：《康熙来了》

徐熙媛、徐熙娣姐妹俩（即大小S），祖籍山东省临沂市郯城县，姐妹俩的爷爷在1949年来到台湾，从拉三轮车到摆面摊，最后开了一家银楼，之后，全家人基本是在银楼上班。小S在《小S牙套日记》中提到“爷爷是山东人，说着一口道地的山东腔，所以小时候我根本听不懂爷爷在说什么”。这本书记述了小S和她的家人对这个来自山东临沂的爷爷的回忆、怀念和

深深的爱。

高中毕业，进入台北市华冈艺校戏剧科读书的时候，徐氏姐妹俩就已出道。姐妹俩首先以唱片歌手的身份出道，由于姐妹俩活泼可爱，唱片公司将两人包装成偶像组合SOS。二人在加入福隆王伟忠旗下后，又变身主持人的身份，SOS变成ASOS。

最初大S主持《娱乐百分百》时，还没有走优雅路线，经常在节目中扮鬼脸和小S比丑，简直丑到极致，让人难以相信她居然是那个漂亮的徐熙媛。一开始做主持时，大S明显是两人中处于主导地位的一个，小S还是个不怎么会带动现场气氛的女生。那时候她常常不知道说什么好，采访时有时甚至不知所云，所以姐妹俩中大S负责现场气氛、节奏和搞笑，小S就扮扮鬼脸，或者穿着稀奇古怪的衣服、搞出一些怪声音吸引观众注意。不过，几年的主持做下来，小S逐渐进入状态，反应越来越快，搞笑也越来越可看，新点子也越来越多。相反在改走优雅路线之后大S受到的限制增多，又不能搞怪，又不能搞笑，所以局面又扭转成小S负责笑点，大S常常只是帮衬几句。

之后，大S开始进军演艺界。2000年，大S拍摄了《流星花园》，2001年在台湾播出，掀起收视狂潮。同年《流星花园》在内地播出，成为当年最火的偶像剧。从那时起大S开始把事业重心放到演戏上。拍戏是一个十分辛苦的工作，作息不规律，经常熬夜加班，一天也不一定睡够5个小时，而且每天下午4点大S还要赶到主持节目现场录制《娱乐百分百》，一天忙下来，大S的身体和精神都承受了巨大的压力。那段时间，大S患上了抑郁症，心情常常会莫名其妙地十分低落。经过一段时间的调节，渐入佳境，随后大S拍摄了《青春六人行》、《流星花园2》、《倩女幽魂》、《战神》、《求婚事务所》等偶像剧，奠定了其一线女明星的地位。2005年，大S自己创作的《美容大王》一书在内地、台湾热卖，成为中文出版史上最具有影响力的美容书。2008年，电影《保持通话》上映，仅仅上映4天就取得了300多万港币的票房。大S凭《保持通话》入围最佳女主角，获得金像奖提名。《保持通话》中大S被歹徒绑架在荒废的货柜屋中，饱受各种折磨凌虐。曾经执导《三岔口》把郭富城从偶像改造为金马影帝的导演陈木胜，对大S严格要求，毫不“怜香惜玉”，拍她被歹徒虐待的戏，要壮汉演员真的揪大S的脖子，拍出她真实痛苦的表情。大S明白导演的用心，自我要求更高，拍摄过程中把自己关在密闭空间内，培养被困的情绪，除了上厕所，连吃饭、休息都不外出。这种魔鬼式的入戏方法，让大S的精神状态绷到最紧，她说：“每次拍我被壮汉凌虐，我都哭到虚脱，原本吃素的我，体力就不算太好，那段时间更连吃东西的力气都没有，妹妹都很为我担心。”在拍摄《保持通话》中，10天瘦了9斤，吓得小S说：“你怎么到了面无血色的地步啊！”不过在《保持通话》中，大S表现突出，得到了观众的认可和好评，她付出的牺牲绝对是值得的。

到目前为止，大S身兼唱片歌手、主持人、一线女主角、作家等多种职业，经过不断地磨练和成长，她已经成为当之无愧的亚洲当红女明星。

小S在《娱乐百分百》节目中无厘头的主持风格，深受年轻观众喜爱。她口齿伶俐、能掌控大局，并巧妙地将无厘头搞笑耍宝发扬光大，其率真自然的性格让她更加受粉丝追捧。殊不知，几年前，小S还只是个不起眼的小角色。她在《我猜我猜我猜猜猜》这档刚刚诞生的节目里，跟在吴宗宪的身边充当一个并不好



大S《保持通话》剧照



小S《康熙来了》宣传照片

看的花瓶。随着节目不断成长，小S的搞笑风格慢慢开始显露，戴着牙套主持成为她的特色。拆掉牙套后，小S变美了，并凭着“徐老师健身操”红透台湾，然后和庾澄庆、阿雅一起主持了《超级哈S帮》。小S在这个节目里比《我猜》更加放得开，她开始将精力集中在主持的一些细节和技巧上，而非单纯以扮丑取胜。就在小S把主持的十八般武艺练得差不多的时候，《康熙来了》让她大展拳脚。

《康熙来了》是由台湾中天综合台主办的一档娱乐节目。节目的名字由主持人蔡康永与小S徐熙娣二人名字中的“康”、“熙”二字组合而成。《康熙来了》给了主持人很大发挥空间，这保证了他们“怪”的特色能够充分发挥。完全即兴的提问和无底线、无禁忌的话题让现场惊喜爆笑的场面层出不穷。主持人每集都采访一位知名人物，另外邀请其好友、幕后工作伙伴如化妆师、场务、保姆等三人作现场“爆料”嘉宾。节目中除了穿插搞笑元素外，也在知性与理性的对话中，揭示他们不为人知的幕后故事。主持人毫不留情的发问加上现场“爆料”嘉宾独家爆料，知名人士的生活陋习、心灵隐私和出道前的窘态笑话被展示在节目中，让观众看到被访者在镜头以外不为人知的真我个性。《康熙来了》目前的被访嘉宾包括李敖、周渝民、吴宗宪、张学友、张宇、任贤齐、齐豫、萧亚轩、蔡依林、谢霆锋、梁咏琪等。目前，《康熙来了》每周吸引超过500万人次观看，是台湾收视率最高的有线电视台综艺节目。小S可谓是在正确的时间遇上了正确的节目。更重要的是还有一个好搭档——蔡康永。他的稳重把小S的恶搞中和得幽默健康，轻松不失本分。虽然最初有人对小S提出过质疑，说她恶俗、低劣，但后来不断上涨的人气和好评证明了她的实力，她和《康熙来了》一起，一炮而红。

这样一路看来，小S能成为台湾女主持的代表人物，绝非幸运和一日之功。就像台湾的综艺节目一样，也是在摸索中不断成长，都曾被质疑被否定，但最终都树立了自己独特的风格、获得了极高的人气。

● 《沂南县志（1990~2005）》首发式暨全县史志工作会议举行。10月11日，《沂南县志（1990~2005）》首发式暨全县史志工作会议在沂南县政府会议中心举行。临沂市史志办公室主任朱海涛、沂南县委副书记吴昌力、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祖丽梅、县政协副主席高海梅等出席会议。会议由副县长张生花主持。朱海涛在会上首先代表临沂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市地方史志办公室，对《沂南县志（1990~2005）》的出版发行表示祝贺，充分肯定了《沂南县志（1990~2005）》所取得的成绩。他要求进一步加大对《条例》的贯彻落实力度，切实加强地方志工作的领导；借势而为，深化读志用志活动；积极拓展修志工作空间，做好第三轮修志工作的准备工作；做好年鉴编纂工作，为修志服务，为县委、县政府中心工作服务。

《沂南县志（1990~2005）》是沂南县出版的第二部县志。该志上限为1990年，下限2005年，共29篇，另设人物、附录，共80余万字。

● 《莒南县人民医院志》评审会召开。10月11日，莒南县史志办召开《莒南县人民医院志》评审会，沂南、临沭、苍山、兰山等县区史志办有关领导及志书编辑人员共20余人参加。与会人员对志书评议稿进行认真的评审，对志稿修改和下一步的编纂工作提出了意见和建议。编辑人员表示会后认真梳理评审意见，努力把《莒南县人民医院志》编成精品志书。

● 沂水县史志办在包扶村圈里乡柿子园村举行鑫海桥开工仪式。10月16日，沂水县史志办在包扶村圈里乡柿子园村举行鑫海桥开工仪式。

柿子园村是沂水县史志办的包扶村，也是“第一书记”任职村。今年沂水县遭遇了台风暴雨灾害，主要道路被冲断，严重影响群众的生产与生活。灾情发生后，沂水县史志办全体工作人员捐款2000元慰问受灾群众，并积极联系有关部门帮助修建道路。

● 《临沂市志》编修工作简报（八）。2012年11月，市史志办对《临沂市志》相关供稿单位进行调度。市统战部、烟草专卖局、粮食局、档案局、编办、妇联、科学技术协会、临沂技师学院及河东、郯城、苍山、莒南、蒙阴、平邑等县区史志办等单位报送市志初稿。截至11月底，共有64个单位完成市志初稿。

近一段时间以来，市史志办不断加大对市志供稿单位的业务指导力度。市志编辑人员对临港经济开发区、临沂经济开发区、市防空办等单位撰稿人进行座谈指导；为地震局、科技局等单位复印相关市志样稿

参考。加强对已报送志稿的审查验收和初稿编辑工作，已对涑河治理指挥部办公室、公安局、法院、国土局、畜牧局、农机局、渔业局、工商局等单位的初稿进行初编，对市住建委、节能办、保险协会、团市委、临沂大学、山东医专等单位的市志初稿，提出具体修改意见，反馈回单位进行补充完善。对没有开展供稿任务的10家承编单位，积极靠上督导，确保完成市志供稿任务。

● 《琅邪符氏文化志》出版发行。由临沂市地方史志办公室、临沂市望族文化研究会、世界符氏文化研究会编纂，张务锋市长作序，赵爱华主审，朱海涛、符绩熙、唐士文主编的《琅邪符氏文化志》，于2012年9月由中华书局出版，2012年10月18日在浙江余姚举行了首发仪式，来自世界20余个国家与地区的符氏宗亲、专家学者参加。该志是继我市《琅邪王氏文化志》之后的第二部姓氏文化志。该志书篇幅宏大、内容丰富、史料翔实，全面、客观地记述了琅邪符氏的起源与发展、代表性的纪念地与纪念物、家族文化成就以及名人生平事迹等，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资料价值和社会价值。

更正：本刊2012年第四期《北豹窝战斗十三勇士》作者应为张乃军。